

炎黄春秋

第 **4** 期
2008年

李锐：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

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

我见到的胡志明主席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目 录

人物志

- 1 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李 锐
5 “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林 雪

一家言

- 12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思 源
20 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刘济生
24 表达权与解放思想.....王也扬

亲历记

- 25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李树桥
29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鲁利玲
33 我见到的胡志明主席.....戴 煌

春秋笔

- 36 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王 硕
41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李维民 李克进

沉思录

- 44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
——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杜 光

怀人篇

- 49 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丁磐石

品书斋

- 55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
文化、权力与政治.....高 华
63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抹不掉的记忆》序吴 象

古今谈

- 65 公园古今事.....雷 颐

海外事

- 69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王晓林

文摘苑

- 75 思想解放七论摘自《南方周末》

顾问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 社 长：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吴 思

执 行 主 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址：www.qikan.com

印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本刊电子信箱：yanhcq@sina.com

电话：发行部：010—68532048

编辑室：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010—68522852

传 真：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定价：5.80元

本期： 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审校 赵友慈

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

● 李 锐

李昌是我的老友。1938年7月，徐州突围回到武汉后，我们结识。由于在徐州时，我还是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的创始人，大概经过他的建议，长江局派我到湖南负责省青委工作。1940年到延安后，我们都在中央青委工作。他是组织部长，我是宣传部的宣传科长。1941年9月，中央精简机关时，他转行到晋绥边区任兴县县委副书记，我也调



“一二·九”那代人，左起：于光远、李昌、李锐、杜润生

到解放日报社，从此再未共事。直到80年代，他在中纪委，我在中组部，工作上才重新有了一些接触和来往；从“一线”退下来后，我们同时进入中顾委，交往就更多了。真正结下友谊，应该说还是80年代的事情，主要不是因为工作上的接触和来往，而是因为对这个党、对历史、对中国的问题和出路，我们有许多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和看法。

他是1936年入党的。“一二·九”运动后，我在武汉组织自发党的临时支部，1937年2月正式入党。在这个党里，我们共同经过了70来年的历史，彼此也有过相似的遭遇。李昌是“一二·九”的代表人物，他先是担任清华大学民先队大队长，北平民先队第二任总队长，1937年2月被推选为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成了当时的学生领袖，

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是他一生的第一个华彩乐章。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李昌作为“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而列入了候选人名单，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李昌一生的华彩乐章，当然不止于“一二·九”。上世纪50代，他从团中央调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在位11年，把这所问题成堆、难以为继的大学，办成了国内著名的重点高等学府，培养出数以万计的科学技术人才，享誉海内外。1975年，他与老搭档胡耀邦重新出山，到中国科学院领导整顿，和耀邦一起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文革”结束后，他第二次复出，主持中科院工作，纠正极左错误，恢复和调整科技、教育政策和知

识分子政策,制定新的科学发展规划,迎来“科学的春天”。70年代后期,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全力支持和参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清理积案,呼吁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实现历史的转折立下功勋。1979年初,他首倡“精神文明”建设。80年代,他在中纪委书记任上,竭尽全力推动改革开放,同党内高层的僵化观念反复较量,力图保护改革人士,维护雇工党员的党籍,以加快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一线”退下来之后,他关心民疾,倾力于扶贫开发事业,实地考察贫困地区,向高层提出改变贫困地区落后面貌的建议。80、90年代至今,我这位老友关注和思考更多的,还是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前途。改革前进中屡遭挫折,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丛生,他忧心忡忡,以其良知仗义执言,虽然屡屡招来明枪暗箭,却无怨无悔,矢志不移。上述这些,不能概括他的全部业绩,却是极富光彩和魅力的人生篇章。

去年李昌92岁华诞,老朋友聚会为他贺寿。我曾赋诗一首:

民先高举帅旗扬,大砭沟曾学楚狂。

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

第一句“民先高举帅旗扬”,是说他投身“一二·九”运动,当选全国民先总队长。第二句“大砭沟曾学楚狂”,说的是中央青委机关在延安大砭沟,青委的同志办了个《轻骑队》墙报,是大字报,用四五米见方的一大块长板立在沟口。内容是批评当年大家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当年在延安影响颇大。李昌和我都是湖南人,两湖古代为楚国所在,故为“学楚狂”,第三四两句“天下兴亡匹夫责,老仍研究济时方”,是说他从民先队长到中纪委、中顾委,兢兢业业,为国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辈子为这个国家,老了还在研究济世之方。

这是李昌一生的写照,也是“一二·九”这一代人的人生写照。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1949年建立全国政权,党员的构成大体可分为三类人:

第一类是建党时期的本土知识分子和从国外(苏联、法、德)回来的知识分子。两部分人都深受俄化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革命影响,早已褪去五

四时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色彩。这个群体就人数而言,在党内并不居多数,却先后是党内权力的实际掌控者。

第二类是党在20年代后期开始退居乡村,发动军事斗争,一直到40年代解放战争期间,先后动员起来的大批农民和城镇贫民。他们是中共武装的基本力量,其中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也是党的基础成员。他们都有对社会的不满及对土地和生计的渴望,除了少数有文化知识的,基本缺乏独立的政治的人格和近代的人文关怀。党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口号,把他们聚合起来;他们也就把党看成“救星”,当作自己利益的代表;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个群体在党内居多数,成为党内权力实际掌控者的社会基础。

第三类就是“一二·九”运动和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学、中学的青年学生。这个群体热情正直,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憎恶日本侵略者,反感国民党政权的独裁和妥协政策。他们靠近并最终加入共产党,主要不是出于个人生存需求,而是由于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和反对国民党独裁、妥协政策的政治态度,与这个群体的政治诉求一致。这个群体开始接受共产党意识形态,并没有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典籍,更多地是阅读左翼文学作品和进步政治书刊。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剥削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劳农政权的社会理想,同他们追求的自由、民主、平等在价值上有某种重合。民族主义(抗日救亡)和民主主义(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和专制),是他们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思想动因。比起前两个群体,这个群体更具理想主义色彩和独立人格。李昌就是如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在上海同济大学高中部就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随后,自发组织进步学生团体,接受和宣传进步思想,加入共青团。后为躲避国民党抓捕,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后,又投身“一二·九”运动,重新入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这个经历表明,他不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是出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参加共产党革命的。

当然,上述三种群体只是一种大致划分,实际情形并非完全整齐划一而互有参差。第一类的少数人,如张闻天等,后来回归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第二类的一部分人,如胡耀邦等,后来转变成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型的领导人。而第三类的某些人,却失去独立人格,蜕变成附庸。

投身共产党革命之后,“一二·九”这个群体一方面接受马克思和列

宁主义革命学说的灌输和共产意识形态的洗礼,形成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另一方面依然潜藏着原初的民主自由理念,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同以毛泽东个人为崇拜对象,以“毛泽东思想”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党文化”产生了内在的龃龉。与前两个群体不同,这个群体没有苏维埃区域的军事生活,特别是没有经过20、30年代前期严酷的党内斗争,更不了解苏区惨烈的“肃反”运动。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时,这个群体才第一次面临“党文化”的严厉改造。

在延安,作为青年工作负责人,李昌逐渐觉察这里的青年工作“多少还存在狭隘的模仿党和政权工作的作风,缺乏民主精神和青年气质”。“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使他感到这个运动的“一切优点与成就”,“是与内部的民主精神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他格外强调“外部的政治民主”和“内部的民主精神”,前者指国家的政治生活,即人民群众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结社和游行等自由;后者指“青年本身也要切实的实行民主”。他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指出,“只有政治民主的认真实施,才能使民族的团结臻于巩固,也只有民主权利的实现,才能使民力的发动得到应有的效果”,而那种“违反民主,采取强迫命令,压迫统治等办法,结果只有使团体愈弄愈糟,终于走到有名无实的地步”,主张“模仿党的一套光秃秃的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与缺乏民主与青



李昌与胡耀邦(1988年)

年化的工作作风,要抛弃了”。然而,李昌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的主张竟被视为“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不尊重党的领导”,受到严厉指责。透过这类青年工作方针之争的表象,可以看出,它实质上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理念上同“党文化”产生的抵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抢救运动”的主要对象是这个群体。

问题在于,这种抵牾在延安还只是刚刚开始。

党执政后,我们放弃了40年代的正确“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想、“联合政府”和“耕者有其田”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用强大的行政手段和战争年代的动员方式,建立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将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完全纳入公有制轨道,形成所谓“一大二公”的产权制度和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批判任何异己思想,形成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制度。为了巩固和强化政治、经济、文化的集权制度,又连续发动政治运动,从“肃反”、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1949年以后那段时期所实行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恰恰是这个党、也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曾经反对的“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重演。凡此种种,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翻版,又带有中国特点,是源远流长的

中国专制主义的复归,比斯大林式的苏联社会主义积弊更多更深。尽管我们也不时喊出“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但是这里的自由是所谓“纪律”约束下的自由,民主是所谓“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平等是“共产风”式的平均,与原来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平等相去甚远。

1949年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愈来愈受到心灵煎熬:当年他们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思想统制”,而如今实行的同他们原初确立的价值和理想的反差愈来愈大。除了思想上的困惑外,他们只能在他们参加的共产党里,以委婉、含蓄和曲折的方式,试图作出某种努力,坚守自己的人格底线,但是努力的结果往往是微弱的,要么杯水车薪,要么无济于事,要么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肉体。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李昌曾以种种方式,坚持真理,保护贤良,最终还是在文化大革命遭致厄运,被打倒、关“牛棚”,下干校。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不仅宣告这个悲剧的终结,而且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曾几何时,人们以为步履维艰的中国社会,会从此踏入坦途。不曾想到,中国的改革同样充满曲折,在中国改革和未来走向上,党内仍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邓小平接受毛泽东时代的教训,摒弃“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理念,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重心,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经济改革这条“腿”长,政治制度改革这条“腿”短。尽管他曾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但并没有将政治改革的承诺真正付诸实施。

另有一些人,极力维护毛晚年的极左意识形态,不仅反对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革,而且反对经济制度的变革,企图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老路上去。

还有一批人既拥护经济改革又推动政治民主。“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属于这个群体,他们成了80、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经过一系列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这个群体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当代中国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对中国前行的方向有了清醒的认识。李昌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之一。他从中国历史的视角,分析中国有一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迄今为止,

这个封建附庸等级体系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切中中国问题的根本,反映了党内改革民主群体的共识。

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的确在于专制主义及其制度。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弊端在于复活了专制主义。党执政以后,建立了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集权制度,党员和公民都不享有民主权利。这就离开甚至背离了人类近代文明主流。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必须抛弃斯大林式、毛泽东晚年的所谓“社会主义”,融入人类文明主流,民主、科学和法治,承认普世价值,同世界文明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要回归“一二·九”群体最初认同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价值目标。中国的改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那样,不只是经济改革,要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革;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的现代化,还包括政治、文化乃至人的观念的现代化。针对“文革”时期,法西斯专政大行其道,人类文明被践踏的惨痛教训,李昌在70年代末最早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张。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词虽然被官方高层接受,但是李昌从思想启蒙的意义上提出的这个主张,后来竟被曲解和庸俗化,在现实中则解释成了“五讲四美三热爱”。这与他的本意相去甚远,是他始料不及并难以接受的。虽然如此,李昌对中国的问题和出路的深刻思考,使得他在改革开放中又一次成为先锋人物之一,成为胡耀邦任总书记时期党内著名的改革代表之一。

范泓的著作《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是李昌从“文革”至今的生平传记。这一段时间,李昌的人生经历最为坎坷,也最富光彩。这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当代中国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材料,展示了李昌这40年坎坷而光彩的经历:尤其对70年代末以来党内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和冲突,作了详实的叙述和揭示,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李昌的生平,而且可以了解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党内错综复杂的历史。我相信,看了这本书,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汲取历史的智慧。

(为《党内觉醒者——李昌在中国改革年代》一书作序)

“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

● 林 雪

编者按：陈联诗是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她的母系和父系都是明清时期出过翰林的大家族，她自己却与当过放牛娃的革命青年廖玉璧自由恋爱结为夫妻。陈联诗在南京东南大学读书时参与了“五卅运动”，后因特务追捕回到家乡，参与了华蓥山区从1926年到1948年的三次武装斗争。1935年，她的丈夫、华蓥山游击队主要领导人廖玉璧牺牲，她带着两个孩子孤儿寡母闹革命，直至解放。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的家族中出了八位地下党员，死了四个亲人，其中有一位革命烈士，其传奇的经历在华蓥山区和重庆地下党的同志们中间广为传扬。本文是陈联诗的外孙女林雪撰写的她在解放后的遭遇。



1936年，陈联诗奉命去苏联学习军事，行至万县被捕，后被营救出狱。此为出狱当天的照片。

织了一个庞大的慰问团，前往慰问中央苏区的老革命老英雄，名单上就有岳池县的“陈玉屏”，就是赫赫有名的陈联诗。还有一个更加传奇的故事，说是原本要安排她到西南局军事委员会去当副主任，只是因为解放重庆的战斗中，她带领攻城的游击队员负了重伤，不得不砸开药店逼着店主拿药，后被店主向军管会告发，她背了个处分，被“发配”到了市妇联，当了个小小的生产部副部长……

其实陈联诗去妇联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她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办的那个缝纫社。

陈联诗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期间办了一个缝纫社，为了解决烈属们的吃饭问题，

其中就有彭永梧烈士的原配妻子谭幺姐，带着江姐和她自己为老彭生的两个孩子。陈联诗知道，这些烈属和自己一样，就是没了丈夫的寡妇，对于她们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要活下去。她借了五部缝纫机，加上谭幺姐和另外一个烈属凑来的两部，就组成了一个缝纫社。重庆的冬天阴雨连绵，她们就生产简易雨衣到大街上去卖，赚来的钱用来维持大家的生活。恰好此时，妇联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进军西藏和抗美援朝的部队生产大量的军用物资。于是这个缝纫社成了重庆市妇联生产部的主要生产企业。

重庆是解放大军最后攻克的重要城市，进驻了二野的两个兵团，大批军队干部在此转业，几乎

(一)

重庆解放的第二天，陈联诗全家就在临江门的一家公寓里建立了脱险同志联络处，专门接待从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中逃出来的同志和牺牲烈士的家属。这个工作结束后，陈联诗被分配到重庆市妇联，作了生产部的副部长。

对于陈联诗的工作安排，曾经有过很多传说，其中一说是让她回家乡岳池县去当副县长。解放初期，她在家乡是很有名气的，当时党中央曾经组

每个单位都同时配备了地下党和军队的干部。他们的行为处事有很大差别,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经历相对简单;而地下党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在这里加入了党组织,为革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重庆还因为当年反内战争民主的浪潮风起云涌,公众民主意识浓厚,不喜欢别人随便发号施令。这种环境造成的差别原本很正常,问题在于处理这种差别的标准不平等。尽管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邓小平在进城后明确指出:老(解放)区和新(解放)区的干部要团结一致,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可是比起雄赳赳的解放军,地下党的地位还是低了一等: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也无论什么资历和才能,地下党的干部只能担任副职。

当时的妇联也积聚着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年轻干部,她们大多是省市各级干部们的家属,论年龄很多人只能做陈联诗的女儿,论党龄大多只有她的一半甚至更低,却都成了陈联诗的上司。可是那些传奇的故事像影子一样跟随着这位机关里年龄最大的老大姐,她依然受到尊敬,也总有人追着她问那些传奇经历。她处处都让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同事们惊奇:在那个列宁服很时髦的时候,她却常穿一件裁剪得很合身的蓝色旗袍,天冷了就在外面套一件短呢大衣;她总是一只手上戴着表,另一只手腕上戴着一只碧色的玉镯,看起来像个女学者。可是一遇到她过去那些穿锦缎旗袍和长衫马褂、作揖打拱和高声喧闹的朋友,她就变得豪爽起来,陪着他们吃饭,抽烟,喝酒,划拳,谁都划不过她。她什么都会,会裁剪衣服,会用单方治病,会下厨房做菜,甚至会“算命”……

陈联诗没把这些惊奇当回事,解放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开始了,她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各样的庆祝游行,要为部队生产军用被服,要做鞋底,织毛袜,为参加志愿军的青年做大红花,为上北京开会的代表做绣品……这一切她做起来都游刃有余。陈联诗其实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能手,尤其是做妇女工作的能手。现在她带领着一群和自己一样的寡妇,风风火火干起来。她觉得解放区来的同志有些奇怪:那些一看就懂的文件,干吗老是没完没了地坐在那里读啊学啊讨论啊?难道志愿军需要的鞋底和毛线袜子不是一针一线做出来的,而是坐在板凳上学出来的?

(二)

刚刚解放的重庆,诸多要事在同时进行:清匪、反霸、抓特务、取缔妓女、收容乞丐和游民、组织各种协会、改革币制、干部鉴定、减租退押、统征公粮、平抑物价、恢复生产、处理劳资关系……每个人的命运都在大动荡中大起大落。陈联诗的身边很快集聚了各种各样的求职者,其中一批“身份复杂”:多次救过陈联诗和她一家的雷清尘去了台湾,他的夫人杨敏言现在生活没有着落,自然要来找陈三姐;她的堂兄陈人望,20年代也曾经是共产党,后来虽然当上了国民党的国防部财务预算处的处长,临解放时却自己拿出三百两黄金,从大特务头子徐远举手里解救出一位起义的同志,还为地下党做了很多工作,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陈联诗解放后要保证他的工作。解放时他被有关部门列为“统战对象”,可是当他急急地赶回岳池去侍候夫人生产,却马上被抓起来,当胡耀邦同志派人来过问此案时,他已经在两个小时前被当作“反革命”枪杀。家族里的人们惊恐万分,不由分说将幼小的弟妹送到陈联诗这儿来,意思是那些共产党说话不算数,你这个共产党说话总得算数吧?在陈联诗保留下的那些求职信里,甚至还有当年的军阀杨汉印的信件,当年游击队决定假意接受杨汉印的“招安”,以“借路”开上前线去与红军会合,陈联诗怎么也算是他杨汉印手下的陈营长,白白得了许多武器、装备和银圆,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你们的革命。现在你成了共产党的干部,我好歹也成了个统战对象,求你为我安排个把人去自食其力总还是办得到的吧;还有范绍增的姨太太。当年陈联诗来往重庆运送的枪支大都是从军阀刘湘和范绍增手里购买的,以义气著称的范绍增尊称她为“陈三姐”。现在范绍增成了起义将领,姨太太是不能再留了,把姨太太送到你陈三姐门下讨口饭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当然没问题!此时的陈联诗不但有这个能力,而且也觉得理所当然。咱们共产党总不能连那些跑浑滩的袍哥都不如,连知恩图报这个道理也不懂。这些帮助过革命的女人,又没有什么罪恶,安排她们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自己养活自己,也是一种改造嘛。

就像有些声讨金钱的人骨子里渴望金钱一样,有些反对权威的人骨子里也渴望权威,渴望高高在上的滋味。陈联诗在烈属和工人中间受尊敬的程度就已经让人不高兴了,她还这样不请示不汇报,自然会让人受不了,各种各样的议论开始起于青萍之末,很快演变为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



1953年底,陈联诗(前排戴大红花者)当选为重庆市白沙沱区人民代表

偏偏这个时候,有人找上门来,要把自己经营的农场捐献给妇联。

(三)

很多年以前,陈联诗就想要办个农场了。那时她还在和廖玉璧“自由恋爱”,对于苏联的集体农庄,抱着多么美丽的向往。现在,仰望半生的理想终于向自己走来,令人大喜过望。她把未来的农场命名为“建华”——建设新中华。她要把她的那些企业,还有烈属们都带到农场里去。

陈联诗的这个想法,也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不无关系。重庆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第二年1月下旬就提出恢复生产的口号。到4月13日,由重庆市工商局主持召开了个座谈会,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重庆市主要的军政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从存留的会议记录来看,由于国民党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的遗留因素、解放初期的治安混乱、城乡市场的流通不畅、以及私营业主们的诸多畏惧,全市两万六千家私营商店和少数工厂,开门开工的寥寥无几。整个工商业界十分萧条,与会代表叫苦连天,要求政府从税收等各个方面给予优惠政策。领导们对于商人的“故意叫苦”十分反感,提倡大力组建国营企业,把私营企业都统领起来。陈联诗要把私营农场改建为国营农场的计划,显然是符合这个精神的。

于是她积极行动起来,参加了具体的策划。考虑到资金方面的困难,她动员了包括自己的保姆

韩嫂在内的六个人,加上原先的旧股东,以投资的方式一共凑了旧币2000万元,相当于新币2000元。她还根据当时的政策,制定了“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经营原则,保证让每一个投资人在保证“为公”的前提下,自己也能得到好处。事情在她的主持下积极地进行,期间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到1950年9月,具体计划已经引起了区政府和市建设局的积极回应,并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眼看事情办得八九不离十了,陈联诗才兴致勃勃地将事情向妇联生产部提出,立即引起了她的上司——生产部长的警惕。这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部长在解放区经历过土改,现在坐镇重庆,并会在以后坐镇整个西南。生产部长最初是劝说,说陈大姐你要考虑自己的身份,如果农场做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你自己,还会影响到妇联,损失党的威信,何况这很有可能是地主在玩什么花招!再说陈联诗计划中的那个“劳资两利,公私兼顾”的原则,也让她心里很不舒服。虽然这个政策是上级提出来的,可那明显是为了发展生产向资产阶级做的暂时让步,你一个老共产党员怎么就当真了呢?以前总以为陈联诗交往的人员有些复杂,是长期从事地下斗争和统战工作的结果,怎么就没想到这是阶级敌人在拉拢她啊?看来地下党的同志们,政策水平确实很成问题。

如果仅仅是影响到自己,陈联诗肯定是无所谓的,可是如果影响到妇联,甚至涉及到党的威信,这事当然是做不得了。陈联诗什么也没说,以

后也再没有提起,那一整套痴心幻想,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都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可是不久,重庆市委正式布置了农村的减租、退押和反恶霸斗争。如果说城市碍于发展生产的需要,对于资本家还有“劳资两利”的政策作为缓冲的话,那么农村就明确提出了“防止和平土改”的口号,斗争大会和游街枪毙到处都是,一片暴风骤雨。一天,十几个农民兄弟拿着市里农民协会的介绍信找到了妇联,要找生产部的陈部长,说是他们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减租退押”的时候,声明自己的土地已经捐给妇联办农场了,他们来查看是不是地主在逃避运动,要花招。

陈联诗当场向农民弟兄们否认了这件事情,然后层层向上作了汇报。

事情显然闹大了,而且性质也起了变化:由“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可能影响党的威信”,一下子升级为“帮助地主逃避减租退押”,市委组织部那个从苏联回来的一把手说:一个老同志,政策水平这么低,要处分。

陈联诗的处境一下子就起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陈联诗进行“批评帮助”,为了证明她的政策水平真的像领导同志所说的那样低,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年轻同事们搜肠刮肚,“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中最为严重的,最能够从思想根源上和“接受捐地”事件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她却一直和那些身份复杂的“朋友和熟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还积极为他们安排工作!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上级要求组织庆祝游行,六百人的妇女队伍里,居然混进了些伪政府也曾经表彰过的“抗战家属”,你到底和谁穿一条裤子……

陈联诗用她对于生活当然也是对于革命的理解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样的“检查”肯定过不了关,于是“批评帮助”的调子在她的“顽抗”中飞快升级,在极力将之纳入党内斗争轨道的同时,也庸俗

地带上了个人恩怨的色彩。所有的人都在慷慨激昂,他们在这个平时受人敬重的老大姐身上,找到了争当斗争先锋和英雄的新战场。他们把“政策水平”问题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陈联诗身世中最薄弱的环节:本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

可是猛烈的批判和陈联诗自己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组织部一把手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在整个“帮助”的过程中,妇联主任最为坚决,生产部长则最为积极。她组织了一个小班子,专门整理搜集陈联诗的材料,她一直在主持着各种会议,引导着这种“帮助”从深入走向更加深入。并且由她出面,就“劝退”问题去找陈联诗谈话。谈下来的结果自然很简单:陈联诗坚决拒绝。

市委组织部的一把手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蔑视,大发雷霆:劝你退党你还不同意?那就开除!于是派了一名组织科长来到妇联,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到底!

(四)

在事发不过一个月之后,在同志们的震惊中,这个处分决定拿到妇联全体党员参加的支部大会上通过,所有的人对于这个大会至今印象仍很深刻。因为这是解放后的第一次党内处分,而且是处分陈联诗这样的老革命老党员。大会宣读了陈联诗的材料,然后要求就开除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显然有不容质疑之势。陈联诗在大批判的浪潮中为自己辩解,她不能同意“阶级觉悟不高”“阶级立场不稳”等原则性的提法。她说当年我在敌人的刑场上说过:我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任你们横切竖切,我都绝不会投降。我哪一点不像共产党员?再说你们一直不让我作解释,材料中的好多问题都是道听途说……

人们打断了她的话,对她居然敢于为自己辩解而又愤填膺。

一个年轻党员突然发言:我不同意。她叫赖松,也是一个地下党员,解放前夕重庆地区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历来以见解独立而著称。她说凭什

么说陈联诗觉悟不高?人家是二十年代的老党员,和丈夫一起在川北斗争得那么壮烈,丈夫牺牲之后一直孤儿寡母闹革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一直坚持到解放,怎么会是觉悟不高?

市委组织部派来的人冷冷地说:过去的事情不能说明现在。

赖松站起来:你代表谁?你代表组织还是代表你个人?你说话负不负责任?来人沉默。

形势陡转,妇联的党支部书记边涛也站出来说话了(她的丈夫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她明确地向组织部的来人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你是代表组织,可是你也不了解情况。我是支部书记,很多情况连我都不了解,我觉得就凭这样的材料开除一个同志的党籍,很不慎重,我也不赞成。

但这一切反对都没有用,市委已经收到了妇联的“专案小组”整理出来的关于陈联诗的材料。这份材料既没有通过支部,也没有通过党组,由态度坚决的妇联主任直接递到了她的丈夫——市委书记手里。这份材料还递到了西南局组织部长的手里,部长生气地对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说:“看看你们的干部,分明只是革命的同路人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后来说:“这份材料给人的感觉,陈联诗简直就像一个反革命。”

组织部副部长也是地下党中九死一生活过来的干部,他很熟悉陈联诗,可他不能为陈联诗说话,否则就会在当时“地上党”和“地下党”矛盾的大背景中,背上嫌疑。他拿着材料去和其他地下党的同志们商量,最后一咬牙说还是做做工作,让老大姐同意“劝退”吧,“劝退”毕竟比“开除”要强。

陈联诗被停职反省,“组织上”动员她身边所有的人去做工作。陈联诗拒绝所有的“工作”,还对前来“说服”自己的儿女大为光火。可是最后,她不得不屈服在“党组织的决定”之下。在陈联诗遗存的那些底稿中,有一份三百来字的“退党申请书”。在这份底稿和以后写的许多“入党申请书”中,陈联诗很明确的表明她对于要自己退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她认为自己为了党,一生倾家荡产,出生入死,不但献出了亲人的生命,连亲戚朋友都受到牵连。现在革命胜利了,自己又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党却把我一脚踢开,对于那些不实之辞,不听我的任何辩解……她很明确的认为这是妇联主任

和生产部长在计划的“整人”。现在,只是因为上面派来的某某和某某同志解释“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是“为了维持党的尊严和纯洁”,所以自己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这一天,是1952年6月16日。

后来知道:如果她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她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后果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们得到的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一碗饭吃。

于是,所有的功劳都没有了,所有的牺牲都一笔勾销,当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理想实现之际,她被“自己人”变成了一个改造对象。这个战果很快推而广之,一大批老党员因为“跟不上形势”被劝退出去,其中很多都是陈联诗的老战友,包括在迎接解放的起义中担任了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的刘孟伉。

事后有人感叹地说:陈联诗解放后要是不那么积极,她会一点儿事情都没有。

(五)

1953年春天,陈联诗到了重庆市民政局位于郊区小南海的一个妇女教养院。她踩着雾气浸湿的千级石阶,慢慢走向山顶的一座破庙,那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发牢骚,闹事,不听调配,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47名当地农民到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斗争生活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五十好几的陈联诗身心交瘁,她很瘦,经常生病。但她带着这些把自己和男人都不当回事的女人学习《婚姻法》,带着习惯了游手好闲的她们去植树,锤碎石子修公路,还去为她们解决扯筋打架和形形色色的“思想问题”。她在这里工作了一年,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区人民代表。教养院给她写了一份很详细的鉴定,盖上了公章,后

面还很慎重地署上了每个领导的名字,又盖上了他们自己的私章。在陈联诗一再要求下,每个人都给她提了意见,意见中的优点是“党性和组织性极强,阶级立场鲜明。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深入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吃苦耐劳热情积极……”缺点是“常常陷入事务主义,凡事都要亲自过问,批评时应该注意群众的觉悟程度,没有很好的坚持生活制度,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病况和年龄……”这份鉴定中反复用了“党性和组织性”这样的词汇,显然所有的人都把她当党内的同志一样看待,表明了他们对于陈联诗被“劝退”的不理解。她刚来不久,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她已经

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她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教养院的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以后漫长的申请之路就这样开了头。从那时起,她留下了42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底稿,有的平静,有的委婉,有的激愤,有的悲凉。她一直都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也就在这个时期,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妇联生产部长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遭受的斗争场面更加残酷——她被关进了黑屋,没有任何人听她的辩解,不久也被逐出妇联,下到了基层工会。还有一位以激烈的姿态斗争过陈联诗的女人,在陈联诗走后的三个月也被开除了党籍,被送到民政局“改造”。她也爬上了千级石阶,在破庙里住了三天哭了三天,她说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她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陈联诗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说: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她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六)



牡丹图(陈诗联作)

有的人的魅力,会超越他们的政治处境。被妇联“扫地出门”的陈联诗,依然受到很多人的关心。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为她的那些故事着了迷,将她调到重庆市文联的美家协会,陈联诗终于重新拿起了她热爱的画笔,成了一个专业画家。她的画参加过市、省、西南地区和全国的美术展览,还远渡重洋到了国外;她还是市里的政协委员,其间好像文联的党组织也曾经打算过为她解决“组织问题”。可是经历过一次次运动之后,人们的“阶级斗争觉悟”在不断被提高,以至每次重新审查她的档案时,都会发现新的问题。人们发现不但是陈联诗自己的经历很“复杂”,连华蓥山这支队伍也“说不清楚”:游击

队为什么偏偏要去和那些地主“土匪”的队伍联合起来打军阀?为什么不直接打出共产党的红旗,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于是不但游击队的性质无法确定,就连廖玉璧的“烈士”身份也无法确定,陈联诗的党籍也就一直被搁了下来。

可是人们对于她的尊重却有增无减:少先队和青年团来请她去做报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重庆的《红岩》杂志争相发表她的回忆录片断;当年对外宣传重庆的画报,上了她画竹帘的彩色照片;文联还组织人力,记录她的口述回忆录……对她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文人,包括大作家沙汀、艾芜、邵子南,直至后来文化部的两个副部长——茅盾和夏衍。不过最先将她“抢”到自己的小说中的,是地下党中的三个年轻人,其中领头的叫罗广斌。他们多次采访了陈联诗和她周围的人们,先写了一本反映地下斗争纪实性的作品《烈火中永生》,后来又修改成小说《禁锢的世界》,再后来就成了那本在中国掀起了革命英雄主义狂潮的《红岩》。陈联诗在这本书里,变成了一个手持双枪、百发百中的传奇的“双枪老太婆”。

1960年初夏,陈联诗因患恶性淋巴瘤住进医院,文联组织班子对她的革命回忆录进行了最后的抢救。重庆市委专门下了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

救陈大姐的生命。这在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困难的1960年,对于一个受过“处分”又“经历复杂”的老人,算得上特殊中的特殊。那时还没有空调,在盛夏气温可达40度上下的重庆,只有陈联诗的病房里放着降温的大型冰块。她想吃什么就会有什么,有一次她突然想吃葡萄,可一时买不到,一位领导人就命令警卫员到市委小花园的葡萄架上,给她摘下了最好的几串葡萄。

这种声誉在令人们肃然起敬的同时,也令有些人内心受到煎熬。她的床前经常围绕着党政要人,他们安慰她,赞美她,鼓励她和病魔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当陈联诗拉着他们的手,要求解决自己的“组织问题”时,他们才支吾其词或者沉默:革命的过程中有很多问题是不好解决的,其中包括面子问题。

后来,有一个人终于也来看她了,这个人就是原妇联生产部长。此时的陈联诗,癌细胞在全身到处扩散,喉管也因为一次抢救被切开,几乎说不出话来。

生产部长轻轻的走到陈大姐的床前,拉住了她的手。这只手瘦骨嶙峋,手腕上还戴着那只碧色的玉镯,那是当年她的丈夫给她的定情物。

生产部长突然就哭出了声来。那场斗争已经过去十年了,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运动,她终于看清了运动的真相,尝到了被伤害的痛苦,早就开始后悔了。这些年来虽然同在一个城市,她却从来没有去见过陈联诗。她见到许多人都要解释,希望这些人能够代她去向陈联诗解释:自己在表决开除陈联诗党籍的时候没有举手,真的没有举手,绝对没有举手!“我知道陈大姐恨我,因为是我去找她谈话,要她‘退党’,我那时候太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

陈联诗也在无声地流泪。此时的她已经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她在那些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里表现出来的痛苦、激愤和悲凉全部平息下来,只是安静地看着这个和自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领导”,一生的苦难都流在了这些泪水里——从参加革命到迎接解放的25年里,陈联诗花了11年的时间在找党,没想到找回来的党籍,最后却丢在了这个女人的手里。如果当初没有遇到她,也许自己的后半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她完全可能这样想过,不过这显然很天真。在

以后的岁月里,所有当初斗争过她的人,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别人斗争,这种斗争甚至延续到了她身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闹到几乎亡党亡国的地步——那位组织部的小干事,文革时已经官至西南局的部长,被斗得死去活来,最后患癌症死在了医院里。临死前他拉着陈联诗女婿的手泪流满面:“我对不起陈大姐,也对不起你们一家人……”而那位生性强悍的妇联主任,终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斗死的正部级干部。她陈联诗,不过是比别人早走了一步而已。

陈联诗是一个爱憎都很强烈的人,她知道对于一个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让他的心灵得不到宽恕,永远在痛苦中煎熬。眼前的这个女人,让陈联诗活生生地撞死在自己的理想之墙面前,只要给她一个怨恨的眼色,就会让她的灵魂永世不得安宁。

可是陈联诗却默默地取下了手腕上那只碧色的玉镯,要将它戴到生产部长的手上。

生产部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完全没有想到老大姐会这样。我知道她虽然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却一直保留着书香世家的修养和鉴赏水平,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我吓坏了,连忙拦住她,说陈大姐我不能要,你留给你的宁君吧。陈大姐着急了,她说不出话来,只是给我比划,意思是宁君她有一只,这只一定要给我。她拉住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才给我戴上了,我……”她已经泣不成声。

生产部长一直把那只玉镯包在一块精致的手帕里珍藏着,后来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了,一直没有下落。这只玉镯是一个吉祥物,它带走了所有的仇恨,最后归于虚渺;它让这两个被党内斗争所伤害和利用的女人,灵魂在忏悔和宽恕中得到了升华。

1960年7月21日,陈联诗让人代她写下了最后一份“入党申请书”,即第42份入党申请书。第二天,她在安静的蝉鸣中,乘鹤远去。

1982年8月16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一篇重要文章中郑重宣布:为地下党老党员陈联诗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她“退党”的时间,整整30年零两个月。

(责任编辑 李晨)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

● 思源

人民政府要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

一、历史和现状：财政对民生投入太少

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提高国家财政投入民生的比重，打造民生财政，需要先了解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结构。

请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见 P13 表 1）

这张统计表暴露出两个问题：

1、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

2、从 1982 年到 2005 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 36 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 76 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列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注 1〕}

德国(1998 年)	2.7%
埃及(1997 年)	3.1%
英国(1999 年)	4.2%
韩国(1997 年)	5.1%
泰国(2000 年)	5.2%
印度(2000 年)	6.3%
加拿大(2000 年)	7.1%
俄罗斯(2000 年)	7.6%
美国(2000 年)	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 年)	25.7%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各级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未来设想之一：取消公务员职务消费，节省行政费 5000 亿元

要建立民生财政，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钱从何来呢？在现有的财政总盘子中，显然要改变财政支出结构，从削减不合理的行政管理费中挖掘财源。其中来源之一就是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预计可以省出 5000 亿元。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 4000 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 2000 亿元左右、公费出国 3000 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 9000 亿元左右。^{〔注 1〕}尽管每年“两会”上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慷慨陈词，新闻媒体口诛笔伐，而公款不合理消费的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据统计，2004 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 400 万辆，年费用 4085 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 20% 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 年 10 月 25 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超越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 7 天行程：

10 月 1 日，局长好朋友儿子结婚，老黄到

[表1]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统计表

货币单位: 人民币 亿元; 比重: %

年 份	财政支出总额		行政管理费		文教科学卫生 社会保障支出		经济建设费		国防费		其他支出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金额	比重
1982 ^a	1964.51	100	1229.98	62.61	734.53	37.39	134.99	6.87	90.84	7.39	44.15	6.01
1983	2285.33	100	1409.52	61.68	875.81	38.32	141.92	6.21	103.08	7.31	38.84	4.43
1984	2815.76	100	1701.02	60.41	1114.74	39.59	185.12	6.57	139.80	8.22	45.32	4.07
1985	3379.28	100	2004.25	59.31	1375.03	40.69	235.79	6.98	171.06	8.53	64.73	4.71
1986	3783.28	100	2204.91	58.28	1578.37	41.72	301.40	7.97	220.04	9.98	81.36	5.15
1987	4102.93	100	2262.18	55.14	1840.75	44.86	335.77	8.18	228.20	10.09	107.57	5.84
1988	4636.48	100	2491.21	53.73	2145.27	46.27	406.55	8.77	271.60	10.90	134.95	6.29
1989	5326.88	100	2823.78	53.01	2503.10	46.99	540.01	10.14	386.26	13.68	153.75	6.14
1990	5790.65	100	3083.59	53.25	2707.06	46.75	601.66	10.39	414.56	13.44	187.10	6.91
1991	6478.88	100	3386.62	52.27	3092.26	47.73	635.29	9.81	414.01	12.22	221.28	7.16
1992	7392.10	100	3742.20	50.62	3649.90	49.38	739.09	10.00	463.41	12.38	275.68	7.55
1993	5956.60	100	4642.30	77.94	1314.30	22.06	1004.12	16.86	634.26	13.66	369.86	28.14
1994	7503.01	100	5792.62	77.20	1710.39	22.80	1401.48	18.68	847.68	14.63	553.80	32.38
1995	9154.98	100	6823.72	74.54	2331.26	25.46	1739.05	19.00	996.54	14.60	742.51	31.85
1996	11775.87	100	7937.55	67.41	3838.32	32.59	2439.64	20.72	1185.28	14.93	1254.36	32.68
1997	11919.10	100	9233.56	77.47	2685.54	22.53	2639.04	22.14	1358.85	14.72	1280.19	47.67
1998	13716.49	100	10798.18	78.72	2918.31	21.28	3188.55	23.25	1600.27	14.82	1588.28	54.42
1999	16326.81	100	13187.67	80.77	3139.14	19.23	3836.73	23.50	2020.60	15.32	1816.13	57.85
2000	19415.51	100	15886.50	81.82	3529.01	18.18	4993.31	25.72	2768.22	17.42	2225.09	63.05
2001	22752.58	100	18902.58	83.08	3850.00	16.92	6012.49	26.43	3512.49	18.58	2500.00	64.94
2002	25884.15	100	22053.15	85.20	3831.00	14.80	6756.32	26.10	4101.32	18.60	2655.00	69.30
2003	28806.31	100	24649.95	85.57	4156.36	14.43	7527.81	26.13	4691.26	19.03	2836.55	68.25
2004	32838.62	100	28486.89	86.75	4351.73	13.25	8655.78	26.36	5521.98	19.38	3133.80	72.01
2005 ^b	39172.76	100	33930.28	86.62	5242.48	13.38	10378.44	26.49	6512.34	19.19	3866.10	73.75
2006	-	-	40422.73	-	-	-	7571.05	-	-	-	10846.20	-
历年累计	293178.87	-	269086.94	-	64514.66	-	72401.40	-	46225.00	-	26176.40	-
末期为 基期的 倍数 (b/a)	20	-	28	-	7	-	77	-	72	-	88	-
备注:												
1、行政管理费比重按预算内、预算外、总计分别计算, 其余比重均以财政支出总计为基数计算;												
2、参考文献: 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卷第243、248页, 2007年卷第281、296页。												

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中秋节将至,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注2]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

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这种公车腐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激化我国党政官员与普通百姓矛盾的“导火线”,成了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公敌”。可以说,这种公车腐败之弊,上上下下有目共睹;至于如何改革,则意见大相径庭。

如果能站在关注民生的角度看问题,公车改革的思路我以为并不难理顺,关键就是两条:

第一,为了民生,必须从根本上禁止官员化公为私、公车私用。

第二,领导干部专车制度,是导致公款私车制度的捷径,不能不取消。

循此思路,我斗胆提出一个公车改革方案供政府与读者朋友参考。

这个改革方案要点有五:

一、除军队系统以外,同一城市的所有公务车组编为三类出租汽车公司,均按企业运营,价格与当地其他出租汽车公司相同。其中,A类公司为机关内部服务,同时保留部分特殊管理办法;B类公司面向社会服务;C类公司兼顾机关内外服务,根据机关内公务用车的需求情况灵活调度。

二、公务员因公务用车,既可以乘机关出租汽车,也可以乘社会出租汽车。

三、A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优先安排因公用车,并保留必要数量的备用车以应公务急需。任何人以任何原因用车均须按规定付费。

四、公务员因公乘车付费后,由本机关按财

务制度审核报销;因私乘车的费用一律自理。

五、取消各级领导干部专车制度,领导干部公出,由公司调度安排备用车;公出结束,备用车仍归公司调度管理。

这个车改方案将机关公车改为企业化运营,公务用车绝大部分社会化,既能保证公务员工作用车的需要,又能杜绝公务员私占公车,同时可以大大降低机关公务车保有量,从而节省出大量资金用于民生。

《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报道,据了解,甘肃省一个县的公务用车少则89辆,多则362辆;要养活全省公务用车,一年花费8.07亿元。公务车每公里成本费6至8元,是市场成本的8至10倍,使用效率只有市场运营车辆的十分之一。

依此计算,按照市场运营车辆的成本效率指标管理,按照我国现有公车400万辆、每年费用4000亿元计算均可削减90%,只需10%。在改革过渡阶段,即使打上1倍的保险系数,最多也只要保留20%就足够了。

总之,仅仅公车管理制度改革这一项,只要动真格,从公车消费的4000亿元中每年可节省出3000亿元是有把握的。这笔巨款投入民生,可就是民生财政的第一桶金啊!

那么,民生财政的第二桶金该从哪儿挖出来?毫无疑问应指向花在吃喝上的那几千亿元公款。

请看,全国公款吃喝开支的攀升账。^[注3]

1989年	370亿元
1990年	400亿元
1992年	800亿元
1994年	1000亿元
2002年	2000亿元

2003年以来每年的公款吃喝是多少呢?据有关资料,已达3000亿元左右。

公款吃喝最初还有限制,叫做“四菜一汤”,后来变成了“四盆一缸”,再后来,一桌酒席有的花费数千元、上万元公款也在所不惜。如今更大有发展:“凡客必请,凡请必吃;来者必陪,陪必高档。”有的餐前有康乐休闲,餐中有歌舞伴唱,餐后还有娱乐按摩。因此,公款吃喝后面还得加“玩乐”二字才般配。

什么叫职务消费?我看这些都应叫特权消费。

一个人担任了某个职务,于是乎他个人的吃喝玩乐用车用房便都由公款支付,而且职务越高,公款消费的权力便越大,这不就是赤裸裸的特权消费吗?这种“职务消费”,最终可能引起天下不平、天下不稳,实在是社会和谐的天敌!因此,我主张对这种职务消费坚决予以取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条社会常识——崇尚公私分明。而我们这种所谓的职务消费恰恰就是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损公肥私,是有损于执政党光辉形象的。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天天讲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搞这种职务消费就不能为人民服务吗?不占用公款吃喝玩乐就不能开展工作吗?

公款吃喝的问题,我以为只需两项措施就能管住:

第一,建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

现在推行电子政务,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建议设立公款消费公示制度,凡是用公款消费(包括吃喝等项)的账单,逐日全部在各级政府的网站上向全社会详细公布,比如说,招待者(一律自己付费)和被招待者的姓名、单位、职务,所点主食、副食、饮料、烟酒的数量与价格以及就餐地点等等。这些信息可以成为感兴趣的网民、选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质询、举报的线索,负责报账的财务部门及其主管领导要定期接待有关人士的查询或举报。这项措施不是很麻烦,代价不大,却有利于培养广大公民的主人翁精神,有利于增强公务员的公仆意识,改善政府形象,刹住公款吃喝风。

第二,实行份饭制,规范公务接待。

现在工作餐有些花钱如流水,难以节制,与就餐方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今后无论内宾、外宾和陪餐者,一律采用份饭制。每人一个托盘,每盘一盒饭一盒菜一盒汤。对于有特殊饮食习惯的人(如忌辣者、忌猪肉者或彻底的素食主义者)可以适当调节食物品种。饭量太大的人可以加点饭,绝大多数人都能吃饱,以利工作。个别未能尽兴者,可以晚上回家放开来享受。

我们传统的聚餐方式是合餐制。8—10个人一桌,8—10道菜,乃至十多道、二十多道菜层出

不穷,既不卫生,也不节约,更不利于减肥。当然,在非公务就餐时,究竟采用份饭制还是合餐制,可以自由选择;但是凡动用公款就餐,应一律规定为份饭制。这对于端正党风、政风,对于改善民生,都是大有裨益的。

总之,改变财政支出结构,取消公务员不合理的职务消费,从公车消费中至少省出 3000 亿元,从公款吃喝中至少省出 2000 亿元,仅此两项就能抠出 5000 亿元白花花的银子,投入民生领域,成为民生财政的重要来源。

未来设想之二:财政资金退出竞争性产业,可削减经济建设费 5000 亿元

当今世界各国,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能都是对国民收入进行第二次分配。所谓第二次分配,就是在市场经济按生产要素进行第一次分配之后,政府通过征税,形成自己的财政收入;然后通过财政支出,把钱主要用于发展教育事业、改善医疗卫生、维护社会安全、扶贫救灾,使公民无论贫富都能享有基本的生存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等等,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收入、促进社会和谐的目标。这正是政府的主要职责。政府的任务不是生产,生产是企业和企业家的事情。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应由企业自身积累或通过资本市场去融资,不能找国家财政要钱。国家财政不能以生产性支出为主,只能围绕人民生活、社会保障来安排支出。这就是民生财政的意义所在。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偏离了世界潮流,财政部被当成了“建设部”。据《中国统计年鉴》,从 1982 年到 2005 年,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里,每年财政预算中最大的支出都是经济建设费(主要用于国有经济主管部门事业费、国有企业增拨流动资金、技术改造资金以及基建投资),这一项费用比救灾费、抚恤费、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文教、科研、卫生等经费的总和还要高出 32%!对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过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的这种大量投资,严重挤占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发展资金。

为此,我曾于 1995 年 9 月 21 日在武汉大学演讲和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中呼吁:“国有制比重

非降不可。”^[注 4]我提出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办法主要是国有资金保留于少量的公益性产业,而从大量的竞争性产业退出。众所周知,竞争性产业固有的经营风险甚大,政府不应将全国纳税人血汗钱形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竞争性产业中去冒险。

竞争性产业经营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不妨列表来看:(见 P17 表 2)

表 2 如此令人痛心疾首地宣告:在这长达 16 年的时间里,全部国有工业的亏损率每年都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亏损企业累计亏损 11110.5 亿元,比非国有企业的累计亏损总额 7532.7 亿元高出 3577.8 亿元,而其盈利企业的盈利总额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却低了 4895.5 亿元。这一盈一亏综合计算,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低了 8473.3 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在 16 年中还吃进了国家拨给的“经济建设费”累计总额 7 万多亿元。

这张表同时令人振奋地宣告: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在 1990—2005 年这 16 年中,在没有吃国家一分钱财政补贴的情况下,创造利润 3 万多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 100 多万亿元(见 P18 表 3),2006 年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 68.8%,三分天下已经超其其二!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前途持乐观态度,恰恰就是建立在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发展速度快、效益高,已经占据主体地位这样一个客观基础上。

当我们欣喜地看到非国有企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巨大作用时,我们也不能不痛心地承认:每年向国有企业的巨额注资,成了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拖住了全国人民改善民生的后腿。

正因为如此,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都明确提出了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并不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竞争性产业中,要实行“国退民进”的战略。也就是说,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产业;同时鼓励民办企业向竞争性领域发展;通过多种方式,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逐步改制成为股份制企业或私有企业。

从 1998 年起,中国就向全世界宣布要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财政”,这是一个很大的进

[表2]

中国工业企业盈亏对比表

货币单位: 人民币 亿元

年 份	国家财政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净盈利比较		亏损率比较	
	拨 付	(1) 亏损企业 亏损总额	(2) 盈利企业盈 利总额	(3) 净盈亏	(4) 亏损率 %	(5) 亏损企业 亏损总额	(6) 盈利企业盈 利总额	(7) 净盈亏	(8) 亏损率 %	(9) 非国企高于国企	(10) 国企高于非国企 (百分点)			
1990	1368.0	348.8	388.1	39.3	89.9	104.9	171.7	66.8	61.1	27.5	28.8			
1991	1428.5	367.0	402.2	35.2	91.2	108.5	240.6	132.1	45.1	96.9	46.2			
1992	1612.8	369.3	535.1	165.8	69.0	99.8	437.3	337.5	22.8	171.7	46.2			
1993	1834.8	452.6	817.3	364.7	55.4	186.3	785.2	598.9	23.7	234.2	31.7			
1994	2393.7	482.6	829.0	346.4	58.2	289.9	967.8	677.9	30.0	331.5	28.3			
1995	2855.8	639.6	665.6	26.0	96.1	559.0	969.3	410.3	57.7	384.3	38.4			
1996	3233.8	790.7	412.6	-378.1	191.6	640.6	1077.1	436.5	59.5	814.6	132.2			
1997	3647.3	831.0	805.0	-26.0	103.2	755.9	898.5	142.6	84.1	168.6	19.1			
1998	4179.5	1150.7	525.1	-625.6	219.1	586.2	933.0	346.8	62.8	972.4	156.3			
1999	5061.5	966.7	997.9	31.2	96.9	496.9	1290.3	793.4	38.5	762.2	58.4			
2000	5748.4	704.3	2408.3	1704.0	29.2	431.8	1985.2	1553.4	21.8	-150.6	7.5			
2001	6472.6	752.2	2388.6	1636.4	31.5	458.8	2344.8	1886.0	19.6	249.6	11.9			
2002	6673.7	668.5	2632.9	1964.4	25.4	463.1	3151.6	2688.5	14.7	724.1	10.7			
2003	6912.1	678.0	3836.2	3158.2	17.7	479.8	4501.0	4021.2	10.7	863.0	7.0			
2004	7933.3	836.7	5453.1	4616.4	15.3	911.2	6476.2	5565.0	14.1	948.6	1.3			
2005	9317.0	1071.8	6519.8	5448.0	16.4	960.0	8282.7	7322.7	11.6	1874.7	4.8			
历年合计	70672.5	11110.5	29616.8	18506.3	37.5	7532.7	34512.3	26979.6	21.8	8473.3	15.7			

备注: 计算公式 (3)=(2)-(1), (4)=(1)÷(2), (7)=(6)-(5), (8)=(5)÷(6), (9)=(7)-(3), (10)=(4)-(8);

参考文献: 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第281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年第22、23页。

[表 3]

中国工业经济所有制结构统计表

货币单位：人民币 亿元

年份	合 计		国有工业		非国有工业	
	金额	比重 %	金额	比重 %	金额	比重 %
1990	23924	100	13064	54.6	10860	45.4
1991	26625	100	14955	56.2	11670	43.8
1992	34599	100	17824	51.5	16775	48.5
1993	48402	100	22725	46.9	25677	53.1
1994	70176	100	26201	37.3	43975	62.7
1995	91894	100	31220	34.0	60674	66.0
1996	99595	100	36173	36.3	63422	63.7
1997	113733	100	35968	31.6	77765	68.4
1998	119048	100	33621	28.2	85427	71.8
1999	126110	100	35571	28.2	90539	71.8
2000	85674	100	40554	47.3	45120	52.7
2001	95449	100	42408	44.4	53041	55.6
2002	110776	100	45179	40.8	65597	59.2
2003	142271	100	53408	37.5	88863	62.5
2004	201722	100	70229	34.8	131493	65.2
2005	251620	100	83750	33.3	167870	66.7
2006	316589	100	98910	31.2	217679	68.8
历年合计	1958207	100	701760	35.8	1256447	64.2

备注：1、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 年以后的“非国有工业企业”仅仅统计其中年产品销售收入在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的“限额以上企业”，而占非国有工业总产值 60%的限额以下的企业均未列入统计资料；

2、参考文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2007 年卷第 501、512 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 年卷第 18、21 页。

步。但是，“公共财政”不如“民生财政”的概念更清晰，有的地方把政府盖豪华办公大楼作为“政权建设”，也归为“公共财政”的成就之列，实际上与改善民生南辕北辙。近几年适逢计划经济思想回潮，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理论又流行起来，说什么“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命根子”，“要重振国有企业的雄风”，“财政的钱要向国有企业倾斜”。于是乎本可用于人民生活的民生资金继续受到挤压，“经济建设费”继续从老百姓的牙缝里流向国有企业，且流量越来越大。2006 年再创新高，超过了 1 万亿元。这么多宝贵的全民资金没有投向民生，而是流到低效率的国有经济无底洞中去了。

还能这样年复一年地往无底洞里扔钱吗？不行！要真正“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就必须当机立断，根治众所周知的积弊——“建设型财政”，认真打造众望所归的“民生财政”。我建议将“经济建设费”削减 60%，转为“民生资金”。在这项改革起步时可以稍稍放宽一些，以 2006 年经济建设费 10734.63 亿元为基数，先削减一半，省出 5000 亿元来。

未来设想之三：将节省下来的一万亿元投向民生

根据前面的研究，通过一定的改革措施，将每年财政支出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削减，节省出一万亿元资金，是完全可行的。其中主要包括以下三笔：

- 公车消费 4000 亿元，削减 3000 亿元；
- 公费吃喝 3000 亿元，削减 2000 亿元；
- 经济建设费 10000 亿元，削减 5000 亿元。

节省下来的这一万亿元财政资金应全部用于民生领域，可以考虑大致作如下分配：

第一、将公车消费削减的 3000 亿元，划拨成公共卫生经费。

这 3000 亿元应主要投向以下四个方面：

- (一)、300 亿元，用于疾病预防与控制；
- (二)、2200 亿元，用于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 (三)、200 亿元，用于补贴医疗保险；
- (四)、300 亿元，用于建立医疗急救基金。

现在的关键是，从每年 4000 亿元以上的公车消费中砍下 3000 亿元，虽然在客观可能性上

没有问题,但从公务员的主观方面看,还真是一场艰苦的“思想革命”。它不但要触及部门、单位、个人的既得利益,而且也涉及公车制度改革后如何适应新秩序,安排好工作。这项改革没有权威的领导不行,没有领导人以身作则更不行。我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成立一个“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或国务院副总理级的公务员担任组长。

以往我们抓中心工作的领导小组往往是“单打一”,而“医疗卫生与公车管理改革领导小组”则不能不“双肩挑”,两项任务直接挂钩。要搞好医改,有许多工作要做,条件之一是要增加财政投入;而要增加这一部分投入,就不能不减少另一部分开支,不能不向积弊甚多的公车消费制度开刀;如果这一刀开不好,医改的经费投入依然是“千呼万唤上不来”的;医改落实不了,不仅有害于亿万老百姓,而且也有损人民政府及执政党的公信力。砍公车消费,增医改经费这一战役,可以说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和公务员素质,真正为人民办实事的一场重大考验。凡是在公车改革中表现不自觉的公务员,在今后公务员改选或改聘时,应属被淘汰的优先对象。

第二、将经济建设费中削减的 5000 亿元,追加于社会保障体系。

这 5000 亿元分作两部分使用:

(一)追加财政预算教育经费 3000 亿元。

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即公共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本世纪末达到 4%。但 2000 年这一指标实际上只达到 2.58%,而那年全世界平均水平是 4.04%。^[注 5]

按 2007 年《中国统计年鉴》正式公布的 2005 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 5161 亿元,占当年 GDP183867.9 亿元的 2.8%,如果追加这 3000 亿元,则财政性教育经费共计达到 8161 亿元,占 GDP 比例则为 4.44%。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一举实现久攻不克的 4%的目标,还略有富余,可以在此基础上去追赶 2003 年的世界平均水平——4.7%,稍稍有益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形象。

(二)5000 亿元中还剩 2000 亿元,初步考虑可以用于社会保障的以下 8 个方面:

1、增加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 4 项基金共计 600 亿元;

2、适当扩大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追加费用共 400 亿元;

3、适当增加抚恤金 100 亿元;

4、追加社会救济福利费 300 亿元;

5、追加就业服务机构经费 100 亿元;

6、追加救灾支出 100 亿元;

7、对工人(含农民工)进行常规职业培训费用 200 亿元;

8、为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准备 200 亿元。

第三、将公款吃喝中削减的 2000 亿元分作两部分,其中:

(一)中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刚刚开始建立,资金筹集几乎从零开始,应安排 1000 亿元。其中用于廉租住房制度 500 亿元,用于经济适用住房制度 500 亿元。

(二)最后 1000 亿元追加投入环境保护领域。我国 2006 年环境保护和城市水资源建设支出总共才 161 亿元,实在是太少了。环境问题危机四伏、欠账甚多,亡羊还需补牢。

简而言之,10000 亿元分成三大块:

第一,公车消费节省 3000 亿元,给医疗改革;

第二,给国有经济的投资节省 5000 亿元,给教育和社会保障;

第三,公费吃喝节省 2000 亿元,用于环境保护和保障性住房制度。

我这个办法也可以叫做在财政支出总额既定的情况下,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道理在于东墙该拆,西墙当补。

[注 1] 2007 年 8 月《领导者》杂志第 17 期

[注 2] 见“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注 3] 《城市管理》2005 年第 6 期第 13 页

[注 4] 参见拙著《国企改革,绕不开的私有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 年版

[注 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际统计年鉴——2006/2007》第 372 页

(作者系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责任编辑 吴 思)

社会主义本质： 一句话的变迁

● 刘济生

本质是事物的根本规定性,是一事物区别他事物的根本特征,是系统内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本质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规定,是区别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特征,影响社会主义一系列的问题,决定社会走向。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一个系统:既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又要反映上层建筑;既反映政治关系,又反映经济关系。

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表述应该满足两个要求:一个是在科学的层面上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二是在语言层面上要简洁明了。意即:一是对社会主义作出关键的概括,不超过一两个、两三个观点,如果说出了一系列的观点,那就不是本质的概括,而是对社会主义系统本身的说明了。二是在语言上高度精练,不超过三两句话。如果三两句说不清楚,达不到精练程度,也不符合对研究对象的本质说明的要求。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两次论述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是非常简洁的,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见解。第一次是19世纪40年代,第二次是恩格斯晚年。第二次扬弃了第一次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把所有制看得特别重要。认为,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得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已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¹⁾这个表述符合上面两条要求,即观点不超过一两个,只有两句话。马克思恩

格斯还说道:

共产主义者完全正确地强调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要求。⁽²⁾这句话依然符合上述两条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还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是盲目的、无政府的,这就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各个产业之间、各种产品之间所需要的比例关系。只有通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达到平衡。消灭私有制以后人们就可以自觉地进行计划,自觉地保持比例关系,经济危机就会消除,这就是计划经济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他们又一个命题是:

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³⁾这句话也是符合上述两条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就可以取消商品生产,不需要价值规律来配置资源,而是实行全面的经济计划。“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这句话就是概括了未来社会的本质。“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将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几万万人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大机器”。没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和社会主义理想背道而驰的。

作为公有制的附属物,这个理想的第三项内容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按劳分配是指“生活资料”,因为生产资料已经公有了,没有其他的分配问题了。马克思认为:“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⁴⁾

到了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发生了变化。

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也不断地深化。本来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⁵⁾这句话，一直被所有的共产主义者所忽视。万万没有想到，恩格斯在 1894 年 1 月 9 日致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请求，摘下了这段话作为答复。他说：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上面这句话，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既然这一句话就是表达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当然是本质问题了。显然这是恩格斯晚年对自己青年时期提出消灭私有制观点的修正。这离他去世一年，应该是他的最终政治遗言。

马克思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和显著特征，也是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

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为他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⁷⁾就是说，共产主义也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阶段，不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形式，唯一模式，而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梯，一个发展的平台。人类最美好的阶段是人的自由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发展。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交待清楚：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没有引起后来人的足够重视；恩格斯没有直接否定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废除私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的基本观点。那个时候，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还没有实践、发现完全公有制、高度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的弊端，所以，恩格斯没有断然否定这几个原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恩格斯既然提出了新的看法，说明他扬弃了自己和马克思青年时期的看法：消灭私有制。

二、列宁和毛泽东对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坚持

列宁把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列宁说：“没有全社会严格遵守的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

⁽⁸⁾列宁还指出：“计划要具有立法的职能，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应具有立法的性质。”⁽⁹⁾“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¹⁰⁾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基本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质论。他在苏联这个大国实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 1928 年开始，1936 年完成，基本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消灭私有制的设想。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框子。他在 1953 年就急急忙忙准备了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根本没有耐心等待三个五年计划结束，而是提前在 1956 年完成。工业上的计划经济是 1953 年实行的，农业上的计划经济是 1958 年实行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基本上是 1956 年实现的。为了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不断通过反右倾，抓阶级斗争，促使其实现。毛泽东 1975 年提出了学习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八级工资和旧社会差不多，对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极其热衷。

以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实践者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实践上的。从俄国革命胜利之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为行动的根本指南。请注意，按劳分配是公有制的派生物，可以说是两个观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践了几十年，实践对这个理论进行了验证与回答：全盘公有制是行不通的，公有制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有它的生命力。计划经济也是不能用得过分，只能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分配方式更不能单一化，而是根据不同的所有制采取不同的分配方法。

三、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有两次论述，而不是一次。人们只是把邓小平 1992 年春南方谈话

算作是谈社会主义本质了,原因是邓小平直接说明是“社会主义本质”了。其实早在1979年3月邓小平就概括而精练地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对于本质的概括的要求:观点集中,谈一个观点;语言精练,只有两句话。这时中国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中走出来,那么多人还没有完全平反昭雪,生产的发展也受到缺乏民主的影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是至理名言。

列宁也说过:“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2]列宁、邓小平都说到这个精练的程度了,民主不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一吗?

邓小平在1985年说过:“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3]请注意,这里邓小平使用了“最重大的”这么几个字,这就是本质的一种表述了。

不发展生产力,就不可能最终解决社会公正,消除两极分化,发展社会民主;没有社会公正,出现两极分化,发展生产力也困难,实现民主政治也难;没有解决好民主,就不可能解放生产力,也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如果社会主义本质只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没有上层建筑,肯定是残缺不全的。

从实践上看,没有民主的这个本质规定,社会主义就难以实现。1978年,因为恢复了党内外民主,农民才敢于联产承包,才敢于自发地搞分田到户;万里才敢于在地方上大力支持包产到户;没有民主,邓小平、陈云也不可能在中央支持包产到户。民主带来了农民的创制,他们不会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创制的。

1992年春,离开1989年那场风波刚刚过去两年多一点,党内存在一种思潮:冲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左”的思潮,认为反对和平演变,抓阶级斗争是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这次论述还回答了一个群众关心的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是就具体历史情况而谈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这是针对这种在影响整个社会的思潮的评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发表后,立即传遍了全国各地,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被编进了大中

学教科书。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论述,和过去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相比较,体现了“三个没有,一个突出”。

“三个没有”是:没有公有制的标准,没有计划经济的标准,没有按劳分配的标准。突出了一个问题:发展生产力问题,即生产力标准。“三个没有”体现了邓小平的创造性。对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邓小平在社会主义本质内容里面没有提及。原因是邓小平认为这三个条件没有反映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那么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否定这三个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社会主义的内容之一。没有说是本质不等于全盘否定,不等于不重视。邓小平在其它地方提出过公有制为主体的问题,提出过社会主义也有计划,但没有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重要的内容不等于本质的内容。

邓小平的“三个没有”,体现了解放思想的新社会主义观。1980年他就说过:“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5]如果不解放思想,继续在过去的框子里思考问题,不可能提出没有公有制、没有计划经济、没有按劳分配的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观。传统社会主义的要害是这三点。而新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一点是发展生产力,要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都想过穷日子,谁还向往社会主义?

“一个突出”是突出生产力标准。生产力标准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人们的物质财富从长远的历史看是趋于一致的。邓小平把推动生产力进步分为两个,一个是解放,一个是发展,实质是发展。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虽然富有不一定是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必须不是贫穷的。

其中邓小平提出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个是生产关系的方面的内容。完完全全消灭剥削在现阶段是空想。1949年刘少奇天津讲话提出了“剥削有功”,其实在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阶段,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雇工的出现,当然出现了剥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剥削是难以完全消灭。而消除两极分化,控制基尼系数则是有可能的,它是社会公平的要求,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在恰当的体制的运作之下,是完全有可能避免两极分化的。

目前我国两极分化是严重的。199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超过美国。这点作为社会主义本质怎样看,它是邓小平提出的民主问题。解决了民主问题,就容易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解决不了民主问题,就很难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民主是前提,而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结果。在民主不充分的情况下,少数人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权力寻租就不可避免。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民主解决的好,他们的基尼系数就比较低。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表述需要进一步完善

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社会主义本质必须有民主的内容。任何理论都不是一次表述完成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也不是一次完成的。“三个有利于”、市场经济理论也不是一次提出和完成的。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来不断丰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加进了“解放思想”的内容,90年代又加进了“与时俱进”的内容,新一届党中央又加进了“求真务实”的内容,今后有可能还加进新的内容。所以说,社会主义本质完全可以加上新内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因为加进了新的内容而被人们忽视或曲解,反而更准确,更符合时代要求,更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有三个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经济层面上,生产力要发展,经济关系要公正;政治层面上,上层建筑层面上要民主政治。邓小平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没有鲜明的民主政治诉求。这并不是邓小平不重视民主政治,而是针对性不同。

民主不充分,就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在全球各大国排名第一,就是因为我们的民主法治还有好多不健全的地方。我们的民主法治不健全,才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钱权交易寻租现象。所以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是天经地义的。那么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三点内容怎么看?我认为,这里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是一层意思,后面三句话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一个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民主可以

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两个层面的要求体现出来。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离不开民主和生产力的发展和消除两极分化。只讲民主,缺少发展生产力不完全,只讲发展生产力,不讲实现民主也不完全,三者都讲才更完善。

马恩的关于“人的自由发展”是未来社会的本质的论述,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进了我们的教科书。我们当然可以用恩格斯晚年的观点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但是,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今天怎么具体操作会有困难。我以为把恩格斯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结合起来最好,但是怎样结合也是个问题。恩格斯是从哲学上说的,而邓小平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政治上说的。硬结合存在困难,一是把不同层次的概括放在一起,不伦不类;一是层次太多了,不符合关于本质的语言要求。所以还是分别表述为好。我们只能以恩格斯的观点作为一种哲学和理念,用邓小平的观点来具体化。恩格斯的观点精神性强,邓小平的观点操作性强,结合起来可起到互补的作用。

综上所述,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应当体现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具体表述是:发展生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民主。

注释:

-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86页。
-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37~238页。
-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757页。
-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304页。
-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第2版,第294页。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中文第2版,第130页。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文第2版,第131,373页。
- (8)《列宁全集》第3卷,1985年版,第279页。
- (9)《列宁全集》第43卷,1987年版,第344~345页。
- (10)《列宁全集》第3卷,1985年版,第62页。
-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168页。
- (12)《列宁选集》第2卷,1985年版,第782页。
-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版,第116页。
-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版,第373页。
-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版,第312页。

(作者系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部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表达权与解放思想

● 王也扬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又强调要保障人民的表达权。现代国家的公民表达,从形式上可以有语言表达与非语言表达两类,而语言表达与解放思想之间的关系很值得一谈。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述道,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及其表达)成了人类思想形成与进化的“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1页)这样就产生了分节的语言,以及同它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人的思想通常都是用词来表现的,思想一般都存在于语言的外壳中。语言和思想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带有鲜明的社会性。当某个人要把自己的思想告诉另一个人时,他就得用发出声来的词表达思想,使别人能够听到。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表达,也就不可能有人的语言及思想。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语言是意识的直接现实,语言是思想的自然物质。而语言又是表达的工具。胡锦涛总书记也曾风趣地说,人有一张口,是用来说话的。

以上谈了关于语言表达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接着来谈谈语言表达与思想解放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形成的,而新时期有此建树的前提条件,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中的语言可谓振聋发聩,说了人们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自吹自擂证明不了真理,大规模的宣传证明不了真理,强权证明不了真理。”“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与理论……”这篇文章曾经受到有关领导人的指责,认为发表它是个错误。但

恰恰是它的发表及随后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启了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闸门。当时,在要不要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对这场讨论发表公开讲话以表明态度的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结果在邓小平等同志的支持下,各地负责干部陆续表态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奠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政治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反对“两个凡是”的公开的语言表达,怎么可能有其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如果没有在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中不断涌现的新思想新理论,并且得以用公开的语言表达出来,又怎么可能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一段时间以来,有种说法曰:思想探索可以无止境,但语言表达却要有纪律限制。这种说法,貌似正确,其实很有问题。首先是它把思想与表达割裂了开来,我们前已论证:离开了表达,就不会有思想;限制了表达,也就限制了思想,怎么还能有思想探索的“无止境”呢?这是典型的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是欺人之谈。其次,纪律作为组织团体的规矩必须服从国家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见,我国宪法承认,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依法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表达权属于公民基本权利。有些地方的领导人总爱用求稳定作为理由来限制公民的表达权,其实让人家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家说话,则自己难免有一天会垮台,这是至理名言。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我们各级领导应该认真用十七大精神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纠正那些与中央原则不一致的说法与做法。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也是全国人民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只有继续发扬当年真理标准大讨论时那种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勇气,坚持敢于创新、大胆表达、积极探索的态度,才是继续解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才能够把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胜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

● 李树桥

一条值得重视的经验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里,在重大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和政府部门、地方、基层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学界老、中、青年专家学者的创造性意见可以通过各种管道迅速传递到最高决策层;最高决策层很快把其中比较有价值的政策建议批示到党和国家有关部门调查研究,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中央领导同志带着学界与部门的意见亲自深入到省、地(市)、县以及基层厂矿和农村,详细地与地方、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讨论在实践时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发现基层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批转部门与地方领导机关调查研究,交给学界论证。当时的领导人对上述各方面的长处与短处心里有底,对其意见取舍时缜密过滤、慎重筛选,再加上他们自己的智慧、经验和判断,综合起来形成一套比较系统、完整的政策方案。征询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意见以后,经过中央领导机构的正式讨论,依靠集体决策,形成决议颁布实行。

实际上,当时所采取的任何一项方针政策和行政措施,都不是照单全收哪一个或几个专家学者、某个地方或部门所提出建议,都是吸取各方面很多人的意见和建议,是全国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很少遇到可操作性方面的困难,一般都能获得比较好的实际效果。纪念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这一条宝贵经验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邓小平同志率先垂范

邓小平同志大力倡导、推动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就是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部门、地方、基层、学界互动、互促、互补、共创奇迹的典范。大家知道,“经济特区”的设置,就是由习仲勋主持的广东省委首先提出要求并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按照《邓小平年谱》的记载,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两下深圳、珠海,十一次去上海,还多次到福建和其他沿海地区视察,面对面地与地方和基层干部群众座谈,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亲手为我国绘制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沿海地带对外开放的绚丽蓝图。

改革开放的酝酿期,我国曾经派出几个由副总理或中央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带队的政府代表团赴国外考察,回国以后直接向中央汇报,对于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和高级干部达成对外开放的共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中,理论、思想、学术界的广大知识分子更是活跃。他们通过大众媒体发表文章,大力宣传当代世界国际分工国际交换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新趋势的宏观环境,论证利用两种资源、开辟两个市场的必要性,介绍外国实施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经验教训,提供国外设立出口加工区、保税区、自由港的成功范例,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增强改革开放意识起到了启蒙和促进的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我国对外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包含着全国从上到下,各方面、各界人士共同的心血和汗水。

沿海发展战略决策的实证

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酝酿和提出,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实例。在这一决策酝酿过程中,我也算是一个亲历者。当时我在赵紫阳同志办公室任秘书,相关的调查研究和讨论的大多数环节我都在旁边仔细观察了。在当年,领导同志那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科学决策的精神让我深深感动;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让我钦佩。

现在说到当年赵紫阳提出的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有的同志以为是由当时国家计委一位年轻同志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理论引出的。其实,这中间有一些误会。赵紫阳是在1987年11月1日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动态清样》上看到王建同志写的文章《走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当天就做了批示:“印发国务院、中央财经小组同志一阅,并发杜润生、郑拓彬、李岚清同志。”王建同志文章的作用,一是使赵紫阳同志更加坚信他正在研究的问题具有理论依据与符合民意;二是通过对王建文章的批示推动有关部门和更多的同志研究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在收到王建同志文章以前,赵紫阳同志已经决定集中一段时间搞一次专题调查研究。对于随行参加调查的人员、调查的主题、调查时间和地点都已有了初步设想,并与身边工作人员议过两次。那次调查的题目,就是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问题。在这之前,党的十三大还没有召开,赵紫阳就指示我们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体改委、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关于发达国家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以及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材料,供他阅读、研究。这是酝酿已久的事情了。

1987年11月20日,赵紫阳以及随同他外出调查的两位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从北京出发。这两位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国家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李岚清。我是随行服务的工作人员。赵紫阳一行先到广州参加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式,又到井冈山看望那里的老红军和干部群

众,11月23日到达那次调查的第一站浙江省嘉兴市。参加调查的国务院特区办主任何椿霖已经先期从北京直接到达。第二天就在嘉兴市委招待所开始讨论。参加讨论的除北京来的同志以外,还有当时的浙江省委书记薛驹、省长沈祖伦、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省长顾秀莲、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

座谈会紧张地讨论了两天半。赵紫阳首先讲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我国面临的有利机遇,提出要尽快确定一个沿海地区的发展战略。然后就让大家敞开思想,发表意见。在讨论中他还多次插话,阐述自己所做的思考。在讲到外国制定区域政策大多是优先考虑问题地区即落后地区,为什么我们首先研究发达地区的发展时,赵紫阳说,我国内地和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条件差别很大,要把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都同时搞得很快、搞得很富,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对我们比较有利,沿海地区又有很多优势,如果不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和优势尽快把比较容易发展起来的沿海地区发展得快一些,那是很可惜的。沿海的发展最终会带动内地和全国的发展。在讲到为什么要强调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时,赵紫阳说,沿海地区的加工工业,如果只靠国内的原材料,它的发展势必受到很大的限制。随着沿海地区对原材料需求的增加和内地经济的日益发展,如果仍然按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沿海和内地争原料的矛盾势必越来越尖锐,这是行不通的。因此要提倡和鼓励沿海地区到国际市场上去进口原材料,加工增值之后,再把产品销往国际市场,大进大出。

在议论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时,参加讨论的同志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最后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我国沿海一亿多到两亿人口的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向国际市场,进一步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竞争,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座谈会还就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产业问题、沿海工业“两头在外、大进大出”问题、加快外贸体制改革问题、进一步搞活企业机制和加强管理问题、促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加快沿海发展与稳定全国经济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讨论中有几位同志的发言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浙江省省长沈祖伦在谈到沿海发展首先要搞活企业时说,有的同志把大中型企业比作老虎、狮子,把小企业比作猴子,搞活企业经营机制就是要让老虎上山、给狮子松绑、放猴子上树,使大中小企业都能全盘活起来。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说,苏州乡镇企业的出口创汇在整个地区创汇总额中已经占到百分之十五,它们经营机制很活,应该能够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生力军。嘉兴市委书记庄洪泽说,一些外商告诉他,与国外的企业相比,我们的设备比较落后,但更为落后的是管理。赵紫阳当场表扬了他们的看法很有见地,以后又将其中一些精辟的话写进了自己给邓小平同志的报告。沈祖伦同志很幽默,当时他讲,论经商的才干,一个宁波人可以顶三个上海人,一个上海人可以顶三个杭州人。回到北京整理材料,很想把这个话整理进去,再加一句,一个杭州人可以顶几个内地人,以说明沿海地区的人才优势。后来再三斟酌,不好把这些话写进正式报告,才很不情愿地舍弃。

11月26日,在嘉兴市安排了半天参观。参观了两个工厂,赵紫阳边看边与工厂领导人讨论的还是沿海发展战略的问题。到南湖公园参观了中共一大“红船”和其他景点。从公园出来,街上聚集了许多热烈欢迎的群众。赵紫阳走在群众中间,我紧随其后。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大约五十多岁工人模样的同志就在我的身旁跳起来高喊:和十三大记者招待会上的那个赵紫阳一个样!一个样!我坐在车上,回到住处,反复地想:为什么赵紫阳在十三大后的答记者问能够那样深入人心?他的哪些话能够让老百姓记住、感动?想来想去,觉得可能是那样几句话。联邦德国记者问:您认为中国今后的主要问题是什么?赵脱口而出:是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那时候我与那位兴奋得跳起来的工人擦肩而过,来不及攀谈。我主观断定,最使他兴奋和鼓舞的可能就是上面的那一段话。

11月27日从嘉兴去苏州。赵紫阳突然向负责警卫工作的同志提出:一路上既不要警车开道,更不要警车随护,大家就坐一辆面包车,夹在群众的车流中间,老百姓的车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赵

紫阳这么一说,随行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稍微停顿了一下说:那不行!一是这样安全没有保障;二是路上堵车耽误的时间过长。赵紫阳坚持说,路上越张扬,目标越大,越不安全。今天我们的时间就花在路上,到达苏州的时间晚一点没有关系。在赵的一再坚持下,只好按照他说的办法,没有警车,没有车队,就那么一辆面包车,和普通老百姓车子一个样。谁也不知道车里边坐着赵紫阳和那么多领导干部,沿途还在江苏省吴江县的盛泽镇看了三个乡镇企业,其中一个纺织厂,一个成衣厂,一个制鞋厂,三个厂都有产品出口。赵紫阳边看边问它们的厂长:产品出口有什么困难?如果主要原材料从国外进口行不行?因为时间已久,三位厂长当时所说的具体话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概意思是,关键在于加快外贸体制改革。晚上八点顺利地抵达苏州。到达后赵紫阳对随行的同志说:这不是很好嘛!我悄悄地对他说:今天,您胜利了!赵紫阳不说话,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11月28日至29日,在苏州继续召开座谈会。参加讨论的除了嘉兴会议的人员外,又新增了三位同志:在上海调研闻讯赶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海市的两位主要领导同志芮杏文和江泽民。会上,赵紫阳对于在嘉兴讨论的情况做了简明扼要的归纳。然后反复提问:这样的思路行不行?沿海地区实行新的发展战略可能遇到什么大的障碍?怎么解决?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参加会议的同志踊跃发言,有的同志还讲过多次,使得沿海发展战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对于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透彻,拟议采取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充实。在苏州,参加座谈的同志还参观了刚刚筹建的昆山开发区,考察了一个流通企业苏州物资集团。

11月30日,赵紫阳一行顺利地结束了这次为期一周的专题调研,回到北京。12月末到1988年1月初,赵紫阳又赴福建省调查,主题仍是沿海地区发展战略问题。赵到外地调查,当地一般也会把全体领导班子成员集中起来,向他汇报,请他讲话。多数的情况是,地方领导同志的汇报讲不了几句,他就会说,请您把准备好的稿子交给我的秘书,我回去再好好看。然后就按照他本次调查的主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请他们回答,与他们一起分析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结束时也

很少长篇大论的讲话。他下去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是在与地方或基层的同志讨论研究问题。

1988年1月赵紫阳向邓小平呈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1月23日邓小平对该报告做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的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实施我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决定。3月15-19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讨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有关问题。

其后，对外经贸部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全国经贸工作会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对外经贸厅局长参加会议，讨论研究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即逐步赋予部分内贸和工业企业外贸经营权，实行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等问题。我随同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白美清、国办秘书局赵光华到会上听取李岚清的报告和部分地方同志的意见。海关总署讨论制定沿海地区设立保税库和保税区的有关政策问题。交通部研究加强海港建设和发展远洋运输的问题。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为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创造环境、保驾护航。

赵紫阳同志主持制定的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的贯彻和落实，对于我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起到了启动和加力的作用，对于沿海地区的迅速崛起和加快发展起到了奠基和助推的作用。在沿海发展战略的酝酿、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地方、基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对于学界的意见，赵紫阳曾经说，老、中、青学者的意见都要听。他们中有不少人具有世界眼光，思维敏捷，多听他们的意见可以开阔思路。他们的不足是对于实际操作中的矛盾和问题不甚了了。

关于部门和地方的特点，1981年9月4日他在中央财经小组听取国家计委“六五”汇报时说：“现在总的说，中央机关特别是综合部门，对困难这一面，基本上是看到了。但对存在的潜力，往往估计不足。省市区的同志对潜力看得比较多，但对宏观制约看得不够。综合部门也有两点。一个最后要听取他们的意

见，因为确实他们考虑问题比较全面。另外，因为他们也处在改革中间，有些问题有些框框，要研究新情况，就是说，有些东西不跳出原来的框框不行。”赵紫阳同志一再强调，学界、部门、地方、基层的意见都要充分尊重，尽量吸取，这是保证中央正确决策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学界研究成果最受领导重视、知识分子为社会发展贡献很大的一个时期，是各级领导干部贯彻中央政策比较顺畅、实际效果甚佳的一个时期，是老百姓普遍受惠、对党和政府比较满意的一个时期。那个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良性互动，共同为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做贡献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很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

（责任编辑 徐庆全）



2008年第3期目录

书屋讲坛	华美狼心	
	——金庸作品暴力的分析	祝 勇
	“迷人”的法西斯	
	——被利益交换的权利	赵 刚
灯下随笔	道理与真理之间	启 良
	漫议“宽容”	柳士同
	致易中天先生	
	——谈君子、小人与人性	解正中
人物春秋	赫鲁晓夫在中国	钱伯城
说长论短	非基督教运动中的知识分子	吴茂华
	对“列强”要具体分析	邵 纯
思史佚篇	祥瑞是“讲”出来的	鸣 弓
	天下皇帝	张志东
	从一本万利到血本无归	王 明
	“独尊儒术”的背后	刘绪义
书屋品茗	此一时，彼一时	
	——读“文革”出版的批孔书	胡松涛
	罗曼·罗兰评论过鲁迅	陈福季
书林折枝	内省的精神之美	朱 冰
	亦有作家舞画笔	
	——读《名作家的画》	薛 冰
湖湘人物	黎烈文与《申报·自由谈》的革新	康化夷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

● 鲁利玲

近年来,我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时常听到老人们提起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平反过程,但很少有人涉及天安门事件本身。作为这一事件的亲历者,我觉得有责任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轨迹,以使后来者能够从一个侧面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历史背景。

一、我是怎样走向天安门广场的

和同龄人一样,我是在“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的时代氛围中长大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当时的感觉是,顷刻之间,原有的社会秩序被一下子打翻了:我所仰慕的叔叔、阿姨变成了“走资派”;所尊敬的校长、老师变成了“臭老九”;甚至连自己的父母也被革命群众贴了大字报,成了“走资派”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在一片混乱中,基于传统教育的惯性,我选择了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努力和这些人、包括和自己的亲人划清界限。

1968年,我进入北师大女附中。在读初一的时候,学校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在政治指导员的带领下,年仅十三四岁,就开始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当时,我完全被革命导师慑服了——马克思、恩格斯以极精炼的笔触,将一部浩瀚繁杂的人类历史清晰地勾勒出来,使人们能够洞察历史的昨天、今天与明天,能够树立明确的奋斗方向。此后,在课余时间,我开始涉猎一些同龄人较少问津的英法德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方面的内部读物,以期理解马恩原著的历史背景。总之,这时的我,就像投身了革命一样,是一个时代认可的好学生,出色的学生干部,并在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团。

记得1971年9月底的一天,我在同学家上

小组。她的哥哥告诉我一个惊天秘密:林彪叛逃了!摔死在温都尔汗!我当时被吓蒙了。一个直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能明察秋毫,怎么身边这么大个儿的野心家竟然没有察觉到?!此刻,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算是彻底打破了,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觉得自己很可悲。人到17岁,才刚刚意识到,要用自己的脑袋想问题,用自己的脚去走路。

1971年底,学校保送我到师范学校读书。在此期间,我辞去了学生干部的工作,理由是:“我要读书。”在课余时间,我囫圇吞枣地阅读了革命导师的经典著作,诸如《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与此同时,我为自己找到了一块远离“革命喧嚣”的净土——八一湖畔,每天中午到那里游泳,最后成为北京冬泳群体中的一员。在那里,我结识了一群被文化大革命淘汰出来的老军人、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他们向我讲述了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经历,使我对现实社会有了深入的认识。

这期间,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注意到,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却把马克思的基本原理颠倒过来,强调阶级斗争,坚持政治挂帅;抵制经济生产,忽视人民生活;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上层建筑统辖经济基础。我因此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这在当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在八一湖畔,那些老将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们都



“四五”运动时的天安门广场

和我有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1974年1月,我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小学任教员。在教书的同时,开始了“我的大学”计划。我为自己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等课程。通过自学,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错了,重用了一批“摇羽毛扇”的修正主义者,把中国引向了歧途。

1975年7-9月,周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出现复苏迹象。在八一湖畔,我能感受得到,人们为邓小平的政治勇气欢欣鼓舞,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然而,好景不长,毛泽东对邓小平全面否定文革开始反击了。随之而来的是中央“打招呼”会,让“转弯子”,层层揪“走资派”。刚刚浮现在人们脸上的笑容,随即又变成了眉头紧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76年1月8日,周总理走了。北京十里长街,自发的送行者百万计。与此同时,中央紧锣密鼓地部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北大批邓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加之当局对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百般压制,3月底、4月初,正值清明前后,人们通过悼念总理来发泄心中的强烈不满,不约而同地走向天安门广场,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二、我在天安门广场做了什么

4月2日晚上,我来到广场。当时的壮烈场面让我震惊:天安门广场铺满了悼念总理的花圈,广场周围的松树上挂满了白花,巍峨壮丽的纪念碑被层层叠放的花圈所围绕,整个广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尤其引人驻足的是,花圈上、树干上、纪念碑围栏上贴满了各种诗抄和小字报,人们以此宣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

当时,我挤到纪念碑汉白玉围栏边,看到一份《翻案不得人心》的小字报。这样的标题反映了人们的政治技巧,“翻案不得人心”本是毛泽东语录,旨在批判邓小平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而小字报实际是在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者,他们要翻中国革命的案、翻中国共产党的案、翻总理的案。这样翻案不得人心!”这篇小字报的落款是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看完小字报,正打算挤出去,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喊:“前边的女同胞给大家念一念!”随即有人递过来一个手电筒。我看了看周围,只有我一个“女同胞”,知道是在喊我。也许是因为小字报的内容与自己当时的看法一致,也就没多考虑,在手电筒的映照下高声念了一遍。刚刚念完,不知是谁领头唱起了国际歌。接着又有人鼓动我念第二遍,又是国际歌。就这样,念了五六遍。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混迹其中。为了安全起见,我终于不再念了,挤出了人群,在夜晚的北京城里绕了很多圈子,直到凌晨才迁回到学校宿舍。

此后的几天晚上,我到广场,只是看小字报和诗抄,没有再抛头露面了。当时凡是到过广场的,都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在正式场合公开亮相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夜晚在天安门广场被人民群众骂得狗血淋头。这种巨大的反差映衬出文化大革命的衰象,广大人民群众已忍无可忍,由此形成了昼夜两重天!

无论我怎么小心谨慎,还是被公安局盯上了。4月15日上午,我正在给学生上课,被学校的书记叫出来,说是公安局的人找我谈话。到了书记的办公室,有两位警察在等着我。他们上来

就问：“你在广场都做了什么？”我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毫不隐瞒地告诉他们念了一份小字报。于是，他们责令学校领导让我停职检查。

三、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

4月16日凌晨3点，一辆警车把我从学校的宿舍带走了。先是带到了西城公安分局，次日又到了“炮局”（北京市公安局的拘留所）。为了让我写材料，他们让我住在办公室，每天有人陪着我。

初生牛犊不怕虎。让我写，我就写，我把这些年的思想认识如实地写了出来。诸如，张春桥、姚文元是如何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江青想当“红都女皇”，有政治野心；王洪文是“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缺乏理论水平、领导才能和群众基础等等。我当时的想法是，对党要襟怀坦白，我怎么想就怎么说。如果我错了，你们要能说服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警察，好像姓王，一直坐在我身旁。我写一页，他看一页，最后他说了一句：“你可真敢写！”说真的，我当时听不出来他是什么意思。一个星期以后，材料写完了，我就被转移了。

在警察的押送下，我坐上一辆挂着白窗帘儿的警车。从阳光上判断，车是一路向南，最后到了一个地方。警察收走了我的私人物品，把我带进一个房间，随手把门锁上了。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一个招待所，但看到门上贴的一张发黄的纸，醒目地写着“监规”，这才意识到，我是进了监狱。

应该说，当时的触动太大了！尽管对毛泽东的崇拜早已破灭，但毕竟从小是受党的教育长大的，对共产党还是热爱的。我只是意识到党内一些人出了问题，希望党能纠正自己的错误，从未想过要推翻共产党！尤其是我一路很顺，在学校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年级组长、共青团书记、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多年来一直在学习马恩原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怎么会进共产党的监狱？！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频繁地“提审”。提审我的警察大多是复转军人，文化水平较低。在审讯中，我还是这样的原则，怎么想就怎么说，你要说我错了，必须说服我。我给他们讲张春桥提“资产阶级法权”存在什么问题，讲斯大林“的大屠杀”如

何残酷，讲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等等。看上去，他们似乎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把我当成了天安门事件的要犯。他们从我的宿舍中搜去了日记，其中，1976年4月6日，我记下了“天安门事件的结论”：1.这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行动；2.行动的目标是针对党内修正主义者；3.任何群众运动都有过火行为，诸如砸汽车、烧楼房，这是不对的。就是这篇日记，被当时的公安局长刘传新作为“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政治结论，写成简报，上报中央，我也被他们封为“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委员会，我也不是什么副秘书长。这是他们愚弄人民，将天安门事件编织成“有组织、有预谋”的反革命事件的骗局。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6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市召开万人批判大会，要把天安门事件的要犯拉去批斗。之前的几天，审讯人员加大力度，逼我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不服，随即写下了《绝命书》，要效仿拉法格和劳拉，走他们的道路。这不是随便说说，我确实是有准备的。入狱不久，我每天梳头的时候，都会把掉下的头发收集起来，藏在褥子下面。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的时候，搓了一根很长的绳子，这根绳子我至今还保留着。《绝命书》递上去以后，让我躲过了一劫，没有把我拉去参加批判大会。

也正是在这个当口，我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思想洗礼。人如果想到了死，且不惧死，就什么都想开了。我突然顿悟：任何政党、任何主义都是有生命周期的，都有它的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都会逐渐消亡。既不存在长盛不衰的政党，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在刚刚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恐怖，似乎要遭五雷轰顶！然而，一切都很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而我却从此解脱了，自由了。

此后的日子就好过多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监狱当局从我的宿舍中拿来了一些书籍。于是，我又接着完成“我的大学”计划。我把《毛泽东选集》当作历史资料来读，把废牙膏皮卷起来当铅笔，在草纸上作索引，写笔记。把苏联的《简明政治经济学词典》当作外语教材，从中学习俄文单词。同时，监狱里每天会发一份《人民日报》，每晚能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这

样,只要每天在学习、思考、关注外边发生的时事,人就不会被关傻了。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在狱中,经历了唐山大地震、朱老总逝世和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的时候,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同牢房的刑事犯看到我感到很奇怪,又不是你爹妈死了,至于吗?其实,我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不是为毛泽东的死而哭,而是为毛死后的中国前途和个人命运担忧;只要中国仍在黑暗中徘徊,我的牢狱生活就会遥遥无期。

四、在监狱中庆贺粉碎“四人帮”

然而不久,我便在10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现了问题。因为前一天是我的生日,22岁,我记得很清楚。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伟人去世,往往是一个集体班子接替,这么快就强调“以谁为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紧接着10月1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进一步要求“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此后,《人民日报》陆续刊登各省市的表态,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时,还出现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系列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要识别党内修正主义”的意思。于是,从10月16日开始,我每天用力敲打牢房的铁门,要求与监狱当局谈话,但他们一直不理我。

直到10月20日晚上,看守所所长才把我叫出去。他问我,“你想谈什么?”我说:“中央出事了!”他问:“你判断,哪些人出事了?”我说:“张春桥、姚文元、江青,还有王洪文、毛远新……”他接着问我:“如果外面发生的情况和你分析的差不多,你怎么看待天安门事件?”我说:“天安门事件就是因为反对这些人,才定成反革命事件的。如今这些人成了反革命,你说应该如何解释呢?”他当即表示:“天安门事件是毛主席定的案,铁板钉钉,永远也翻不了!”但他接着又说:“当然了,你放心,你的问题会有新的解释。”谈完话,我平静

了许多,静观事态发展。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事态发展得这么快!也就是在这几天,监狱周围的城区陆续响起了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当时还很纳闷,又不是逢年过节,放什么鞭炮啊?

10月21日晚上,牢房中的扩音器照常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当播音员以高亢、嘹亮的音调播出“首都150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时,新闻还在继续,整个监区就炸了窝!原来,天安门事件300多人几乎都关在了“王八楼”。这是一个五角楼,像一个王八,中心是一个圆形,伸出5个筒道,每两个筒道形成一个夹角,从自己的牢房窗户可以看到对面牢房的窗户。在正常情况下,犯人是绝对不许攀上窗户的。但在这一刻,伴随着广播中“四人帮”的名字一一报出,各个牢房中天安门事件的人纷纷爬上了窗户,我也和大家一样,把手伸到铁窗外,挥舞拳头,高呼打倒“四人帮”,口号响彻云霄!整个监区沸腾了!人们笑着、哭着、欢呼着;最后,不知是谁领的头,大家高唱国际歌……这一场面一直持续到《新闻联播》结束。应该说,发生这样的事,在共产党的监狱是史无前例的。看守人员不得不一间牢房、一间牢房地做工作,让大家平静下来。

此后,伴随着社会上要求放人的压力逐渐加大,到12月初,北京市公安局终于扛不住了,把关押的天安门事件的人集中起来办了学习班。一个中心议题是,要大家正确对待——当初抓你们是对的,现在放你们也是对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逻辑。

1978年11月,当天安门事件平反之时,我已经作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大学里读书了。说心里话,在得知平反的消息后,我没有太多的喜悦,有的只是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文革期间,几亿中国人的命运被少数几个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翻手云,覆手雨。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做自己的主人?我时常这样问自己。

2008年3月1日于新海苑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我见到的胡志明主席

● 戴 煌

可能是1995年,越南为了纪念胡志明主席的一百零五周年诞辰,特别要拍一部纪录片。越南电影制片厂的一位编导带着七八个摄影师和工作人员,到中国北京等地拍摄胡主席过去多次访问中国的有关场景,在北京并访问拍摄了四个人。一是帮助越南抗法战争的中国顾问团副团长兼军事顾问团团长、老年时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韦国清。他去世了,就拍摄他的健在的老伴;二是陈赓大将,因为在解放战争快结束时,正是他率领所属部队打通了中越边境,并消灭了许多法国殖民军,对越南人民军的日渐壮

大帮助很大,并和胡志明主席建有浓厚情谊。他也去世了,就拍摄他的遗孀;三是曾访问过越南的刘少奇主席夫妇。刘主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王光美时还健在,就拍摄她并请她谈谈当年访问越南情况以及与胡主席晤谈的往事;第四个就是我,因为我和胡主席也有过多次交晤,回国后又写过《胡志明主席印象记》等文字。当时领陪他们来访问的还有广电部的一位女同志,帮忙做翻译的正是当年在陈赓大将身边也做翻译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和我谈了话、录了音,还把我写过的有关胡主席的报告文学、小册子等等摄了影。

当年我采访了越南奠边府决战后,与胡志明主席有过多次交往。1954年12月15日早饭后,



1954年春,戴煌赴越南采访。这是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战时所在地的密林中

我又与胡主席在一起,去河内南郊的白梅机场,看望正在那儿操练、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元旦越南民主共和国还都典礼上接受检阅的越南人民军部队和民兵游击队。看了之后,日头已高悬中天,胡主席向一长列的方队挥挥手,大声说:“太阳照到头顶上了,大家累了,肚子也饿了,休息吧!”全场爆发出了一阵欢呼声和“万岁”声。胡主席立即对身旁的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黄文泰中将和阅兵指挥员说:“请大家以后不要这样喊”,随即又向一长溜的方队高声喊道:“好啦,大家回去吃饭吧!”

我们在机场外面吃完了

饭,胡主席又带着我们回到机场,在一座空大的机库里与一些战士代表和干部们聊天。聊天结束,全体纷纷起立,似乎人人都早憋着一股劲,很想放声高呼些什么。胡志明主席连忙习惯地伸开双手,使劲地往下按,叫大家坐着不要动。

“别再喊‘万岁万岁’的”,他说:“没有人能活到万岁!来,大伙唱个歌吧!”他边说边向人群中扫了一眼,拉出最前排的一位女游击队员:“来,请你给大伙打拍子……”

说罢,他就招呼我们几个人向机库大门走去,那慷慨激昂的歌声就在我们的身后扬起。

这唱的是《忘我为人民》的歌,越南的大人小孩都会唱。当你第一次听到它,即使听不懂歌词的意思,那动人心弦的旋律也会使人联想到:在



1955年大年初一，胡志明主席向抢修水闸和修复边境铁路的工农兵拜年。特别是一些头上包着黑头巾的农村妇女，都毫无顾忌地围了

那为了民族独立解放而拼搏的血与火中，怀着这种高尚情操的人，也会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在美化祖国山河的大苦大累中，也必会日夜辛劳，孜孜不倦。

1955年1月24日，是当年春节的第一天。和我们中国一样，越南也有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节。那天除夕傍晚，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在我国云南边城河口长大的越南籍译员阮大进来对我说，他刚接到越南主席府的电话，说是春节一大早，胡主席要去河内以北一些省份的建筑工地、农村和兵营，向工、农、兵拜年。胡主席问我能不能一起去。他还说主席府的同志还特别说到：在河内的众多外国记者中，胡主席只想请我一个人同行，问我愿不愿意？我立即回答：“我非常高兴去！这是胡主席给我的又一次受教育的大好机会！”

第二天凌晨四点，河内市民们还在宁静的恬睡中，胡主席和我们同行的几部小吉普，就穿过了红河大铁桥，在四野昏暗阒然的公路上向北进发。今天要去的第一站，是河内以北约70多公里的托况水闸。这是红河三角洲以北太原省山区的著名水闸之一，也是法军飞机轰炸破坏的几十座水闸之一。它闸身断裂，满池污水中散布着一堆

堆破碎的混凝土块和乱石堆。下游的许多土地都抛荒了，有的土地硬得像大块水泥板，无以果腹的人们一度只能上山采食野果活命。

我们到达托况水闸时，天色才透亮。高大而断裂的闸身，还在令人心酸地伫立着。但在它前面，已筑好一道土坝，蓄起了一湖山水。这是几千名工人、农民、游击队员和地方部队的官兵，在停战后短短数月中抢修而成的。

不一会儿，胡伯伯突然来到工地的消息，像风一样传开了。原来很空旷的闸边顿时挤满了人，人人都想看看胡伯伯，

上来左瞧右看，还唧唧呱呱地议论着。胡主席的贴身警卫员们都站得远远的，对越来越多的人群根本不拦不挡。似乎在他们看来，胡伯伯历来与人民群众都是这样的水乳交融，根本用不着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

胡主席只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祝贺大家春节快乐，就与一同来的共和国交通公政部长——党外人士陈登科等人一道，走上刚刚筑好的土坝，巡视那座高大而残破的水闸。听说下游已及时得到了春灌用水，等到正规的混凝土大坝修好后，下游的整个灌溉面积将由原来的两万五千公顷扩大到三万三千公顷，胡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颇有所感地望着清波荡漾的湖水，口中喃喃自语：“谁最伟大？人民最伟大！没有人民的努力和牺牲，再有本事的人也会一事无成！”

说罢，他就和陈登科等人又来到了高声喧哗的、似乎比过节还兴奋的人群面前。他转身指着水坝问大家：“现在这水坝是属于谁的？对了，属于我们工人和农民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谁最伟大？对，人民最伟大！只要全国同胞都团结得像一个人，就没有任何难关能挡住我们前进！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建设得花簇似锦，是不是？”

“是——”人们齐声回答，附近丘陵中都荡起

连连的回响。

离开修坝的人群后,他又走访了附近的几家农民,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然后几部吉普车掉转车头,似乎将返回河内。这时太阳已透出了云雾,时已近午了。胡主席的车突然带头拐进了路旁一座残缺不全、稀稀拉拉的松树林。他下了车,向后面的几部吉普车一挥手,大声说:“吃饭,休息一会儿”,并邀请陈登科部长和我以及阮大,和他共进野餐。

在一棵高大松树下的斑驳的草地上,他的警卫员们铺了一张草席,又在草席上蒙了一方旧桌布。他淡淡地笑着说:“来来来,大家过节都要吃好的,我们也来点好吃的,嗨嗨嗨……”

什么“好吃”的?在我们围着草席就地坐定之后,警卫员们从车上拿来了两只已切好的油炸鸽,几小片咸鱼,一小碟肉饼,一些生青菜和几块豆腐,还有些米饭和切成片的粽子、一只从上面看来还是二次大战结束时缴自日本鬼子的腰型军用饭盒装着的菜汤和一瓶葡萄酒。这些就是这位一国之首在取得来之不易的伟大抗法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民间重节,用以待客的午餐!而他却取笑说:“这比唐伯虎追舟的那顿饭强多了!他那次只是让艄公空口报菜名,他自己只能瞪大了眼睛咽干饭。我们呢,有酒有菜还有汤……”

他过去搞地下工作时,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呆过好多年,学会了中国话,也会法语、英语和俄语。他说中国话就像广东人说北方话,也会用汉语做诗,《同志加兄弟》那首诗就是用汉字写的。大家一阵笑声过后,他首先举杯祝我们春节快乐,我们也祝他健康长寿。在和大家一起抿了口酒之后,他把“健康长寿”这四个字轻轻地重复了一遍,对我说,“健康长寿”这种说法倒还比较实事求是,他领情;但对那种动不动就喊某个人“万岁”什么的,他不赞同。他说:“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就拿你们的彭祖来说,也不过只活了‘八百’岁,何况那还仅仅是古代传说,哪还有比他活得更长的,是不是?”

我说“是”,不过大家常常爱喊“万岁”什么的,也只是表达自己还没有别的词儿能够替代的真挚之情而已。他说:“不,那也要实事求是,不能狂热冲动,对不对?”

我点头称是。接着,他又向我提出一个我压

根儿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这几年,几乎凡是去过你们国家的越南同志回国后都说,你们招待外国贵宾的酒菜极为丰盛,都是些海参、鱼翅、对虾、鲍鱼这样一些值大价钱的。可是,尽管宾主早就吃得齐脖子了,还是大盘大碗地往上端,有些几乎又原封不动地撤了下去,这不是很浪费么?”

我一时语塞。当时我还不知道这算不算浪费。现在面对胡主席突然提到这个问题,大出我的意料。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才说:“礼仪之邦,宾至如归嘛!”

“唔——不能这样说。”他捋捋他那把灰白色的胡须,又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含蓄地批评说:“这都是公家的钱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

是啊,“如果完全由个人掏腰包,那又会怎样呢?”——这一下就给我开了窍:我们的那种“礼仪之邦”云云,只不过是慷国家和人民之慨的遮羞布罢了!

一小时后,车队已拐进了河内东北约50公里的北江省省会府谅商。在那里,他向共同抢修铁路和铁桥的中越两国铁路工人带去了节日的祝贺。他的贺词不足三百字,竟获得了十六次掌声。离开府谅商时,天色已昏暗了,他又到一个兵营里对面前黑压压的一大群战士讲了一个多小时,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激励他们前进再前进……

我们返回河内时,条条街道就像我们凌晨出发时那样一片宁静。市民们大概都已沉进温甜的梦乡了。胡主席的这趟“春节游”,整整用去了二十一小时。

这是我在越南的一年中,与他相处的时间最长、也是谈话最多的一次。通过这一次的仔细观察和过去多次相随的所见所闻,我深感这位终身未娶,把自己的一生真正无私地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伟大革命家,他的真挚和虔诚的人道精神对人民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我那时只有二十六七岁,2008年2月我就80周岁了。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怀念敬仰这位与我的父母同岁的老人,终生牢记难忘!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作为新华社军事记者在越南、朝鲜作过采访报道)

(责任编辑 李 晨)

特事特办： 胡耀邦与经济特区

● 王 硕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时值国门刚刚打开，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草创伊始，各方面关于对外开放和办特区的知识都比较缺乏，思想还没有完全统一。在中央担任一线主要领导职务的胡耀邦对经济特区的支持一直是不遗余力，他热情洋溢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深圳等特区的成功创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

1979年7月，中央下发50号文件，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正式提出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我国经济特区的创办由此拉开了帷幕。

1980年1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第一次到珠海视察，他指出，要解放思想，充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把经济工作搞上去。同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于全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作大的改革，特区在试行新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80年5月，中央下发41号文件，指出，“试办经济特区，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有一个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我们又缺乏经验，因此，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胡耀邦对文件精神是赞同的。

1980年7至9月间，胡耀邦两次过问蛇口工业区的建设问题。先是1980年上半年，蛇口实施的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被上级有关部门制止以致工期延误。此事经新华社记者写内参上报至胡耀邦处，胡耀邦批示给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看来我们有些部门并不搞真正的改革，而仍然靠做规定发号施令过日子。这怎么搞四个现代化呢？”不久，蛇口修公路又遭遇上级有关部门“卡脖子”，袁庚请新华社记者写内参向中央反映情况。胡耀邦批示：“谷牧同志：中央现在决心坚决反掉各种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建议你抓住这个麻雀，弄个水落石出，必要时制裁一点人（最好是采取经济制裁），否则不但官僚主义克服不了，四化遥遥无期。”《南方日报》就此事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谴责“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1980年12月，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袁庚，袁庚提到蛇口的事不断干扰中央领导，甚是不安，胡耀邦说，“应办的事还是要办！”这给袁庚以很大的鼓舞。

1980年下半年，胡耀邦先后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广东、福建对外开放及经济特区工作。

在同年9月25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以蛇口超产奖励一事举例说，“有些司局长脑子发霉，没有工作做，不搞调查研究为主，而是搞发号施令为主，有人专门干这种事。”当谷牧提到中央有关部门没有认真贯彻落实1979年50号、1980年41号文件精神，认为广东及特区对上面不合理的发号施令完全可以顶时，胡耀邦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京剧《孙安动本》里那个定国公徐龙，手上有明太祖赐的黑虎铜锤嘛！”胡耀

邦在总结讲话时说，“情况我不熟悉。这次中央书记处讨论，不是讨论广东的政治路线问题，这方面中央对广东是很信任的；这次讨论是广东在经济上如何发挥优势，是在特殊政策上面。”“深圳特区，有成绩，有困难。刚开始嘛，但我们要要有长远想法”，“搞特区，是学资产阶级经营的本事，不是学他们的生活方式，不是学他们的意识形态。”



胡耀邦视察深圳并题词（摄影 孙铁中）

“要找出一套办法，解决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比如广播、电视、娱乐。只有满足了群众的合理要求，才能要求群众同心同德。”

1980年底，中央提出进一步实施经济调整的方针。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指出，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步伐要暂时稍慢一点，但是，要继续贯彻执行中央50号、41号文件和中央书记处九月会议纪要精神，“把广东、福建的特区搞得更好”，“我们搞的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第二天也即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经济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中央对办特区的方针没有动摇。

中央决定调任仲夷和梁灵光到广东接替已上调中央的习仲勋和杨尚昆的职务。1980年11月初，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京接见即将履新的任、梁。胡耀邦在谈话时说，“党风不正，‘香风’蔓延，走私、行贿、投机倒把、吃吃喝喝，全国来讲，广东很严重。”他还巧改成都武侯祠著名的“攻心联”相赠，“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粤要深思。”任仲夷的体会是，上联是讲争取民心的重要，下联是讲政策必须从实际出发。任仲夷后来的确是不负众望，攻心审势，为广东和特区改革开放取得重

大进展作出了贡献。

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精神，1981年2月，中央党校范若愚等人在考察深圳之后，向胡耀邦呈交了《广东深圳的特区建设问题》的报告。报告认为深圳文化、教育、科学、宣传阵地十分薄弱，建议在抓特区经济建设的同时，认真抓好特区的思想文化建设，如建电台、电视台、创办报纸、建立高等院校、设置科学院特区分院，加强文艺团体，加强党校建设等。胡耀邦在报告上批示“要积极去办”。据此，深圳市政府后来决定兴建科学馆、博物馆、电视台、图书馆、大剧院、深圳大学、体育中心、新闻中心等八大文化设施。

1981年7月，中央下发21号文件，参照国外办特区的经验，出台十条政策和措施，特区政策基本框架至此得以初步明晰。深圳特区建设开始隆隆上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深圳速度”等口号很快蜚声海内外。

在对外开放初步实践的基础上，1982年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思考。他总的一个看法，是“进”而不是“退”。他指出，要“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提出明确有力的方针和政策”，确保几年内真正打开新局面，他认为，这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不能认为经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沿海一带的走私贩私活动比较突出,深圳当时也有较严重的走私问题。1981年3月和8月,广东曾组织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行动,走私浪潮得到一定的遏制,由于防范措施跟不上,问题还是比较突出。

1981年12月,邓小平针对广东等地一些单位和干部继续从事走私、贩私活动的情况,致函胡耀邦:“这类事为什么总处理不下去,值得深思!我建议由中纪委派一专门小组进行彻底追究,越是大人物、大机关,处理越要严、要重。”1982年1月5日,胡耀邦在《港澳同胞反映的问题》材料上批示:“此件转仲夷同志。坦白地说,党风不正,广东在人们心目中是在前列的,请省委一定要抓住不放。譬如深圳,那里的党组织就要自上而下发动全体党员发誓搞好,搞好了就为全党争了光,争了气。”

1982年1月11日,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向全国各地发出紧急通知。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会议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还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引起较大争议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材料。

会后,任仲夷找到胡耀邦,任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胡耀邦说,“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座谈会结束后没几天,胡耀邦给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

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请任仲夷再到北京一趟。

胡耀邦又一次接见任仲夷。他先是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接着又询问了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任仲夷一一作了解释。最后,胡耀邦提出要任仲夷给中央政治局写个检查,任仲夷虽然当时并不赞同中央有的领导提出的“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检查写好后,胡耀邦看了,说可以了。

1982年3月,谷牧到深圳视察。对特区反映的有的问题,谷牧特别提醒说,“最好请新华社记者写成内参材料报到耀邦、紫阳同志那里,请他们批一批,这会起点作用的。”谷牧回京后向中央正面反映了广东和深圳的情况,但是,海关、税收、对外经济活动方面仍然作了不少收权的规定,使得外商对政策变化产生了疑虑。胡耀邦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他对谷牧说,“什么都改,什么都收回来,那怎么行?”

胡耀邦自觉坚持了中央下发的1979年50号、1980年41号、1980年中央书记处两次会议纪要以及1981年27号文件精神。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提到,党内曾有人责难胡耀邦,说特区实际是租界。胡耀邦面对责难,不为所动,他说,“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

此后,深圳等特区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同时,更加强调要狠抓打击违法犯罪活动。1982年9月,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强调,“在坚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决警惕和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10月,广东关于特区工作的总结在中央获得通过。

同年11月上旬,胡耀邦视察厦门特区。他指出,中央对福建、广东采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搞四个特区,这个方针是不变的。“坚持开放政策,打击经济犯罪,是两个不同概念,不能认为经

济犯罪是开放政策带来的，二者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不能像京剧《法门寺》里唱的‘眉邬县在马上心神不宁’那样，而是要快马加鞭，把对外开放搞好。”

1982年12月初，中央下发50号文件，专门提到，“最近，陈云同志批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

好。’胡耀邦同志在视察福建时，也看了厦门特区。这对两省和特区的同志鼓舞很大。大家决心振奋精神，加倍努力，把特区的事情办好。”

1982年年底，中纪委副书记章蕴到广东调研后，给中央写了一份对广东工作基本肯定的报告。邓小平批给政治局、书记处传阅。1983年2月，胡耀邦在视察海南时问任仲夷，“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任仲夷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但为了听一听胡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广东工作有利”。任仲夷讲了之后，胡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1982年50号文件以及邓小平的最新批示，使广东和特区的政治压力减轻不少。

“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

1983年2月，胡耀邦第一次视察深圳特区。这是特区发展史上一次有重要分量的视察活动。

胡耀邦说：特区应按新办法来搞。新事情应走新路子。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共产党员的立场不变，方法是全新的。新事老办怎么行！胡耀邦以深圳建市之初曾经搞了六十多个局的情况为例子说，“你们搞了我们原来的模式，把全国的臃、肿、杂的弊端引到特区来。……虽然创造了一点，但还是过去的东西多，被一些老的东西缠住了，所以现在回过头来又要



胡耀邦在深圳特区 (摄影 江式高 王叙照)

改。”“我们在北京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希望你们创造新的东西。”

胡耀邦还就核电站、南海石油开发、特区货币发行、与外资合办电讯、搞开发性投资、特区产品内销等问题谈了具体意见。

当时，特区与外资合办电讯问题争议较大。深圳特区原准备和英国大东电报局合作，改善特区电讯落后状况，但上级有关部门认为涉及主权、保密等问题，事情久拖不决。胡耀邦对梁湘说，“没有保密问题嘛！我建了你来管，为什么不行？各路豪杰投奔你白衣秀士王伦，我把全部人马，包括枪枝弹药，请你来收编。林冲开始时是投奔王伦的，但王伦不愿收编，结果出了个‘火并王伦’。要告知有关同志，不要当白衣秀士啊！”此事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当袁庚不无顾虑地谈起中国古代改革的成败教训时，胡耀邦说，“过去的改革是下层少数人去改，领导者、统治者是压制的。现在不同，我们领导者是带头号召和督促下面去改，现在和过去根本不同嘛。”

袁庚还提出：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干部作风。我们想做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改革，准备冒一点风险。胡耀邦点头说，“好！好！”随后高兴地说：“关汉卿在一出戏里讽刺官僚主义，他不敢骂台上的官，只敢骂戏台前的鼓：‘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天上堂敲三下，叮咚叮咚又叮咚。’就是不懂不懂又不懂嘛！”此后，蛇口工业

区开始推行干部体制改革，民意推选领导班子，这一试验一直持续到1994年。胡耀邦在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还强调说，“要用你们这个办法，把我们国家这样好的海岸线很好地利用起来”，“沿海一带城市，像汕头、厦门，都要学蛇口这样，用蛇口的办法去搞，可以搞活一点。”

胡耀邦询问梁湘等人还有没有压力时，梁湘回答，“现在没有什么压力了。去年上半年多少有一点。”

此行，胡耀邦高度评价了深圳特区取得的业绩。他对广东省委及深圳特区的负责人说，“你们已经闯开了一个新局面，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意图。”这是特区自创办以来，中央主要领导人第一次作出的正面评价。他还指示，“要把办特区的总目标、总目的研究清楚，搞明确。前几年说不清楚可以，现在要搞清楚。”此后，凡是到中国来的党内外宾，胡耀邦都主动介绍他们到深圳特区去考察。

在得知胡耀邦对特区工作的评价后，1983年4月，中央主管对外开放和特区工作的谷牧在广东省委常委会议上说，“我看这话公正，我同意这个评价。”在此前后，陆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到深圳视察工作，都给予了好的评价。1983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说，“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1983年11月，胡耀邦在接见日本记者时说，“我们在深圳创造了一个经济特区的典型，搞得蒸蒸日上。”他的喜悦振奋之情，溢于言表。

1984年2月初，胡耀邦视察汕头。回京后，2月24日，胡耀邦参加了邓小平同中央几位在一线主持工作的领导人的谈话活动。胡耀邦非常赞同邓小平提出来的“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谈到，“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胡耀邦插话说，“我主张搞它七、八个沿海城市，这没有危险。”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综合各方面意见，

最后决定开放14个沿海城市。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迈出的一大步，并由此掀起自1979年以来的第二次高潮。同年5月，胡耀邦在专程来深圳为南共联盟代表团送行期间，特意题写了他一年前说过的“新事新办，特事特办，方法全新，立场不变”，顺序进行了调整，为“特事特办，新事新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十六字方针很快成为深圳特区大干快上的冲锋号角。

关于胡耀邦在坚持改革开放和支持创办经济特区方面的贡献，从中央到地方都作了很高评价。2005年，中央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座谈会，称颂他“为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无疑，他对经济特区作出的贡献也是其中应有之意。胡启立在《追忆胡耀邦》一文中写道，“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袁庚在谈到蛇口工业区曾经取得的成绩时，也不无感慨地说，“最主要的还是由于中央和省的支持”，他列举了胡耀邦等人的名字，又说，“他们对蛇口的关心真是没的说”。

（作者系深圳市史志办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 李 晨）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2007年合订本即将出版，数量有限，有订购者请与我刊广告发行部联系。

另：我社2006年《炎黄春秋》合订本库存数量已不多，欲购请速汇款。

2006年精装 85元

2007年精装 85元 简装 80元

2007年下半年(7-12期) 45元

注：以上均免收邮费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

● 李维民 李克进

我国第一部“人权保障条例”

由董云虎、刘武平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世界人权约法总览》，收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于人权的各种法规、条例，其中设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区的人权约法》一节，共收入《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冀鲁豫边区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等五个有关人权的法规。据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云虎同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内发布的有关人权保障的法规，现在能搜集到的只有这五份。这五份文件，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人权保障的精神。

人权，最初是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反对封建特权和神权的口号。英国议会曾在1679和1689年通过《人身保护法》和《权利法案》，1789年法国发表过《人权宣言》。在我国，虽然在1909年光绪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和1912年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有保障人权的内容，但是从来没有颁布过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1940年11月11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作为代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民意的立法机构，通过公布施行的《人权保障条例》（同年12月10日在山东《大众日报》公开发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一年之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冀鲁豫边区行政公署、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和山东渤海行政主任公署陆续发表了类似内容的法规。

山东省的《人权保障条例》第一条说明：“为发扬民主，动员全民参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真精神”，制定本条例。第二条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第三条规定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第四条规定“人民有下列之自由：（一）人民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二）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三）人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四）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在其他条款中，还规定了“凡人民因犯罪嫌疑有逮捕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批准后不得执行”，“凡各级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民就其所受损害，得依法律请求赔偿。”

这个只有1000余字、共有12条的《人权保障条例》，简明扼要又比较全面地概括了人权保障的基本内容。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定出这样一个人权保障条例，是难能可贵的。用当今民主与法制的观念来审视这个条例，亦无陈旧或缺失之感。这个条例的制定，是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民主建政的一项重要成果。1939年朱瑞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后，与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后来负责政府工作的黎玉一起，积极致力于山东根据地的民主建政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限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立全省统一的立法和行政机关，1940年7月至8月间，召开了有300名山东各地各界代表参加的联合大会，否定了国民党圈定的所谓出席国民大会的代表，选出了真正代表山东民意的61名国大代表，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权力机关——负责立法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负责行政的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为山东省政府）。同时成立

了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山东各界救国总会和山东省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及文化界等群众组织的统一领导机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的《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据1940年12月10日《大众日报》报道：参议会闭会后，其驻会委员会（相当于常务委员会）于11月7日、9日、10日、11日、12月3日连续召开会议，出席驻会委员李澄之、李竹如、陈明、杨希文、张伯秋、刘居英、陈若克、牟宜之等人，在马（保三）副议长主持之下，相继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山东省战时县乡村各级政府组织条例》、《人权保障条例》以及有关财贸、教育和减租减息、自卫团组织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条例，为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内实行民主建政，进行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上述参与讨论通过《人权保障条例》的9位委员中，目前健在的只有刘居英同志一位。他向我们介绍了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的制定经过。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颁布一年以前，在山东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地区（亦称湖西地区），曾发生过一起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时任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政委兼湖西军政委员会负责人的王凤鸣，与湖西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在“肃托”运动中滥杀无辜，在一个多月内，逮捕了数百名党员、干部，无辜杀害了约300人。湖西事件被揭露后，在其他地区仍然发生过类似的错误。

1940年7月至8月，在山东省联合大会（相当于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地方的代表对在防谍反奸斗争中发生的若干起错捕乱杀事件提出批评，要求颁布一个保障人权的条例。根据中共山东

抗战条例

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公布

人权保障条例

第一条：为发扬民主，动员全民抗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精神，特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法令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中华民国国民男女老幼均受本条例之保障。

第三条：凡在中华民国国民均享有建国大纲所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但汉奸及被剥夺公权者不在此限。（抗战前之政治犯不受前项之限制）

第四条：在不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一）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二）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三）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四）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

第五条：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

第六条：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人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

第七条：凡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之，县以上之行政机关，前项以上之军事机关，有签发逮捕状之权。

第八条：县乡村各级政府群众团体，除对现行犯及持有重大嫌疑而有逃亡之虞者外，不得任意逮捕或拘禁。

第九条：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核准后不得执行，若主任公署之地区，须得专员公署之批准，县府不得逕行执行。

第十条：凡各级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处外，应负赔偿及民事责任，被害人得依法请求赔偿。

第十一条：本条例解释权归省临时参议会。

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施行之日起施行。

【大众社】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公布之人权保障条例，原文如下：

第一条：为发扬民主，动员全民抗战，贯彻法律保障人权之精神，特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国民政府法令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凡在中华民国国民男女老幼均受本条例之保障。

第三条：凡在中华民国国民均享有建国大纲所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但汉奸及被剥夺公权者不在此限。（抗战前之政治犯不受前项之限制）

第四条：在不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内，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之自由，（一）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二）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三）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四）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

第五条：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

第六条：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人机关，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

第七条：凡人民因犯罪嫌疑被捕拘禁之必要者，非持有逮捕状不得逮捕之，县以上之行政机关，前项以上之军事机关，有签发逮捕状之权。

第八条：县乡村各级政府群众团体，除对现行犯及持有重大嫌疑而有逃亡之虞者外，不得任意逮捕或拘禁。

第九条：凡经判处死刑之罪犯，非经主任公署核准后不得执行，若主任公署之地区，须得专员公署之批准，县府不得逕行执行。

第十条：凡各级公务人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处外，应负赔偿及民事责任，被害人得依法请求赔偿。

第十一条：本条例解释权归省临时参议会。

第十二条：本条例自公布施行之日起施行。

1940年12月10日山东《大众日报》第一版发表的《人权保障条例》（据1956年重印版复印）

分局指示，分局宣传部长兼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李竹如组织了条例的起草工作。条例公布后，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专人到一些侵犯人权比较严重的地区，对错杀、错捕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纠正，督促落实《人权保障条例》中关于逮捕和处决的审批规定。上述一系列保障人权的举措，顺民心，合民意，对于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后来在整风运动中，继任山东分局书记的罗荣桓，汲取历史教训，断然决定在山东不搞延安那种抢救运动，保护了大批干部，为维护法制、保障人权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实践证明，即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需要树立法制观念和保障人权的意识。这就是山东省《保障人权条例》的可贵之处。然而遗憾的是，当时许多同志缺乏这种观念和意识。有一位领导同志去山东视察工作时，曾经看到上述法规条例，却未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还认为用处不大。若干年后，正是这位同志，惨死于法制被彻底践踏、人权毫无保障的“文革”年代。

我国第一部关于人权保障的实施细则

《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颁布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各地区，都对如何贯彻落实这一条例研究了具体措施。渤海区颁布的长达3000余字的《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权保障的实施细则。

渤海区是1944年1月由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组成的。这个执行规则一年前由清河区制定

执行,合并为渤海区后继续执行。这个规则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以求把《人权保障条例》落到实处。1941—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根据地受到日、伪、顽的夹击。原国民党地方武装,许多公开投日变成伪军,我党领导的根据地,有的基本变为敌占区和游击区。在这样恶劣的战争环境下,清河区 and 后来的渤海区行署,及所属各专署和县政府,仍然认真施行山东省的《人权保障条例》。渤海区的《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特别规定:“在争夺区或新辟地区,尤严禁以任何名义、借口,乱行捕杀、吊打、绑架、就地处理等破坏政策的举动,违者以其所犯法条加重一半处罚。”因为环境恶劣,许多地区“三里一据点”、“五里一碉堡”,被日伪军用“封锁沟”、“封锁墙”分割占领,我能公开活动的村庄已为数不多,只能派遣武装工作队,三十人、五十人、多不过百人开展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在这些争夺区域中,我军游动性极大,没有后方,没有政府支持,敌情十分复杂,尤其需要掌握政策,认真执行《人权保障条例》,以缩小打击面,扩大争取面。正因为这些武工队做到了这一点,不但迅速得到群众支持,还瓦解了敌人,使伪政权变成“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敌人,暗中向我供应粮食、弹药,提供情报、隐蔽伤员。这是战斗的胜利,也是执行政策的胜利。

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比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作出了许多更具体的规定,其操作性更强。例如规定:“人民之身体、财产及其他一切之合法自由权利,非有法令的根据,任何部队、机关、团体及群众武装不得任意侵犯。”对于“挟嫌诬告、捏造证据或栽赃陷害者,予以反坐处罚。”严格限定捕人、审判权力,规定:“有权逮捕之部队(团以上部队)、机关,应依法定手续,考虑嫌疑轻重,慎重办理,不得轻易逮捕、拘禁,……有权部队对被捕之人犯无审判权,应依法速交该管公安、司法机关处理。”“逮捕拘禁时,以犯罪嫌疑人本人有限”,“不得无故株连,违者应负法定责任。”“人民被非法逮捕、拘禁者,得由本人或其亲属,向该管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声请提审。受声请机关核准后,应立即通知该逮捕、拘禁机关,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不得拒绝……”

对于搜索权亦有明确规定:搜索以获得犯罪证据或没收物为目的,此外任何物品,绝对不许随

意携取,并应取具户主及在场证人之甘结,以资证明,违者依法严惩。还特别规定:“搜索妇女之身体,应令妇女为之。”规定:“逮捕、拘禁之犯人,应即时审讯,至迟不得逾一日。如证明无犯罪行为,应立即释放,并解释安慰之。”

规定严禁逼、供、信:“不得专靠口供定案,严禁刑讯或其他不正当方法逼供骗供,违者以刑法渎职,及妨碍自由各条,加重论罪。”“审讯人员应郑重和蔼,尽量使其自由陈述,并详记笔录。”“笔录须记明审讯日期、地点,并由主审及记录人员签名盖章。”对于在押犯人,规定“施以政治动员及个别感化教育,期其觉悟前非,改过迁善。”“押犯食粮、菜金及学习、卫生权利,应按标准待遇之,不得加以任何克扣与虐待,病重者应尽量准许保外就医,一般犯人经准许并得接见亲友,收受药品。”

规定对于审判、上诉、死刑犯执行、赃物处理等都一一作出具体的规定。

自1942年至1946年,渤海区认真贯彻执行《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成效十分显著。主持制订渤海区《人权保障条例执行规则》的清河、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在《抗战六年来清河区的民主建设》一文中说:我们执行了保障人权的法令,取消了任何连保制度的残余,减租减息之后保证交租交息,我们不但保证了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政权,也保护了地主的合法权益。渤海区认真贯彻执行《人权保障条例》,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但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解放战争期间,渤海区参军青年16万余人,四大野战军中均有大量渤海子弟兵。参加支前的民工、民兵总计80余万人次。同时于1947年春天开始,渤海区接待安置了北撤的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部队、伤员、以及难民、俘虏等共40余万人,成为华东战场的总后方,对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47年以后,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不惜践踏行之有效的《人权保障条例》等法律法规,首先将渤海区党常委、公安局局长李震和大批公安司法干部撤职查办,接着又撤销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李人凤的职务,并在报纸上公开批判其所谓右倾错误,以致使不少地区出现(下转54页)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

——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 杜光



杨献珍

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了《共和国的三次哲学大论战》，作者萧岛泉。这部书翔实地记录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三次哲学讨论如何被政治化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我国历史上的许多问题成了禁区，不许人们了解，三次哲学大论战更是知者寥寥。本书主要以论战双方的观点构成，为读者提供了许多可以了解那些论战的历史真相的宝贵资料。我虽然对那几次论战略有所知，但读了书中记载的那些论战的篇章之后，仍然不由得感到震惊。掩卷太息之余，思索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三次论战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哲学反映

这三次哲学论战的主题虽然都是哲学问题，但确实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变息息相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三次大论战是中国社会面临大转折在哲学上的反映。第一次论战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后，杨献珍在1953年和1955年，先后写出《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两篇长文。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由当时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所以被称为“综合经济基础论”；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和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以被称为“单一经济基础论”。这场当时还只是在马列学院的少数教员中进行的争论，正好发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前后，当然不是偶然的。争论在扩展到社会上后，有人批判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为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主张”提供理论基础的，现在看来不无道理。不论杨献珍主观上是否意识到，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遭到批判以后，他仍然坚持“综合经济基础论”，实际上是在理论上继续主张新民主主义秩序，与过渡时期总路线唱对台戏。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次论战是从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个提法的不同看法引起来的。杨献珍认为，黑格尔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是把思维与存在等同起来，是唯心主义的命题；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是恩格斯肯定了唯物主义的命题。在马列学院的教员中，这个问题在五十年代初就有着不同意见，但只有到了大跃进的时候才在社会上引起争论。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的狂热气氛里，杨献珍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公社化中的许多严重问题，便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角度，对“共产风”、“浮夸风”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反对杨献珍的人则成了大跃进的吹鼓手，他们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有人甚至断言：“在社会主义制

度下,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实际上是望不到边的。”这些严重对立的看法,反映了对当时出现的大转折的不同态度。大跃进把中国社会引到灾难的边缘,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本来是为扭转灾难的局面而召开的。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万言书和杨献珍在会前两三个月的多次讲话,应该是及时的警钟。当时如果接受他们的批评,对大跃进进行认真的检查,改弦易辙,中国的局势就可以扭转过来。但听不得批评的毛泽东却报之以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运动,结果造成了更大的灾难。中国社会丧失了一次良好的转折机会,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死于非命。

第三次论战反映的大转变开始于1962年。在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为大跃进作了总结,加上一年多来认真贯彻了1960年9月确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社会逐渐恢复了元气。无奈毛泽东虽然在会上勉强地承认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但在9月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又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全国上下制造了紧张的社会气氛,扭转了渐趋缓和稳定的社会发展方向。以此为开端,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变,反映在哲学问题上,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论战。

杨献珍在反右倾运动后受了处分,从校长降为副校长,不再过问校政,却继续承担讲课任务。他在1963年和1964年给学生讲课时,曾根据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有关论述和他自己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长期思考,提出:“事物既是一分为二的,也是合二而一的。”“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高级党校的两位教师循着他的思路,写出《“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刊登在1964年5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对杨献珍的动向窥测已久的康生很快便向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在6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的吧。”7月10日,他又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杨献珍……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于是,“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反对毛主席”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合二而一”的高潮。从1964年6月到1965年5月的一年内,全国报

刊发表的批判文章,达380多篇。

“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本来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却由于分和合的考察角度不同,使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在1962年到文化大革命的社会转折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一分为二强调的是分,是对立面的斗争,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哲学根据。毛泽东在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就是为了在党内清除异己,制造理论的舆论的准备。杨献珍恰好在1962年读到明朝人方以智的《东西均》,从中接受了“合二而一”的提法,于是使用它来作为讲授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方式。“合二而一”有个“合”字,被认为是强调对立面的统一,是主张阶级调和的,这就同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一分为二”发生冲突了。毛泽东说杨献珍“搞‘合二而一’反对我”也不无道理,只是杨献珍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

(二)学术讨论是怎样政治化的?

三大哲学问题都是可以从容地、自由地进行探讨和争论的学术问题,为什么却都演化成为互不相容的政治问题,并且使论战一方遭受到残酷的镇压呢?这里既有三大论题本身包含着被导向政治化的内在因素,也有当政者所掌控的政治形势的需要,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论战的无权一方发表了有权者无法容忍的观点,触动了当权者的最敏感的神经,使他们感受到对方对专制权力的挑战与威胁。这才不惜动用全部党机器来围剿对方。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对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因果关系略加分析。

(1)在三个哲学论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包含着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否定因素,因而被政治化的可能性最大。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综合经济基础论”却坚持以五种经济成分为基础,当然为推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权力所不容。但这个问题在“三大改造”完成后就逐渐淡化了,也不再具有表面化的争论。只是随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的论战的激化,才被重新提起。因为这两个争论问题虽然完全是哲学问题,但正好与当时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稍加引申便可以转化为政

治问题。把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歪曲为“思维与存在没有同一性”，再过渡到反对大跃进；由“合二而一”过渡到对立面的统一，再过渡到阶级调和，都是顺理成章的延伸。但这种延伸只有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之下，才能成为事实。

(2)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即使是在马列学院内部，“综合经济基础论”也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却不同。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面对彭德怀的“万言书”，毛泽东恼羞成怒，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把庐山会议从反左扭向反右。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三次讲话中对大跃进、公社化的批判，比彭德怀的“万言书”更尖锐，更深刻，自然避免不了会后挨整的命运。他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见解，被认为是反对“三面红旗”的哲学工具。这完全是为了适应毛泽东的政治需要而加之于他的。毛泽东从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便开始了党内阶级斗争的新部署，他让刘少奇去主导“四清”，文革开始后又听任刘少奇派出工作组，都是欲擒故纵的权术。为了把党内斗争引向高潮，清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处心积虑，一步一步地点起了文化界的批判火炬，为文化大革命做好理论的舆论的准备。1966年6月初出版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是这样概括这两次哲学论战的：“在哲学界，杨献珍大肆宣传否认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的谬论，来打击工农兵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反对大跃进。接着，杨献珍又抛出‘合二而一论’，为‘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极端反动路线，提供哲学‘根据’。”“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篇社论既是为文化大革命进行舆论准备的总结，也是进一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和“合二而一”这两个哲学问题的论战，完全是为了准备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而引导到政治领域的。

(3)三大论战政治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于杨献珍在1959年六七月间的讲话触怒了毛泽东。惯于揣摩圣意的康生甚至危言耸听地煽动：“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相互配合，向党进攻。”

杨献珍是怎样“向党进攻”的呢？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共产风’实际上就是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在欧洲一度流行过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潮的中国形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绝对平均地分配社会财富。”“用原始共产主义来消灭私有制，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不过是挂着公有制幌子的私有制的卑鄙的一个表现形式。”这就不仅批判了大跃进、共产风，而且连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也从根本上被他否定掉了。

“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棍嘛！”对于想赶在苏联前面实行共产主义的毛泽东，这是多么强烈的嘲讽。

杨献珍还揭露了大跃进中的一些唯意志论的典型例子，如：1、有一个被称为“哲学之乡”的村子，大办钢铁时竟提出“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的口号。2、有的地方居然提出：“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3、有个地方提出“三天扫除文盲”；还有一个地方设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据说要“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七天学完全部数学”，“十天学完三年课程，考试门门五分”。杨献珍说：“搞形而上学学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些警告，无疑会激怒大跃进的发动者。

最致命的，是杨献珍的所谓“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的俏皮话。他说，有一个内部刊物登载了一则消息，“说某省制定当年的钢铁生产计划，原定钢的生产额为五百万吨，钢材为二百万吨，不知道制定计划的人怎么忽然一下子聪明起来，感到这个计划实现不了，于是又从事削减。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削减，最后定为钢五万吨，钢材二万吨。”过了不久，杨献珍听高级党校下放该省的干部反映，他们向省委辞行时，省委第一书记要下放干部对他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献珍听了后，不假思索便脱口而出地笑着说：“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可

以用百分比算出来,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这话被康生知道后,他如获至宝,赶紧去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然很反感,他对周扬说:“杨献珍说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是反对我的。”被毛泽东一再地认为杨献珍在反对他,这就是杨献珍被打倒的主要原因。

(三)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矛盾

本书全文引录了一篇发表于1980年9月陕西省《人文》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再论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文章认为,林彪、四人帮的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我很欣赏这个说法。这比唯意志论更能表现出那个时期的指导思想的哲学特征。但作者把它说成是林彪、四人帮的哲学的主要特征,却是不准确的。是谁凭借自己所掌握的无限权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扭转了中国社会的走向?江青在审判她的法庭上理直气壮地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江青如此,四人帮的其他人和林彪何尝不是如此。他们曾经权倾朝野,但他们的权力是毛泽东给的。他们的意志只能服从毛泽东的意志,否则就有丧失权力的危险;只有在符合于毛泽东的意志的前提下,他们的意志才能有所决定。所以,他们可以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鼓吹者、宣扬者,却不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代表者和真正主体。权力意志决定论是毛泽东哲学的主要特征。

权力意志决定论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权力和意志都属于上层建筑,只有在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于历史进步的要求,从客观实际出发,才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权力意志的作用应当受制于社会物质条件,受制于客观环境。而权力意志决定论则意味着可以任凭意志天马行空,为所欲为,不受任何制约。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主体和实践者,是掌握了政治权力的唯意志论者,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意孤行地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只能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从批判《武训传》,推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直到文化大革命,哪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打上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标记?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权力意志决定论的前面加上“带有宗教色彩”的修饰语,就更具中国特色了。毛泽东所凭藉的,不但是无限的权力,而且仰赖着多年的宣传教育所形成的个人崇拜,使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权力意志的决定,他指向哪里,人们就跟到哪里,无怨无悔地甘受驱策。这就使他的权力意志决定论无孔不入,无远弗届,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这是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

作为哲学概念,权力意志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区别在于:唯意志论在任何社会都有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权力意志决定论则只能产生于、适应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专制社会里,君主掌握着绝对的政治权力,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限制他。不受制约的权力使他的意志可以畅行无阻。而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社会后,随着三权分立等制衡机制的确立,国家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一党,而是分属不同机构,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彼此制约的功能。这就消除了权力意志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条件,使权力意志决定论丧失了产生与存在的土壤。根据权力意志决定论在我国的存在与横行,我们不难作出正确的判断,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

就三次哲学大论战来说,如果把问题仅仅限制在哲学范围的话,我们不妨说,论战反映了唯物主义反映论与权力意志决定论的矛盾与斗争。在这三次论战中,“综合经济基础论”反映了从新民主主义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单一经济基础论”则是明显地体现着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服务的特征,而过渡时期总路线正是权力意志强加于社会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被导向思维和意识万能论,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唯心主义唯意志论的根据;“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从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不同表述,发展为赞成还是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分歧,“以阶级斗争为纲”也是权力意志决定论的产物。我们从哲学斗争的角度来思考,就可以从中发现,三次大论战实际上是

唯物主义反映论对权力意志决定论的挑战(虽然杨献珍未必意识到这一点),更可以明显地看到权力意志决定论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打击与压制。由于矛盾的一方握有无限强大的政治权力,斗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一面倒的形势。正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介入,把哲学观点的分歧提高到政治立场上来,才使得这些学术问题转化成为政治问题,使学术讨论转化成为政治斗争,并把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方推到被告席上。

(四)值得记取的教训

三次哲学论战被人为地政治化的结果,不仅使杨献珍身陷囹圄,备受折磨,而且所有支持他的观点的人也无一幸免,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凌辱,有的被捕判刑,有的含冤自杀。更骇人听闻的是江苏的一位解放军战士陈波的不幸下场。他原来是部队的特技射手,连续5年被评为“五好战士”,而且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仅仅因为他写过赞成“合二而一”的文章,最后竟被凌迟处死。这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暴行!我们必须记取这些血的教训,无论如何要避免今后再发生这样的冤案。

从这三次大论战中,我认为至少应当吸取以下四点教训:

(1)彻底批判权力意志决定论。这个中国特色的主观唯心主义指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只依靠权力和个人意志来办事,抛弃宪法和法律,无视群众利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建国以来,以权力意志决定论为哲学指导的政治运动和专制主义决策,给我们中华民族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地方和单位的领导人热衷于权力意志决定论,遍布各地的“政绩工程”,就是最典型的标本。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总结迄今为止的教训,建立权力制衡、依法办事的民主政治,杜绝权力意志发酵,以免再酿苦果。

(2)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总结教训的必不可少的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有着太多的教训需要总结,仅仅依靠官方的会议和机构,是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只有全党全民都来参与讨论、总结,大家用毕生的体验来进行自由的探讨,才能获得应

有的教训。一个自我封闭、封锁历史、不能从历史过失中取得有益教训的民族,是不会有辉煌前途的,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3)理论界和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继承、发扬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优良传统,不要随着权力意志的指挥棒起舞。在三次哲学大论战中,有许多哲学工作者,包括有些我很敬重的同志,也跟权追风,参与了对杨献珍的围剿。这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不承认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李锐老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得好,“一些所谓哲学家们总是喜好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从哲学的角度去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而不顾这些政策和指令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历史的发展规律。”其实,“图解、印证当政者发出的政策和指令”的,岂止是哲学家,多少热衷于追名逐利的知识分子,都把这种可耻的做法,看作是加官进爵的捷径。有人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但连自己的良心都没有了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呢?应该敲起警钟,唤醒这些知识分子的良心,促使他们关心并重视历史的教训,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

(4)开放历史档案。要探讨历史问题,总结历史教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展示历史真相,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此,有步骤地开放档案是十分必要的。执政党应该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历史。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是极为丰富的宝藏,过去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但只要我们能够正视历史,接受教训,就可以把错误和损失转化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就需要公开历史档案,让全国人民了解历史真相,共同探讨其中的教训。这是保证中华民族健康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一书的出版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虽然由于作者与论战一方的主角杨献珍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曾多年担任杨献珍的秘书),因而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不无偏颇,但难能可贵的是他正是凭藉这个特殊身份,才能为我们提供这么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希望读者在了解当年的学术讨论如何转化为政治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其中的教训,从中获取有益的知识。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 丁磐石

在上世纪中叶以前，我国出现过多位卓越的教育家、德高望重的大学校长。他们博学多识，情操高尚，为国育才呕心沥血，深受学子们的爱戴。蔡元培、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是这方面的代表。而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也应在其列。他辞世已经39年，但广大燕京校友、许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老学者还在怀念他。

新学科的开拓者

陆先生生于1894年，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人。其父虽为晚清拔贡，但长期只在镇上一家当铺当帐房先生，家境清寒。陆先生聪敏异常，自幼读书过目成诵，遂得这当铺老板的资助而上小学中学，且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0年，他考入东吴大学，后又得奖学金于1916年赴美国留学，在芝加哥大学读心理学。1920年，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东南大学执教。他最先把巴甫洛夫学说和西方国家刚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新兴的心理学理论及方法介绍给中国学生。1927年，他应聘到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授和心理学系主任。不几年，经过他的努力，这个系不但多聘有良师，并且拥有很好的图书室、实验室、隔音室、教学所需的科学仪器以及动物饲养间，这在当时我国大学中可以说是设备相当先进齐全的系了。

陆先生教心理学，常带学生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作调查研究，收集数据实证，以加深对心理的理解和研究。他讲课既富有学术性，又多有实证，有理有据，妙趣横生。因此好些外系学生也纷纷来选修他开的课程。除教学外，陆先生在生理学、教育心理学、系统心理学诸多学术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早在20年代中期便多有专著问世。上世纪30年代初，他在国内外已有很高的知名度，与时为中央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潘菽有“南潘北陆”的美

称，同被誉为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

众望所归的大学校长

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之一。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规定教会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于是燕大实行双重领导，燕大创办人司徒雷登任校务长，前清翰林、年高德劭的吴雷川先生任校长。1934年，吴先生年迈多病，辞去校长之职，燕大教职员工都推举陆先生继任。这不仅是因为陆先生是享誉中外的名学者，更是由于陆先生爱国，秉性刚直，在洋人面前不卑不亢，能够维护中国教职员工的利益。司徒雷登也很赞同陆先生继任校长，他也很钦佩、信任陆先生的学品人品。

陆先生就任校长后的情况是，司徒雷登社会活动多，在燕大主要是抓人事和财务，常用大部分时间去为学校筹措经费。当然，学校的重大决策都是由他和陆先生共同研究决定的，但学校经常的教学、科研运转和行政管理等，自然地落在坐镇校内主持日常工作的陆先生身上。陆先生廉洁奉公，工作勤恳。他为国育才竭尽心力，常谆谆劝勉学生既要力学，更要敦品，注重品德修养。他引《周礼》上说的，做人必须“坐而论道，立而行之”，认为学生应重实践，不能做“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闭目塞听的“腐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真正爱国的知识分子决不能计较个人切身利益，而应直面人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

大力支持抗日活动

上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日甚一日，我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也日益高涨。1935年，燕大学生自治会出版的《燕大周刊》不顾国民党政府

颁布的“敦睦邦交令”，每一期都有抗日救国的宣传文章，对此，陆先生力表支持，而他自己也常在不同场合发表抗日的言论。

同年12月，“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兴起，燕大学生与北大、清华等校学生联合举行大会、请愿，陆先生派雷洁琼等中外教员3人带一车馒头进城支援、慰问，保护学生返校。随后，燕大学生自治会执委会主席黄华（原名王汝梅）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清华学生。陆先生即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联合把这些被捕学生保释了出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陆先生对蒋介石政权实行对日妥协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对蒋介石在庐山召集各大学校长“集训”，他借故拒不参加。

“西安事变”后，全民抗战开展。陆先生赞赏说共产党做了一件大好事。燕大新闻系教员埃德加·斯诺曾赴陕北苏区访问，很同情中国革命。邓颖超同志这时期因患肺病化名在西山疗养，出院后由斯诺介绍到燕大美国教员包贵思家休息，再去天津转赴解放区。此事陆先生是完全清楚、默许的。他曾让孩子们代表他去看望。1949年北平解放，邓颖超同志专程去燕园拜望陆先生，表示谢意。

抗日战争爆发，平津沦陷，北大、清华等校都撤退到内地。燕大校方认为燕大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美日还有邦交，日本不敢对它进行接管，燕大坚持不内撤，则可成为敌伪统治下的一块自由园地，让不愿受敌伪奴化教育的学生入学。于是燕大成为敌人包围下的“孤岛”，而爱国学生却视

之为“绿洲”，踊跃入学。燕大为此大增招生名额。1938年燕大秋季开学时，学生人数已由600人猛增至1100余人。

为便于与日寇周旋，抗战开始后燕大改由司徒雷登任校长，但陆先生还是能起参与校领导的作用。在那几年，燕园学子可以听短波广播，传递抗战信息；可以开会研讨时局。《义勇军进行曲》等爱国歌声不时在燕园内飘荡。学校常有学生去大后方或延安参加抗日工作，陆先生和司徒雷登及“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总要为他们钱行，有时还资助他们路费。

当时日寇常对燕大进行干扰、恫吓、威胁，燕大校方总是力加抵制。敌伪要学校开“修身课”，借此奴化学生，燕大则以从不开政治课为由予以拒绝。其他学校被迫参加庆祝“皇军”胜利的游行，燕大则以路远不便为辞拒不参加。日本占领当局提出燕大既然是国际性学校，也应该有日籍教员。他们派来了3位日籍“教授”，实际上是监视、阻挠燕园抗日活动的特务。燕大校方则坚持教授须按惯例由学校自己聘请，于是聘请了有正义感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来校任教。

1940年，燕大学生冯树功骑自行车在西直门外被日本军车撞死。燕大校方当即向日军发出书面抗议，并在校内召开追悼大会。陆先生当着日军代表的面，慷慨陈词，义无反顾。

巍然不屈的民族气节

日本侵略者视燕大如肉中刺、眼中钉。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翌晨日军即占领燕园，解散燕大，绝大部分师生被逐出学校，15位教员和10余名爱国学生先后被逮捕。被捕教员中有陆先生、名教授张东荪、洪业和邓之诚等，还有时在“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的侯仁之。司徒雷登则被单独监禁，英美教员也被送往山东潍坊集中营。

陆先生等起初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后被投入日寇陆军监狱。面对日寇的利诱威胁、凌辱打骂，这些爱国教员不畏强暴，不屈膝事敌。陆先生被折磨得浑身是病，瘦的皮包骨。日军说只要写了“悔过自新书”便可出狱，陆先生却挥笔写下四个大字“无过可悔”。



陆志韦和司徒雷登

监狱规定每月只能探监一次。所谓探监不过是让家属送些换洗衣服和少量食品，而根本见不到“犯人”。陆先生患痢疾，夫人刘文端去探监，见取回的衣服有血迹，就向以前在燕大校医院工作过、时任德国医院院长的郭大夫求助。1942年5月，德国医院把陆先生保释出来。他面色蜡黄，瘦骨嶙峋，已不能走路了。后经旧友和学生的精心治疗，才逐渐康复。

陆先生出狱后，一家大小蛰居海淀成府村，日特继续监视他，他家还多次被敌伪军警搜查。一次，日寇逼他出山为日伪政权服务，他断然拒绝。敌人恼羞成怒，竟以“违反军令”的罪名，判处陆先生一年半徒刑，缓刑两年。

陆先生困居燕郊，无经济来源，只有靠典当度日。亲友和学生有时送来一些钱粮、物品，共产党地下组织也曾给与资助。清廉的陆先生把那几年所得都写成借据，抗战胜利后陆续还清。

1943年以后，随着日寇在战场的节节败退，敌特对陆先生的监视有所放松，不少燕大教职员和学生都去看望他，这些客人中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常为抗日根据地采购药品，为便于运送，就想法把药品带出城来，藏在陆先生家里，再设法找机会转运到平西根据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陆先生在两天后即与被日寇关押4年、刚刚得释的司徒雷登等共商重建燕大之事。8月23日，一支燕京人的队伍由陆先生率领回到了被日寇糟蹋得疮痍满目的燕园。经过他们的紧张工作，燕园很快恢复了原貌，开始招生。10月10日，举行了开学典礼。从8月15日到此时仅56天，陆先生和燕大教职员员工创造了一个奇迹。燕大于1941年12月8日在北平被日寇解散后，一年后的同一天在成都复校招生，我是于1945年春在成都考入燕大的，我们在成都燕大的师生得知燕大已在北平复校的喜讯非常振奋。



1949年3月，民主人士去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后排左一为陆志韦）

1946年夏，我们成都燕大师生分四批随校复员，与北平燕大师生会合，我见到心仪已久的陆先生。他是那样文雅、朴素、和蔼，中等个子，鬓发萧疏，戴深度近视眼镜，骑着自行车进校上班授课。

义正词严营救学生

抗战胜利，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光复区的人民大失所望。蒋介石政府派人给陆先生送来胜利勋章，他马上扔掉了；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他力加劝阻。1947年8月，他致函美国来华特使魏德迈，明确表示“目前这个政府正在完全走向崩溃，除了共产党，这里没有其他组织来代替它。”

以1946年12月“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作为起点，国统区的爱国学生运动形成了新高潮，陆先生积极支持学运，学生每次进城参加各校的请愿游行，他都让进步的中外籍教授跟着去以保护学生。游行结束，学校即派卡车来接学生返校。1947年5月20日，“反内战、反饥饿”的学运兴起，他还自掏腰包，资助缺乏活动经费的学生自治会。

1948年开年以后，解放军大举反攻，蒋介石国民党军不断兵败丧师，政权岌岌可危，但还在作垂死挣扎，更加紧镇压学生运动。那年8月19日，他们在报上公布黑名单，要通缉各大学许多进步学生，燕大被通缉的有31人。北平市当局还派来上千军警特务分别包围、封锁了清华、燕京等校，声称要入校搜捕。我当时虽也是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之一，但可能由于敌特疏忽未上黑名单，另一

位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也是如此。我们两人当时都已入党,便照学校党支部的部署,出面与陆先生等校方负责人商量如何营救上黑名单的同学。

军警要入校捕人,陆先生代表校方答复:“学校已放暑假,上名单的学生都不在校内。”校内特务向军警头目报告校内还有上名单的学生,军警头目声称非进校捕人不可。但他们怕外国人,陆先生就让上黑名单的学生分别到几位外国教授家隐藏起来,同时动员外国教授出面帮助学生纠察队把守各校门。

8月20日,军警步步紧逼,眼看就要冲破校门。纠察队侦知学校后墙外半夜过后少有军警岗哨,学校党支部乃决定还留在校内上名单的6位同学夜半跳墙出走。当天下午,这几位同学都聚集在同情进步学运的美国教授夏仁德家里,我则按党支部的意思一再到夏家与那几位同学商量出走事宜。陆先生也来到夏家,他表示同意这些同学跳墙突围出走,又再三嘱咐要做好准备。

那几位同学夜半从学校后面跳墙安全走出了,陆先生遂于21日下午两点钟同军警头目最后谈判,约法三章:(1)军队不得入校,只能进不带武器的徒手警察。(2)只查学生,不能查学校,只查人,不许查物。(3)只查上名单的学生,不许抓不在名单上的人。查完后立刻解除对学校的包围封锁。他还郑重声明,对这次搜查活动,学校不予合作。

下午4点钟,学校通知同学们在大礼堂集合,许多教师也来了。带领警察入校的是驻扎在西苑的青年军的林团长。陆先生当场作了义正词严的讲话。他把这次警察进校捕人比作是1941年12月8日日寇解散燕大并抓人的恶行,说这也是一次校难,而那一次是敌寇,这次却是自己的政府。他又说:“我并不是怕事的,我出生入死,是为中华民族经历过苦难的。……我对同事们负责,特别是外国教员,因为用民主的眼光来看,今天你们会看见看不惯的事。我作为中国人,只有惭愧。同学们要守纪律,有话事后才说,一切由我负责。……凡不属于本案的人(指这次上黑名单的)今天不许逮捕。警察要在校园内搜查,我已让一些中外籍教员跟着去了,有个见证也好嘛!”陆先生的讲话像一支利剑直刺国民党反动派。警察拿着名单上同学的照片一一查对,又在校园内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地退出了学校并解围。

很快校中又传说当局要发布第二批黑名单抓学生,党支部让我翌日即离校去解放区。8月26日,我到达河北泊镇我们华北局城市工作部时,跳墙突围的6位同学已先期到了那里。我向他们和城工部的负责同志汇报了陆校长营救学生的情况,大家都深受感动,赞叹不已。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

1949年1月,陆先生和燕大师生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了北平的解放。他热情地参加了各种活动,党中央领导也很敬重他。3月,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到达北平,党安排他同众多著名民主人士去机场迎接。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

北平解放后,燕大要继续办下去,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同意陆先生的请求,决定燕大由教育部接管,改为国立,陆先生仍被任命为校长。

天有不测风云。新中国刚刚成立,“左”的专制主义就开始逞凶。1952年,在抗美援朝中,各学校开展了批判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改造运动。燕大被认为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大据点,多年主持校政的陆先生遂成为这次运动的最主要的重点批判对象。上级指派了一些同志来校动员、组织青年学生大肆揭批、“炮轰”陆先生。十几二十年后,好几位当年在燕大搞这次运动的负责人悔悟了,承认自己当年是带着“宁左勿右”的思想来搞这次运动的,因此捕风捉影给陆先生罗织罪名,猛追猛打,乱扣帽子。他们都说,这样大整陆先生是很错误的。

在这次运动中,揭批陆先生首要的就是说他一直为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解放后还在“继续用美国人的钱办学,拒绝人民政府接管燕大。”“要为美帝国主义保存文化侵略据点。”这与事实完全不符。实际情况是,1949年春,北京刚解放,我解放大军正在南下作战,军费开支巨大,我财政还很困难。而燕大要继续办,政务院权衡轻重,遂采取权宜之计,认为燕大经费暂时仍应由美国解决,人民政府只给燕大补贴一些日常急需的现金和口粮。陆先生是很不情愿再向美国伸手的,但他要为千余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生活负责,

要把学校维持下去,也只好接受美国的经费,做自己不情愿的事。陆先生是很乐意人民政府接管燕大的,那样批判陆先生,确是在歪曲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诚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燕大经费是来自美国,但也如陆先生在就任校长后所说:“是美国人出钱办燕大,但燕大不是为美国办的。”他还多次用“盗泉之水可以灌田”这一中国古话来表明自己为祖国育才的深挚心迹。并且事实也一再说明。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燕大就造就出一批批像黄华、陈翰伯、龚澎、龚普生、柯华那样优秀革命者;像费孝通、雷洁琼、翁独健、侯仁之那样博学的学者;像冰心、萧乾、杨刚那样的文学家、名记者;像吴阶平、吴蔚然、黄家驷、方圻那样的名医;像黄昆、侯祥麟那样的大有成就的科学家。这些人都是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爱国者。燕大为国育才成绩如此巨大,这中间就有久任校领导的陆先生的重要作用。说陆先生是“一直在为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显然是对陆先生这样的爱国教育家的一大冤诬。

这次揭批陆先生,还有电台的问题。1949年北平解放时,有不少外籍教员还留在燕大,他们多遵照军管会规定的外侨政策,守法尽责。陆先生应他们的要求,按国际业余无线电爱好者通讯方式,并征得北平军管会的同意,临时组装了一台发报机,把在校外籍人员的情况通知国外亲属,说他们都很安全。发报后,这台发报机便立即拆除了。但批陆先生时,却说成是“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这样掩盖事实,似是而非的批判,也是对陆先生冤诬。

这次对陆先生的乱揭乱批还有不少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陆先生和外国人通信,在抬头和下款照西方人惯用的格式用语写的“亲爱的”“忠实于你的”也被说成是“媚外”、“甘做洋人奴仆”。这样无限上纲的歪曲,也实在令人啼笑皆非。这次揭批陆先生的大会,始终是采用无情斗争、非常粗暴的方式。会上决不许陆先生辩解,说明真相,只许坦白交代,检讨。我当时是在团中央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工作,我曾到会旁听,我眼见这会如此蛮不讲理,杀气腾腾,同好些燕京校友一样,也感到很



邓颖超(前排右三)看望陆志韦夫妇

不舒服,在心里为陆先生抱不平。

“但求无愧我心”

1952年10月,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燕大并入北大,陆先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语言学研究所任一级研究员。他之所以调到语言研究所,是由于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他身处战争环境,心理学实验和社会调查难以继续进行,乃转向与心理学大有关系的语言学研究,而又有很高的造诣,屡有论文和专著问世。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这是他到语言学研究所后,在自己的墨盒盖上刻的12个大字,以此自慰自勉。他在语言学所,工作依然很认真、严谨,每天都准时上班。在研究工作中,他仍不迷信、盲从,而坚持真理。不论什么权威,其理论如有不足之处,他都要提出来。例如他讲到瑞典名学者高本汉(C.B.K. Karlgren)研究音韵学的问题时就说过:“高本汉不过是掌握了一点现代科学方法,他对中国古音韵的理解,有些地方还比不上顾炎武,现在居然被奉为经典。”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凡有人在学术上给他提出的意见,他都认真听取。他到语言学所后的研究工作,有下列几个方面:

1.主持研究文字改革工作。他作了外国语人名地名统一问题的研究,制定了英、德、俄、法几种外国语人名地名译音统一标准的方案。

2.研究拼音汉语联写问题。他在语言所领导了一个课题组,对北京口语材料进行分析,写成《汉语的构词法》一书,该书是现有的构词法和分词标准研究最为深入的专著,在语言学界影响很

大。此外,他还单独写了几部重要的语言学专著。

3.研究汉语史。他主持所的汉语史研究组工作,指导组内同志撰写汉语语音史,制定了《左传》语法的科研规划。还计划分上古、中古、近古、现代四个方面,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语言史。但计划未完成,就开始了“四清”运动。

陆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曾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工作后,1957年又被评为学部委员。

陆先生除了搞研究工作,还热情地带研究生,努力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了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经常给他们系统讲授语言学知识和方法。他循循善诱,为培养年轻人,他不仅设计、安排好年轻的研究人员的基本训练内容和步骤,还参加到他们中去一起干,以便能随时掌握这些同志在具体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给予及时的指导。

陆先生还回燕园给北大学生进行专题讲授。他学问渊博,讲课深入浅出,语言生动,很有吸引力。每逢他来北大讲课时,听课者十分踊跃。除语言学专业生外,青年教师、非语言学专业的学生也主动来听讲,他讲课的大教室总是座无虚席。

悲惨的下场和昭雪

但尽管如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多次政治运动中,他还不免受到敲打。特别是“文革”风暴袭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和学部的许多著名(上接43页)了不经审判乱捕、乱杀的现象。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王力等人,当年曾被华东局派到渤海区视察工作,他们到达山东禹城的第二天,就嫌县里杀人太少了。县的干部反映,县一级没有杀人的权力,按规定要向上级报告(这是《人权保障条例》中明确规定的)。王力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结果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30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一次又杀了40多人。景晓村、李人凤、李震等同志的冤假错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彻底平反。

60多年前,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的《人权保障条例》和渤海区的执行规则,是中国法律建设历史上最早颁布的关于人权保障的专门条例和实施细则,具有先行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很长的时期里,人权曾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口号被

学者一起被列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遭隔离审查,再次批斗。1969年,他已75岁,还被下放到偏远的河南息县的“学部五七干校”劳动,不久就病倒了,以致生活难以自理。直到1970年10月,他才被军宣队批准回京疗养。但刘文端师母受“文革”的刺激已于前一年逝世,他的子女也都不在京,仅仅一个月,这位国内外著名的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名牌大学的校长便很孤寂、很凄凉、很悲惨地与世长辞了。这是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令人非常惋惜、遗憾。这在广大燕京校友中,在国内外知识界也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1979年12月11日,陆先生的追悼会在京举行,参加者近千人。他得到了平反昭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致悼词,盛赞陆先生的学术业绩和高风亮节,特别强调陆先生的强烈的爱国心,一再支持学生运动,在与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时大义凛然。我当时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和院写作组任职,在起草陆先生追悼会的悼词时,我详细地谈了当年陆先生支持学生运动,营救上黑名单学生,敢于与国民党军警作坚决的斗争的情况。院领导特别让起草同志在悼词中加上“大义凛然”这画龙点睛之词,这或可安慰陆先生在天之灵吧。但把陆先生折磨致死的沉痛教训,仍值得我们更深入地总结,更好地记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李晨)

否定。对人权地位和价值的忽视和轻视,是导致我国在民主法制问题上出现失误,甚至出现“文化大革命”这场人权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开始重新认识人权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断打破思想禁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理论突破。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列入宪法,这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人权入宪必将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促进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作者分别为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渤海分会会长)

(责任编辑 李晨)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权力与政治

● 高 华

2006年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工作之余,都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查找资料,恰逢徐庆全也在那儿访问,为他的有关丁玲的新书做资料补充和修改的工作,我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丁玲,谈论围绕丁玲的风风雨雨。不久我就读到庆全的书稿《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纪实》,立时发现这是一本非常有创意,有深度,以新的视角考察“丁陈公案”的学术著作。下半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正式决定出版此书,庆全嘱我为他的新书作序,我虽应之,却也惶然,实在是因为丁玲的人生经历太复杂,围绕丁玲的一切也太复杂,不由得勾起我对自己“认识”丁玲的历史的回顾。

丁玲的一生凸显了 20 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基本命题

我知道丁玲的名字还是在文革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本旧杂志上读到姚文元一篇批判“大右派”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长文,几十年过去了,那篇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只有两点:丁玲有一个“反动思想”,叫做“一本书主义”;另一点则是,丁玲是从一个“灵魂腐朽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最后“堕落为反党大右派”,自那以后,丁玲的名字就印在了我的脑海。不久文革爆发,在那混乱和知识贫瘠的年代,我通过各种努力去寻找书本,我读了包括丁玲的小说和散文在内的许多五四和 30 年代的文学作品。1970 年,我又从一本旧刊《文艺报》上读到《再批判》和随刊登载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而此前看到的造反派编印的《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一类小册子上明确写道:《再批判》为毛泽东主席在 1958 年亲笔所写。

1978 年,我考入大学,虽然在历史系学习,但对 20 世纪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史一直抱有兴趣,我去中文系全程旁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还长期订阅一份《新文学史料》。丁玲复出后的新作如《“牛棚”小品》、《杜晚香》、《魑魅世界》等,我几乎都曾找来翻看。我还买了丁玲的文集、自传、游记和有关她的几种传记及研究论著,包括大陆、海外和国外学者写的不同版本。

我关注丁玲和革命文艺史,都是出自思考的兴趣,这就是丁玲和革命的关系,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当我读了丁玲一系列的作品后,我的困惑仍然没有得到解答:丁玲分明是一个左翼作家,为什么会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和“大右派”?丁玲如此追求革命,可是为什么“革命”会和她一直“过不去”,一定要把她吞噬?丁玲蒙受了几十年的苦难,为什么在文革结束后,她不能像巴金等人那样,对“革命”作出反思等等?若干年后我再看丁玲,竟然发现她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的一生凸显了 20 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历史的几个最重要的命题:革命与知识分子,革命与人性改造,革命与革命队伍内部的斗争,革命政治的惩戒机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等等。

徐庆全的新书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都涉及到以上的问题,他的书的标题就是“革命吞噬它的儿子”。他所讨论的“丁、陈反党集团案”在丁玲的一生中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丁玲是共产党文艺高级官员,也是一位中外闻名的大作家;在这之后,丁玲从“反党集团头目”、“大右派”一直滑向北大荒,再沦为监狱的囚犯,下堕到黑暗的深渊。徐庆全的新著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详细考察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成因、丁玲的性格与“历史问题”与革命体制的冲突,丁玲被处罚的机制运作等等前人研究较少触及的方面,其所论述都具开创性,这是一本以专题和实证研究的方式,详细考察革命文

学家与革命政治体制的关系以及革命政治运作等重大问题的力作。我在这里想就丁玲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再谈一些话,权当是读了庆全新著后的一些感想。

革命新政治文化转换的文化意义

“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是1955-1956年轰动全国的一件大案,此案的公布离“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不久,使全国知识界和广大干部群体大为震惊,也在国际上造成影响,因为丁、陈均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尤其丁玲,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在文坛享有盛誉,一些作品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国外流传。丁、陈以后都去了延安,丁玲在建国后更担任了宣传、文化方面一系列重要职务。丁、陈被打成“反党集团”后,“问题”升级,在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丁玲被送往“北大荒”劳改,文革中被投入监狱,1975年释放后又被流放到山西农村,一直到1978年后,才返回北京。陈企霞也被贬谪基层,先在河北省滦县国营柏各庄农场三分场劳动改造,后调杭州大学,受难多年。

丁、陈为什么会遭如此之灾难?几十年来众说纷纭,众所周知,出面打丁玲的是周扬,自30年代初开始,周扬就在上海“左联”呼风唤雨,1942年后,成为毛的文艺理论的权威解释者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首席发言人。建国后,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十六七年,不同数据都显示,周扬作为建国后“文艺战线”的头号人物,对50年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国文艺界所造成的巨大灾难负有直接的责任,经他的手落难的文人不计其数,以致于海外长时间普遍把他看成是中国的“文艺沙皇”,国内文人则慑于他的熏天的权势,不敢怒也不敢言。直到文革,毛饬封中宣部“阎王殿”的恶号,周扬被抛出,被扣上“阎王殿”“二阎王”(“大阎王”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罪名,周扬的“文艺沙皇”的形象也就被固定化了。人们普遍认为是周扬心胸狭隘,妒贤嫉能,利用权势和极左的政治大气候,一举把才华横溢的丁玲打入地狱。

人们的这种看法甚至还有更有说服力的历史依据:早在30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圈,周扬就有搞宗派主义,“唯我独左”,盛气凌人的特点,并曾受到鲁迅的尖锐批判,此更加证实人们的看法,于是人们对周扬反感、厌恶,而对丁玲抱有普遍的同情。

但是事实更为复杂。对于丁、陈的受难,周扬肯定要负相当大的责任,他长期蒙受信任,被委任把守一方,形同一路诸侯,对上奉命唯唯,对下则具有一个“文艺总

管”所有的“权威主义”的不良的方面,甚至有论者认为他对丁玲的文学成就也怀有某种程度的嫉妒。但是,周扬如果没有得到支持或批准,他怎么能够把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大作家丁玲打成“反党分子”和“大右派”?70年代末,周扬在与美籍华人作家赵浩生谈话时不无自谦地说道:他只是“毛主席的留声机”,许多人还以为周扬是在推卸责任,现在才知道周扬说的不完全是玩笑的话,如此,人们也能更好的理解周扬说过的这段话了:“整风以后我写的文章很多都是主席看过的”。近十多年来披露的历史资料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周扬说过的这些话:把胡风等打成“反革命”,把丁玲、冯雪峰整到那个程度,“都与毛泽东说了话,写了批语有关。”(于光远:《〈周扬和我〉发表以后》,载《周扬和我》,第84页,香港时代国际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在“丁、陈”一案中,周扬固然有其严重的责任,但真正的决策者是他身后的最高领袖,就像前苏联斯大林时代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一样,不存在所谓“日丹诺夫主义”,有的只是由日丹诺夫同志宣达的斯大林主义。

最高领袖对丁玲的反感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还有更深的思想原因。在历史上,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左翼知识分子还要“民主”和“个性解放”,这就和共产党的“思想一致性”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最具革命性”的农民,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情感要求,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改造国民性”等“启蒙”思想的影响,不思改造自己,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落后”和“愚昧”;革命要前进,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个性独立”和“抽象的平等”,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大救星”。丁玲去陕北的1936年,中国革命正处于从俄式革命的道路向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转换的路口,以农民革命为中心的新政治文化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丁玲自己有一段叙述颇生动地反映出这个新政治文化的氛围:

“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住处去。差不多每次去他那里,他都用毛笔抄写自己写的诗词,或是他喜欢的别人的诗词。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毛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

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反正是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正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对我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然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太子尿的词来了。”（杨桂欣：《丁玲就是丁玲》，载《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丁玲这段回忆是在80年代初谈的，事隔几十年，她还记忆犹新，正说明延安时期和毛的这些谈话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于丁玲的上述回忆，自可作出不同的解读，既可当毛的玩笑话视之，也可将其视为理解某些重大问题的注脚，而从中捕捉、感受、体会到当时革命政治文化流向的变化。

历史事实证明，30年代中期后，中国革命的政治文化开始了意义深远的转换和新的建构的过程，也就是从“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红色水兵舞”向“逼上梁山”、“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转换。而这个变化的主导者就是毛，他的思想、态度、性格、理想、作风强有力地影响和塑造着这个过程。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公布了毛在1939年11月7日致周扬的信，毛在这封信中明确说：

“现在不宜于一般地说都市是新的而农村是旧的，同样农民亦不宜说只有某一方面。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由此，可知不宜于把整个农村都看作是旧的。所谓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中国，基本上即是农民斗争，即过去亦如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亦如此。现在的反日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斗争。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

是老中国。在当前，新中国恰恰只剩下了农村。”（《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2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中国革命以农民为主力，以武装斗争为中心，以农村为主要战场，中国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的斗争”，过去党的领导者博古等不清楚中国革命的这几个关键的问题，直到30年代中期后，党的多数领导者才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对于这种巨大深刻的变化在文化上的意义，也就是农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代表“新”，或许只有少数共产党员才多少有些领悟，潘汉年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秋，丁玲在前往陕北的途中到达西安和潘汉年不期而遇，潘汉年劝她去巴黎为红军募捐而不要去保安，但是丁玲没有接受潘汉年的建议。

潘汉年是老共产党员，也是革命知识分子，他了解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感受到那种革命新政治文化的发育、成长的气息，他在青年时代有过“创造社”和“左联”的经历，对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这两“界”的情况都很熟悉，他亲眼看过大革命失败后，一些革命知识分子从狂热到幻灭的过程，他也了解丁玲的自由奔放的个性，他给丁玲的建议是最好，也是最适合的，是对丁玲的真正爱护和关心。因为在巴黎，丁玲既可以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为党做有力的宣传和募捐工作，也不致使丁玲对革命有近距离的接触，而一旦和革命有近距离接触，未经革命烈火长期考验的左翼知识分子随时有可能从动摇走向幻灭。

丁玲是坚强的革命者，根据地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她曾长期生活的上海不啻相差万里，她没有动摇，更没有幻灭。然而丁玲和正在形成的强势的革命新政治文化又有着不小的思想距离，在这个新政治文化中，对农民革命性的突出强调已在事实上取消了对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的农民的“某些观念形态”进行启蒙的必要性。丁玲从五四而来，又从五四走向共产主义，思想上还留有浓厚的五四启蒙主义色彩，这就和革命新政治文化不兼容，她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在1942年就受到了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领导的批评。因为毛的保护，也因为丁玲的名气大，加之她迅速进行自我批判，又积极参与斗争王实味，才被宽谅。之后，丁玲努力改造思想，按照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进行文学创作，写出歌颂工农兵的作品，受到毛的表扬，因而在建国初风光了一阵，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甚至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毛也在建国初到颐和园看望过在那儿写作的丁玲，还与她泛舟昆明湖上。

无法避免的厄运

但是,丁玲在建国后的厄运却是无法避免的。毛是“君师合一”型的领袖,特别重视全民思想的改造和重建,在建国初建立革命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大变革的阶段,毛都是事无巨细,亲自领导,亲自部署。他派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的身份统领中宣部,领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后又指示胡乔木别管文艺界的工作,委任周扬统领全国文艺界。虽然丁玲和最高领袖的意图并不冲突,她在建国初的几次批判文艺界“错误思想”的运动中都是冲锋在前,十分积极的,丁玲在执掌《文艺报》期间,该杂志对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非常粗暴的批评,引起作家的众怒,那时丁玲的思想之左,比周扬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为什么她还是难逃厄运?

这是因为原国统区的文人、教授都比较老实,置身在建国初万众振奋,新中国气象万千的历史转折的关头,他们看到那些来自延安和其它革命根据地的“老革命”、“老干部”,许多人的内心都有很深的歉疚感,革命理论家用“立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和“曾经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服务”等几个概念,就很容易把他们引导到“思想改造”之路。在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费孝通、金岳霖、梁思成、周培源等著名学者都纷纷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一些著名的大作家,像茅盾、曹禺、老舍、叶圣陶、李劫人等,也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的标准,对自己过去的成名作作出修改。相比较而言,比较不顺手的反而是那些自认为对革命有功的左派,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

长期以来,丁玲就陷入了写作和做官的两难之间,经过整风运动,在“工农最有知识,知识分子比较没有知识”的新型对应性思维认识框架下,最明智的选择莫过于转换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干革命的实务,才是“干革命”的正途。当然那个年代的共产党员,一切服从组织需要,“党叫干啥就干啥”,可是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某种革命工作的高低排序的,以革命的实务而言,做军队工作和保卫工作,最受组织的信任;做根据地的党和政权的工作,甚至是财经工作,也是重要和光荣的;做宣传文化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受上级耳提面命的机会多,但犯错误的几率也高,负责同志还好,他们虽然也要改造思想,但毕竟更肩负改造下属同志的思想的责任。至于那些干文字活儿的普通记者、作家、画家,虽然在进城后都是各级文宣、教育单位的负责干部,但是在那时,却是

“思想改造”的重点人群,在某些有“大军事主义”思想的同志眼中,他们也就和吹拉弹唱的文工团员同在一个系列了。

丁玲本来是有可能干革命的实务的,1936年秋冬她到达陕北后,毛征求她对工作的意见,丁玲说要去红军,毛就委任她做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但正如西谚所说,“性格即人”,丁玲从本质上做不了“官”。抗战后去延安的一些左翼文人,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文艺工作者的队伍,转型为职业党干部,以后的命运都相对较好,但是丁玲的个性和写作爱好使她永远当不成一位“优秀的党务工作者”。一方面,丁玲非常尊敬领袖和其他中央领导;另一方面,她总是去不掉身上的知识分子的味儿,以为自己是在最艰苦的年代投奔陕北,和中央领导同志是患难之交,所以她很难像其他人一样,摆正关系,在领导面前毕恭毕敬,而是有啥说啥,放言无忌。丁玲也一直留恋她的作家的声名,始终不能忘怀她的写作。而那些转业做党的工作或军队工作的同志,无不很快找到了自己在革命队伍上下级关系中的位置和一套报告、立正、敬礼等礼仪程序。以后当人们得知他们在青年时代还写过诗和小说,有的还是“左联”成员,无不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负责干部的言谈、性格和作派都已彻底转换,再无一丝文化人的味儿,他们更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还曾是文化人。丁玲的“问题”就是她的个性和她的写作,她希望以笔为枪,成为革命的主角,可是一写作就当不成革命的主角,她个人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可以帮助她摆脱这个困境的就是革命领袖的欣赏和保护。

革命领袖对丁玲确实是爱护和关心的,但同时也是严格要求的,说到底,革命领袖对丁玲的亲善和反感都是政治化的,是超越个人关系而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的。1936年,丁玲到陕北苏区,毛真诚欢迎,是那时党需要像丁玲这样的大作家来增加党的声光;建国初,毛要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知识分子,用的就是周扬、丁玲这批延安文化人。但是建国后的丁玲并不令领袖满意:尽管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但是丁玲的“自由主义”仍然很强,太好出风头,有所谓“明星意识”。丁玲更没有周扬那么顺手,很难驾驭,不符合“驯服工具”的标准。而文坛只能有一个“圣旨”宣达人,领袖绝无可能舍周扬而用丁玲。更重要的是建立意识形态的新秩序,不可能在风平浪静中进行,所谓“不破不立”,批判一两个原国统区的作家、文人,对社会的震动不大,而把大名鼎鼎的左派文人胡风和他的“同伙”定为“反革命集团”,再揪出党内的大作家丁玲,则可以让全国的知识分子受到震动,使他

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大大有利于意识形态新秩序的建立和巩固。

1954年《文艺报》“压制小人物”正好是一个突破口,善于捕捉战机的最高领袖迅速抓住此事,再把战线扩大和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周扬冲锋在前,听到的是他声色俱厉地批判丁玲、冯雪峰,却不知道在周扬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的身影。一份当年亲历者的材料透露,1956年冬在中宣部复议丁玲申诉的一次会议上,周扬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党中央毛主席指示的。他当时“还在毛主席面前讲了丁玲的好话”。在周扬讲这番话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在场,他没有对周扬的话表示异议和反对,而了解周扬的人都知道,以周扬个性、作风和他对毛的遵从,他绝无胆量捏造毛的讲话(于光远:《周扬和我》,第19-20页)。由此可见,“丁、陈反党集团案”的真正决策者还是最高领袖。毛何等细心,对往年旧事都记得清清楚楚,连冯雪峰十年前写的寓言都翻出来,当然不会忘记丁玲在1942年写的《三八节有感》。老人家顺手一并收拾:先用“丁、陈反党集团案”废掉了丁玲,反右时再废了冯雪峰。1958年初,老人家亲自动笔,写了那篇尤如重磅炸弹,置丁玲于绝境的《再批判》,新账,老账一起算,把当年他称赞过的“文小姐”、“武将军”一下打入了地狱!

革命惩戒机制的内在逻辑

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思索,在40年代整风运动结束至建国初,中共党内已基本不再打“反党集团”,也不再搞大规模的革命内部的“肃反运动”,全党上下同心同德,高度团结,迎来了1949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反而在建国后新政权已得到巩固,特别是在斯大林已去世,“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声浪高入云霄,苏联开始酝酿纠正斯大林的“肃反”错误,已不再用打“反党集团”的方式来处理思想文化界矛盾的1955年—1956年(1957年7月赫鲁晓夫打“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是苏共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属高层政治斗争),中国反而重新运用起这种传统的斯大林方式来解决党内问题和社会矛盾:搞过“胡风反革命集团”后,马上整“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肃反运动”刚过去,又搞出一个有别于苏联样式的“反右运动”;其间还穿插打“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等一系列“反党集团”或“右派集团”,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这个过程中,丁玲的“历史问题”成了套在丁玲头

上的一道绳索,所谓“历史问题”是什么呢?就是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秘密绑架,在1933至1936年被软禁在南京的这一段历史。丁玲到陕北后,已向党组织做过多次说明,在1940年的审干中也由中组部对她的那段历史作了结论。可是几年后,丁玲的这段历史在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中又被重新审查,结果给她定了一个“自首”的结论。其依据就是她在1934年被软禁在南京的期间,曾在国民党的压力下,写过一张纸条,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讯,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小纸条并没有一点反共的内容,而丁玲在南京被软禁期间也没有发表过任何反共言论。丁玲到陕北后没有向党组织交代过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在1943年审干运动中,主动向党组织谈了这件事,并为此做了自我批判。可是这张小纸条真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一直被揪住不放?丁玲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还不能够证明她的“红”吗?她在共产党最艰苦的1936年就去了保安,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将来可能在中国执掌政权的迹象,依丁玲的“名气”,她完全可以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过着舒适的写作生活。可是丁玲还是在1936年投奔了陕北,这在当时全国的大牌名流中是唯一的,这还不说明她的“革命性”吗?

中共高度重视干部历史审查的问题,这对保卫革命是完全必要的,为此在延安时期就完善和强化了对干部的严格审查制度。在长期的敌强我弱的环境下,为了保卫革命,打击敌人,党形成了特有的保持“警惕性”的文化,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严酷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下,党的组织部门和保卫部门对没有革命军队或根据地的经历,又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白区党的干部,特别对那些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党员,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只有经过组织的严格审查,那些有白区经历,特别是曾被国民党逮捕坐过牢的同志才能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与那些曾坐过国民党大牢的同志相比,出身农民的红军或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是幸运的,他们的历史简单,思想单纯,是党最信任的,但是历来党内主持制定审干政策的恰又是以白区干部为主,其中一些人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他们在厉行严厉的审干政策时,甚至更“左”。

庆全在书中说,从此这张“小纸条”的事儿就成为丁玲过不去的“坎”。依我看,“小纸条”还不完全是“坎”,而是套在丁玲头上的可紧可松的“紧箍圈”。在50年代中期的“肃反”运动中,为数不少的高级干部也被定为“自首分子”、“变节分子”,多数人只是调整了工作岗位,

例如原来是担任省委常委的,以后不能再做常委,而是改做文教单位领导,并非就被组织上一脚踢开,弃之不用,换言之,审干既是“优选法”,也是干部管理中的“控驭法”。如果丁玲“守规矩”,愿做“驯服工具”,它可以不发生作用;如果调皮捣蛋,立即就可以拿这张纸条说事。据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一届机关党委书记熊复在1978年9月27日写的有关证明材料说:“1952年整风时,作协党支部就提出过丁玲历史问题。”熊复看过丁玲的档案,“向周扬同志汇报上述问题,请示他怎么办。他说,丁玲的历史在延安审查过,没有问题,不要审查了”(黎辛:《关于〈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的辩证》,载《粤海风》2006年第1期)。可见,制度虽然是严格的,但并非完全没有弹性,在更多的时候还是取决于党的领袖和主管领导在操行这套制度时的态度。冯雪峰是长征干部,照样被打成“右派”;张春桥和江青虽有“叛徒嫌疑”,一直有人揭发,仍深受老人家的信用。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人所周知的中共“叛徒”,也没对姚文元搞株连,在最讲成分的文革年代,还步步高升,最后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

丁玲过不了“审干”关,并非就是她的“历史问题”特别严重,而是另有原因,说来还是最高领袖要把她“赶出去”。毛在反右之前的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书记会议上就明确说过: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1957年9月,毛在接见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时也说:把丁玲赶出去了,文学艺术会更发展。

令人遗憾的是,革命队伍内部长期以来一场接一场的严酷的斗争,使得“革命的同志情谊”逐渐稀薄,及至50年代中期后,革命领袖对有战功的“革命大老粗”有时还有一些“恋旧”;对若干前朝遗老,如章士钊,曾在年轻时给予过巨大帮助,毛始终给予礼遇;对一些重要的统战对象和国家急需的科学家,毛也给予一定的照顾;而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和他有过较多交往的革命文化人,则几乎没有“恋旧”的表现。冯雪峰是毛在1934年瑞金时代的旧识,丁玲在1936年就到了保安,从此没离开过革命队伍一天,两人都是在革命最困苦的阶段前往苏区的,但是,就为了一些说不上理由的事儿,再掀出“历史问题”(1937年夏秋,冯雪峰因与博古争论,负气离开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回浙江老家两年,1939年回到新四军,1941年“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囚于上饶集中营,后在党的营救下前往重庆做革命文艺工作),说打下去就打下去了。

更重要的原因是革命领袖需建立一崭新的“无产阶级新文化”,50年代中后期后,极左思想急剧升温,“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路越走越窄:第一条就是要提拔那些“文化少、知识少”的“青年闯将”。毛在1964年说,“老粗出人物。”“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没有知识的,现在他们认输了。教授不如学生,学生不如农民。”1970年姚文元给毛写信汇报读书心得,也自称读书少,知识贫乏。和“新生的无产阶级笔杆子”戚本禹、姚文元等相比,周扬这批人各种书毕竟读得太多,受“封、资、修”的影响太深,早已不中用了;第二条,要把那些“旧文化”的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领导不听话者,历史可疑分子、各种“乌龟王八”都清除出去。庆全的书中引用了一份重要的回忆数据: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期间,周扬曾谈到1957年反右时的情况。他说:“抓右派之前,主席给我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要一一戴上帽子,而且要我每天汇报‘战果’。我说,有的人鸣放期间不讲话,没有材料,怎么办?主席说,翻延安的老账!我当时常常说‘在劫难逃’,许多人听不懂。”“在中宣部,陆定一和我都‘左’的不得了。即使没有主席的这个名单,恐怕也好不了多少。”1964年,为落实毛对文艺界的两个批示,周扬等部署开展“整风”,毛已准备对夏衍、田汉、阳翰笙进行点名批判,老人家还不放心地讯问周扬:“你和这些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下不了手吧?”

极左思想是有一套内在逻辑的,它以“不断革命”,“阶级斗争”,“为全世界三分之二人民的解放”等宏大词语和未来光明的远景直指左翼知识分子的灵魂,将他们拉上“烈火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又将无数的左派甩下,被抛甩下来的人,并非就是异类,只是随着革命向更高阶段发展,在极左的显微镜的放大下,他们的“左”已演幻成了“右”。到了60年代中期,过去的“革命文化”也整体成了“旧文化”,统统都在扫荡之列。“旧文化”的载体就是那些知识分子,不管他们是来自延安还是来自重庆,把他们打下去,都是“文化革命”的题中应有之意。于是在这张名单上又不断加上一长串新的名字:巴人(王任叔)、孟超、夏衍、田汉、阳翰笙、邵筌麟、齐燕铭、林默涵、刘白羽、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舍、李达、翦伯赞、陆定一、姚溱、许立群、蒋南翔、陆平、江隆基等等,他们中的不少人本来就是党的高级官员,原来是奉旨打别人,是“反胡风”、“反丁、陈”、“反右”运动中的“大左派”或各单位“反右”的主事者,但最终还是给“烈火战车”抛甩出来。196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周

扬,称其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文艺黑线的首领”和“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这位整人无数的“大左派”最后还是被归到胡风、丁玲一类,被“无产阶级的铁扫帚”一下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这一次他们不仅是思想和灵魂遭到鞭打,身体也被“踏上了一只脚”,许多人甚至还丢失了性命。他们的罪名也和丁玲差不多,不是“叛徒”,就是“特务”,或者是“反革命”,再不就是“反革命两面派”(这是1968年姚文元给周扬的“定性”,姚文元的那篇《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经最高领袖修改过),这也和30年代斯大林整肃前苏联知识界著名人士的罪名差不多。

极左文化发展到这个阶段,就完全演变成文化“废墟主义”:除了满世界的“红宝书”,再加上“八个革命样板戏”,以及作为象征的马恩列斯、鲁迅,一切中外文化都在禁止之列,而当全国各地纷纷举办有数万或十多万群众参加的对领袖的“敬颂”活动时,所谓革命文学或革命文艺也就到了寿终正寝的地步,只落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中国的极左文化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专横,斯大林还保留了俄罗斯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化传统和典籍,还给予知识分子一个“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希望他们用他的“伟大理想”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中国的极左文化则更自大、更狂热,不仅对知识分子一概不信任,更要在一片“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宫殿,最后除了“领袖崇拜”的形式主义,在文化上什么也没有留下。

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

丁玲蒙受多年的苦难,苏俄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也是如此,但是丁玲不是阿赫马托娃,她没有那种从苦难中升华,进入普世大爱的精神气象,她的气质、境界、胸怀和眼光离那个层次都还遥远。丁玲一直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性,也是一个思想丰富,才华卓越的大作家,她的一生都在这两者间打转,既使她意气风发,也使她蒙受羞辱。建国初,她以“胜利者”自居,对一些原国统区的老作家态度高傲、轻慢。同样是丁玲,1970年后被单独监禁五年,是靠着背诵幼时母亲教给的古诗篇,才没使自己失去语言功能。丁玲受的苦难超过了阿赫马托娃,但她没有勇气揭露极左文化的罪错,她可能从自己几十年的痛苦经历中悟出:极左力量太强大,惹不起,于是啐面自干。她晚年复出后写了不少作品,除少数外,已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更少了思想的光彩。她在漫长

的苦难岁月中学会了世故,她为了让某老帮她说话,就写颂扬某老的文章,这点倒也无可厚非,阿赫马托娃为了从死亡阴影下救出她的唯一的儿子,也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篇。可是当80年代复出后,小平同志倡导的思想解放已蔚为潮流,“丁、陈反党集团案”也被彻底平反,已没有什么力量可以让丁玲封口,她却没有写出像巴金那样的反思的文字,更没有向过去伤害过的同志表示歉意或忏悔,这说明什么呢?是她不认为有反思的必要?或是她认为自己当年打击那些同志并不错?丁玲把这些疑问留给了后人,也留给了历史。

丁玲在几十年的苦难中,从没放弃“希望”,这就是祈求领袖为她说话,可是大环境如不发生根本变化,她这个被领袖钦定的“大右派”又如何能够平反?1962年夏,丁玲劳改所在地的农场党委,中国作协党组都同意为丁玲摘去“右派”帽子(不是甄别,更不是平反),也向中央打了报告,可是领袖已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对国家机关准备为右派甄别一事大发雷霆,斥之为“猖狂之极”,于是一切又都成为泡影。丁玲对领袖又敬又惧,她当然知道,是那篇《再批判》把她一巴掌打成“人民之敌”,但她绝不敢涉及领袖,1960年,丁玲以“右派代表”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在会场上望见毛主席”,她虽然非常想迎上去和老人家说话,却“没有勇气走上前去,悄悄走到一边去了”。即使领袖已故去,也是虎威犹存。她有一句名言:“他对我怎么样,不管,但我对他是一往情深的。”丁玲给自己的受难找到一个“合理解释”,这就是周扬等耍弄权术、瞒上欺下,一手遮天,蒙蔽领袖,使她遭受了几十年的苦难。对领袖的信念和对周扬等的憎恶是互为联系的,她将对毛的信念深植心中,也将对手永远盯住,成了她在漫长的艰苦岁月能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丁玲受委屈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向上级写申诉信,这是多年形成的一种习惯,“左联”的一个传统就是“集团化”,左联内部纷争的哪一方都期求党的领导的支持和仲裁,丁玲对这套行事方式极为熟悉。丁玲从几十年的革命经历中,也从自己的痛苦生活中体会到了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那条“潜规则”:只要能“找上人”,有了实权人物的关照,就可以枯木逢春,逢凶化吉。例如:在1955年“审干”中,几个著名的文艺界领导同志也是因历史问题被定为“变节”,但是他们都很幸运,不在最高领导的关注视野下,同时也一直是周扬的“亲信”,所以波澜不惊,事后还是继续做官。因此,只要有通天的人物伸出援手,就有希望,就是胜利。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丁玲已届八十高龄,为平反自己的冤案,往返奔波,四处求人,吃尽辛苦,令人无限同情。1979年丁玲复出回到北京后,曾主动前往医院看望周扬,她对在文革中受尽苦难的周扬抱有希望,以为周扬会向她伸出援手。谁知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和周扬的态度一致的还有陆定一、张光年等。周扬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丁玲。在我看来,周扬等如此并非是为了维护所谓“党性原则”,因为在他手下做各路文艺高官,又有所谓“变节”、“自首”历史问题的人不乏其人,只要是周扬一个“圈子”的,都不成为“问题”。周扬等唯独不想放过丁玲,说来还是根深蒂固的“宗派”情结在作祟,他们要用那个“紧箍圈”套在丁玲的头上,一直套到她死!这正说明了周扬人性深处的幽暗。1984年,在胡乔木的帮助下,中央恢复了1940年对丁玲的结论,承认丁玲在南京被国民党软禁的那段历史不属“自首变节”,“四十多年的沉冤得以大白”。丁玲自然感激胡乔木,她发表了不少谈话,对那个时候胡乔木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予以积极配合。她甚至还写了一首缺乏诗味的“政治表态”长诗《“歌德”之歌》,她一点也不在意读者是否爱读,却说她的这首诗“会有人理解”。对于丁玲晚年的言行,誉之者,如《中流》杂志等称赞丁玲是坚定的“老革命文艺战士”;批评者则称丁玲“错把极左当亲娘”;丁玲又一次成为文艺界、知识界关注的中心。

晚年丁玲高调左倾,虽然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候,但总的说来是意气风发,且不无表演的色彩——也就是很刻意地向那些会“理解”她的同志展现她那“虽九死而不悔”的忠诚。周扬呢?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极左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然而这位驰骋中国文艺界数十年的“大左派”,在文革入狱多年后,思想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75年他刚出狱,就前去看望了冯雪峰,甚至“不知轻重”地上书最高领袖,请求他恢复冯雪峰的党籍,自然没有任何回音。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位文革前的毛意志的坚决的执行人竟转变为1979年后思想解放运动的探索者,但是周扬却因此受到批判和冷遇,晚景凄凉,这正是历史的复杂和吊诡。

徐庆全条分缕析,丝丝拨开,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梳理,把历史帷幕后所发生的活剧一幕幕呈现出来,

写出这本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的研究性著作,他能做到这一点与他长期从事对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的研究是分不开的。徐庆全已出版多部有关当代文艺思潮方面的著作,其所著的《文坛拨乱反正实录》、《周扬和冯雪峰》、《风雨送春归——新时期文坛思想解放运动记事》等得到学界的好评。作者在这本书的资料方面尤其做了很大的努力,不仅搜集、运用了大量的已刊史料,还运用了一些关键性的未刊数据和口述史料,使得该书的立论具有了坚实的史料基础。庆全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历史的眼光,虽然这部著作的某些看法或容进一步讨论,但总的来说,这是一部高质量的研究论著,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当代文学思潮史,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史和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也是一重要的贡献。值此庆全兄新著出版,谨以此序为祝贺!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吴 思)

来 函 摘 登

贵刊2007年11期《江苏清查“五一六”冤案》一文中,“省五七干校变成集中审查关押‘5·16’的营地”部分第二段:“在省级机关机关‘留守人员’中清查‘5·16’的高潮在1971年”,与实际情况有出入。当时“留守人员”只占省级机关人员的40%以内,集中在省五七干校的省级机关“脱产人员”占60%以上,同时处于1971年的清查高潮中。此段所引用的几个数据,都包括干校的清查结果。

潘祝平

《炎黄春秋》今年第2期刊登的我写的《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该文首页左栏第5、6行:“全省八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应是“全省八个地、市委中,唐山、承德、张家口三个地、市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安振英

更 正

我刊今年第2期《清王朝的覆灭及其教训》一文,71页右栏倒3行:“1901年”应为“1910年”。特此更正。

本刊2007年第11期第3页左栏第2段第8行应为“并不能区分它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性质”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抹不掉的记忆》序

● 吴 象

《抹不掉的记忆》是《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我同他一起做过农村调查，一起合写过文章，还曾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是相识相交相知30年的老友。老友晚年出书，要我写序，尽管我年届八六，手脑不灵，执笔困难，还是不能推辞，也不该推辞的。

书名《抹不掉的记忆》。我想，为什么是抹不掉的记忆呢？一边想一边翻开书样来看：

——1960年前后，史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报刊上见到的却是“一片大好形势”，很少有“困难”出现。但是，全国性的大面积的灾难毕竟无法长期隐瞒，群众私下议论不少。1962年七千人大会终于提出了“天灾还是人祸”的疑问，有人甚至作出“七分要归咎于人祸”的分析。5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段历史，我自己就尝过饿肚子的滋味，腿脚也浮肿过，对此是不会忘记的。但是岁月流逝，慢慢就在记忆中淡化了，模糊了。作者当年作为新华社记者，被派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组织的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实行“三同”，与农民共渡难关。数月之中，每天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而且同当地农民过着同样的生活，抢救过饿得只剩一口气的老弱病残，到死绝户的偏僻小村去抬尸首掩埋……对当时的情景，作者的记忆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为抹不掉了的。

——1975年8月，豫中皖北淮河中上游及其支流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两个大型水库和2000多个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4个专区、32个县广大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当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后期，国运艰难，为社会稳定，对这场大水灾奉指示不作公开报道。因此多年以来许多中国人都不知道发生过这么回事。而作者在北京得到消息的第一时间内，就随中央慰问团一起到了灾区现场。一幕幕悲惨情景，真是令人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6年是中国人民大悲大喜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祸不单行，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唐山大地震”，百万人口的城市几乎一下子就毁灭了。唐山大地震是7月28日黎明前发生的。作者立即赶到办公室。同另两名新华社的记者坐上“奔驰”车赶奔唐山，直到9月9日毛主席逝世才另有任务调回北京。在50多天中，惊险、凄惨的场面、令人感动、流泪的事迹一日数遇，更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成了抹不掉的记忆。

——1978年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断然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毅然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方针，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点。其实，在此三年之前，就有过一次改革的预演。1975年，“文革”残局无法收拾之时，邓小平二次复出。他临危受命，曾大力推行过“治理整顿”，高举“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帜，实际上就是用毛泽东的三句话，压倒“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荒谬批判。笼罩在浓雾阴霾中的天空终于露出了一丝阳光。但“四人帮”岂肯罢手，又造谣生事，屡进谗言，污蔑邓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终于在1976年初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邓打倒在地。这是新中国一段不平凡的日子，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未卜。铁路是国民经济的枢纽，已陷于瘫痪状态，是邓治理整顿的重点，点将要万里来当铁道部长。万里不辱使命，快刀斩乱麻，迅速扭转局面，“安全正点万里行”一时传为佳话。这时作者恰恰又被派去铁道部“蹲点”调研，得以近距离观察斗争的全过程。他打消顾虑，对被隔离批斗的“右倾翻案黑干将”深入采访，了解了一些深层事实。又破除种种框框和偏见，客观公正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在这场复杂的斗争中，发挥了内部调查报告重要的独特作用。他自己也得到一个认识上的“飞跃”；“右倾翻案的黑干将”原来是“无畏无惧的急先锋”，自然会有更加刻骨铭心的、永远难忘的记忆，抹不掉了。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这两个“开始”作者恰好也都在时代大潮漩涡的中心，所见所闻要比一般人更多、更丰富、更重要。不过时间离现在较近，写的人特别多，大部分人都比较了解了。

综观这本书记叙的内容,无一不是当代过去几十年中的重大事件。历史的长河是绵延不断的。“历史”的今天就是“现实”,“现实”的昨天就是“历史”。“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就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充满自信地争取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这本书不是作者一个人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忘记的历史,至少是当代历史中真实的珍贵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缺少了就不能算是完全的真实的历史。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此。

作为重大事件,经历过的过来人都是见证人。但因为各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参与的程度不同,观察的角度不同,保留的印象也往往大不相同。了解事件的背景、意义及来龙去脉,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各级领导者,应该最有发言权,最有条件写出可信的历史真相。但他们留下的东西很少。原因可能很复杂,这里不去分析。近年他们的家属、子女、友人陆续写出一些有关的回忆,尽管是间接的,又比较零散,对研究这段历史还是很有帮助。一些当年或以后采访过某一或某些历史事件的记者,过去由于条件限制,只公开发表过其中极少部分。经过多年的思考,现在又回头来写,已是七八十岁的耄耋老人,不免增加了困难。作者亲历一系列重大事件,几十年来积累和保存了很多的资料和当时得到的数据,心中一直念念不忘,到了晚年,仍能坚持不懈地写,一篇又一篇,终于写出一本书来,确实来之不易,我为老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向他表示祝贺。也许若干章节的思想深度和文字结构无可商榷之处,但重要的是,这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真实过程、真实状况、重要数据,比较系统完整地公之于世了。一些亲历的场景、生动的细节,会唤醒许多人已经逐渐淡去的对历史的记忆,有助后来人正确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的历史。中国古来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后来又有“假、大、空”作祟,结果有的历史只剩下几条干巴巴的概念,或者扑朔迷离,是非模糊,真假难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误导后代。从长远的民族利益来看,是值得忧虑的。历史必须真实。真实的历史才能总结真正的经验,汲取真正的教训,使连续不断又跌宕起伏的历史能更好地继续向前发展。

作者是幸运的,当了记者,而且当了新华社总社的机动记者。否则他就很难甚至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有机会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记录者和一定程度的参与者。但我认为这与作者本身的一些特点是分不开的。作者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1950年初,因为家庭经济困难,高中没有读完就辍学谋生。当了一名东北森林

勘察队员,条件艰苦,生活在大森林里。粮食要靠几十、几百里外运,吃不上蔬菜,居无定所,常住帐篷。大小兴安岭未入冬即白雪皑皑,特别寒冷。流动性大,小队四五个人,一匹马一支枪,一个多月行程三千多里,往往无路可走,没有人烟,只好风餐露宿,像鄂伦春人一样过的是原始狩猎生活。这正是他年轻成长、性格形成的年代,在艰苦环境中,他忍耐着没有叫苦、更没有退缩,硬是坚持下来了,养成了一种勤奋刻苦的习惯,形成了乐观上进的性格。因此后来能适应不同环境,保持昂扬的工作精神,无论在灾区环境中,在政治漩涡中,他都能圆满完成采访任务。

他当记者的成长过程也并不平坦,从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华社当记者,一个青年学生得到这个职位该满意了,但他却有了“思想包袱”。为什么呢?因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迟迟未能入党,因为不是党员,在采访中就处处受冷落甚至歧视。自感文化基础、文字水平也不如学新闻专业的,不如到农林部门去好。但新华社有关领导认为这个勤奋刻苦的年轻人适合当记者,他也就“服从组织决定”慢慢适应了。写了一篇东北林区加强森林抚育和更新的报道,得到农村组组长的称赞,也大大增强了他当好记者的信心和勇气。领悟到不要揣摩领导意图而要老老实实深入实际,从此进入了“良性循环”,使他逐渐积累,提高了当好记者的各种条件与能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好执行指示和从实际出发的关系,锻炼成为比较成熟的记者。三年困难时期下放农村基层锻炼,夯实了他的群众观点和作风,使他深深领会到“干”与“看”是两回事,搞过农村实际工作的和没有搞过的大不一样。看别人干发表点意见是容易的,自己干就不那么容易了。记者比许多人了解情况多,说话的机会也多,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几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侥幸都没有被卷进去。得益于他对政治斗争始终抱冷静观察的态度,遇事不乱说话,处处谨慎小心。起初是牢记自己有历史包袱不得不如此,后来则因为记者职业提高了他对人民对历史的责任心,坚持实践第一。十年“文革”,他并没有闲着,而是不断采访、记录、思考、写内参。几十年后终于写成了这本书。

勤奋刻苦的优良品格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是促成此书的两大因素,也是此书最有启示性的两个亮点。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是为序。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作者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公园古今事

● 雷 颐

举世皆知,中国园林可谓历史悠久美不胜收,但不是官家园林就是私家花园,从无“公园”;奇禽异兽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从无公共“动物园”。现在我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公园”、“动物园”,是百年前在近代西学东渐影响下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公园首先于1868年出现在上海的租界,由租界当局“工部局”用中外商人税款创办,中国人译名为“公家花园”,几十年后留日学生增多,才从日本引进、最后确定名为“公园”。“公家花园”的出现,使国人对这类“公共”有初步认识。对中国人来说,“公家花园”毕竟是个新鲜事,所以时有在公园内攀折花木的事情发生。不料工部局却以此为借口,禁止华人入内。这种明显的种族歧视,自然引起华人的不满和愤怒,一些外国人也对此感到不平。《申报》发表了一些中外人士的文章,对此提出批评,如《请弛园禁》一文写道:“上海与香港事同一律,弛于彼而禁于此,抑独何欤?况该花园建之时,皆动用工部局所捐之银。是银也,固中西人所积日累月而敛聚者也,今乃禁华人而不令一游乎?窃愿工部局一再思之。”后来,一些著名华商一再请愿,联名致函工部局,要求废除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得到社会广泛支持。《申报》发表《论华商函致工部局请准华人得共游公家花园事》的评论文章指出:“本埠之有公家花园也,造之者西人,捐款则

大半出自华人。西人于造成之后,名之曰公家花园,以见其大公无私之意。然名则为公家,而其实则仍系私家。”因为不准华人入内则“此事似于公家两字显有矛盾。盖华人苟有执以问西人者谓:公家花园之创,与夫平时管理、修葺一切等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以工部局所捐之款计之,华人之捐多于西人者几何?则是此园而例以西法,华人断不至被阻。”迫于各种压力,租界工部局不得不在1886年5月废止此禁,对华人开放此“公家花园”。

在近代中国的激荡风云中,这可能说不上是大事,但意义却不能说小。首先,这毕竟是反对殖民者种族歧视斗争的一个胜利,对绅商市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有着相当的积极作用。其次,“公共空间”观念强调“公共空间”为公共所有、任何人的进入之权都不能被随意剥夺、也不能被强权任意强占,这种观念在中国向来薄弱,此事对国人“公共”意识的增强作用尤大。第三,只强调纳税义务,但不注重纳税人权利也是中国传统,这次中国绅商市民恰恰是“例以西法”,以“纳税人的权利”作为斗争的一个最有力武器并取得胜利,对纳税人权利意识的自觉所起作用尤其不能低估。第四,这次“公家花园”之争说明公开讨论的重要,对国人一向淡漠的“公共权利”意识之增强不无作用。当然,各种有关民族意识、公共意识、纳税人权利意识的

理论、宣传文章对这些“意识”的觉醒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但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升斗小民”来说,诸如“公家花园”的准进与否这类具体小事或许更重要。因为他们不是通过抽象的理论说教被灌输,而是通过与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琐事”,通过生活实践,通过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斗争,不知不觉自然而然活生生地感受、体会、认识到这种种“意识”的。这样的觉醒,这样得到的知识,往往更感性、更鲜活、更亲切、更持久、更深入也更深刻。

大约在20世纪初,中国各地都开始兴办公园,在“官权”远远大于“民权”的传统中国,兴办公园还是得益于官方的提倡。1905年,清廷为“预备立宪”派端方等五大臣到欧美诸国“考察政治”,他们到了欧美大小十余个国家,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所到之处,国无论大小,公园、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都非常普遍。对他们来说,这可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所以,他们回国后呈送的奏折中不仅有“政治”,而且还对欧洲诸国的这类公共设施赞不绝口,一一介绍,认为是“专为导民而设”,“良法美意,为中国所宜行”。对公园,他们盛赞“各国城市村镇亦皆无不有之”,“都人士女晨夜往游,其空气既可养生,其树艺亦可资研究”。所以他们详细介绍了所见欧美诸国的公共设施后叹曰:“中国以数千年文明旧域,迄今乃不若人,臣等心实羞之”,盼朝廷“敕下学部、警部,先就京师首善之区,次第筹办,为天下倡。妥定规画之方、管理之法。飭各省督抚量为兴办,亦先就省会繁盛处所,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

清廷采纳其建议,从1906年起开始兴办包括公园在内的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其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京师万牲园”于1907年7月正式接待游客,这是中国第一座公共动物园。

由于位高权重的端方等人提倡,各地官绅开始兴办公园。天津、保定、奉天、吉林、常州、南京都陆续办园,甚至偏于西南一隅的小城四川雅安,在1909年也准备在城南小山建一公园。不过,北京除“万牲园”外一直未建其他公园。对此,当时的舆论重镇《大公报》颇多批评建议,甚至早在1905年7月,端方等人修园建议之前,该报就提倡修园,

敢于而且能够尖锐地指责清廷“年来建一离宫,修一衙署,动辄糜费数十万以至数百万金,宁独于区区公园之经费而靳之”,“不宜于此公益公利之公园视为缓图”。以后几年,该报一直关注“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问题,1910年6月曾连载美国传教士、北京万国改良会(The International Reform Bureau)会长丁义华(Thwing Edward Waite)的长篇演说“公共花园论”。丁在演讲中说道:“兄弟周游西方各国,凡是民众众多的城市地方,没有不立公共花园,这真是奇事怪事,而且是最可惜的事。按说中国现在正是改良的时候,北京又是一国的都城,原应当在一切实维新变法的事情上,立个榜样,作个领袖,好倡着叫各行省也效法改良,现今像这样的京师帝王之家,竟没有一个公共花园,不能为各行省立个规模,岂不是一件恨事?”但直到清朝灭亡,京城依然没有“公园”。

清亡之后,皇家园林则为民国军政机关占用、所有。1914年6月,热心营造古建筑的内务总长朱启铃呈文时为大总统的袁世凯,提出开放京城的名胜古迹、皇家宫殿庙宇为公共场所,供公众参观、游览。他具体提出“所有京畿名胜,如:天坛、文庙、国子监、黄寺、雍和宫、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汤山、历代山陵”等都应对社会开放。袁世凯批复:“准予照办。除北海、景山、颐和园、玉泉山外,应由该部酌择一二处,先行开放。”此后,京城名胜陆续对公众开放,成为公共场所。颐和园在辛亥革命后属溥仪私产,1914年由逊清皇室售票开放;1924年由政府正式将其辟为对外开放公园。1925年,北海辟为公园对外开放。1928年,景山也辟为公园。

一百年来,包括公园在内的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如动物园、图书馆、博物馆渐渐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端方等人昔日所说,公园于“广开风气,则庶几民智日开,民生日遂,共优游于文囿艺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其无形之治功,实非浅鲜”。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是“严男女之大防”传统的某种改变。男女同时游园,使人产生“私定终身后花园”的联想,深违“严男女之大防”的传统,所以被一些人怒斥为大逆不道。为减小阻力,主事者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因此初办时大多数公园都有男女只能分单双日分别游园的规定。但既然提供了公园这样一个“平台”,实际就无法

阻止“男女同游”，所以有关规定不久就被冲破，成为一纸空文，社会也容忍、认可了男女同时游园。公园，对社会风气的开化，作用着实不小。广而言之，包括公园在内的“公共空间”在近代中国的扩展，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使我们的“公共”观念进一步加强。

但“公园”在我国的历史毕竟还短，“公共”与“政府”、“官方”远未“界线分明”，在“官本位”体制下，“公园”很容易又成为“官园”。

北海、景山这两个开放了近半个世纪的“公园”在“文革”中的1971年2月末突然关闭，重新收归“官园”，并且未作任何通告、启事、通知。或许，在宗旨是“全面专政”的年代，掌权者认为这是“官产”而不是“公产”，可以任意处置，根本无须让民众知晓、听取民意。除北京市民外，大多数“全国人民”是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几乎传达到每一个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中，才知道这两个公园被关闭的。“材料”的第四部分有一小节的标题是“毛主席刚逝世江青外出游说放毒，吃喝玩乐”，登有江青十月三日在景山公园游玩的相片。另一小节的标题是“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王洪文钓鱼、打鸟取乐”，据王原来的警卫员揭发说：“反党分子王洪文对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一点感情都没有，在毛主席重病期间，王洪文在中南海值班看护，根本不把毛主席的病情放在心上，不安心值班，他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上旬就把钓鱼杆拿到毛主席住地开始钓鱼。八月二十日左右，王洪文在值班时早晨五点钟就打电话，叫工作人员给北海公园联系，要去北海公园钓鱼，联系后，下午三点左右就去了，连钓了两次。”

在“文革”淫威下，人们对“公园”再成“皇家花园”敢怒不敢言，只能道路以目。“文革”结束后，“北海”、“景山”于1978年3月1日重新开放，再成“公园”。

1978年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几乎每天都有令人兴奋的“拨乱反正”的新政策出台、新变化发生。与许许多多重大事件相比，北海公园、景山公园重新开放的消息确乎微不足道，现在早被遗忘。1978年3月2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三月一日，北京城里，风和日丽，春光明媚。刚刚修饰一新的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在欢庆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胜

利召开的日子里，重新开放了。”而3月3日《北京日报》的报道则更有当时的“时代气息”，值得详录：“春回大地，阳光灿烂。重新开放的北海公园，游人如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人民心连心，对北海公园重新开放极为关怀，多次做重要指示。成千上万的游人，热烈欢呼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的胜利召开。在摄影展览室中，各界游人仔细端详以华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幅照片，脸上流露出幸福的微笑；在《十月的螃蟹》照片前，笑声朗朗，表达出粉碎‘四人帮’后的由衷喜悦”；“数不清的工农兵群众、科技工作者、爱国人士、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兴高采烈地谈论着粉碎‘四人帮’后的大好形势。他们站在白塔的白色栏杆前，凭栏远眺，伟大的首都，气象万千，生气勃勃，满城春色，顿感心旷神怡，豪情满怀。有的青年男女不由地唱起《交城山》的歌曲：‘华主席为咱除‘四害’，锦绣前程放光辉’”。最后一段写道：“大自然的美与人们的欢乐交织在一起，广大群众由衷地感到生活在华主席身边的幸福。一个青年在意远亭上即景赋诗：山水多娇春常在，抓纲治国花盛开，满园春色庆胜利，古园新貌人民爱。”

北海、景山重新对社会开放，看似区区小事，然而当年却是经华国锋、汪东兴、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吴德等最高层领导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才得以实行。还园于民，确是深得民众好评、大得民心之举，有“临江仙”一曲为证：“十年不见湖光好，重来恰是新晴。旧时杨柳笑相迎，经寒枝更健，破雪叶还青。歌喉久似冰泉涩，今如春鸟声声。我心应胜柳多情，满湖都是酒，不够醉春风。”（刘征：《临江仙·北海公园重新开放，园中散步》，《风花怒影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满湖都是酒，不够醉春风”！确是当日人们心境写照。

从1978年到现在，弹指一挥间，三十年过去。这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当然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三十年。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公园”的命运中。

百年前兴办的“京师万牲园”，建在昔日荒凉的“西郊”，所以在1949年改名为“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北京动物园”。近百年来，它已成为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当年的“西郊”早已是高楼林立、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闹市。在这寸土寸金的闹市之中，占地87公

顷的北京动物园自然为城建商业开发所垂涎。其实,这些年来北京动物园已被蚕食,但有关方面并不满足,经过一番运作之后,北京市有关方面在2003年决定动物园搬迁到距离市区35公里的大兴县,并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甚至一些动物园的员工也是在媒体披露后,方才知悉动物园可能迁走。

然而,就在动物园搬迁悄然酝酿、即将拍板的情况下,由民间环保群体通过互联网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网站“绿网”在2004年春首先披露此事。网上激辩最终引起传媒注意、报道,进而引进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民间环保组织、法律人士、学者、普通市民、动物园职工、中小學生、人大代表、各种媒体纷纷就此事发表意见、评论,反对搬迁。人们批评有关方面擅自决定动物园搬迁、并对公众“保密”的做法在程序上有很大的问题,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许多人提出,谁有权决定动物园的搬迁是一个法律问题;搬迁作为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应在公众一致同意授权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门。即使属于政府权限,也属政府决策中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人大审查、专家论证、行政听证等法定程序。政府有关部门却漠视纳税人供养的社会公共财产知情权,不经公共讨论,在严格保密状态下就做出了搬迁北京动物

园的决定。这种作法,不能不使人质疑其动机:如果是为了公众利益,为何要对公众保密?背后是否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因此,公众有权知道如果搬迁这块土地由谁使用、作什么用,由此自会权衡利弊。只有在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经过广泛充分的公共讨论后,才能决定是否搬迁。正是在这种“公众”压力下,北京市有关方面从善如流,起码暂时停止了北京动物园的搬迁。

从1971年“人不知,鬼不觉”地关闭北海、景山公园,再到今天北京动物园搬迁引起公众舆论强烈反应,并形成强大压力使有关部门开始与公众对话、情愿不情愿地改变原来决策,可以看到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变:“社会”开始重建,“公共领域”开始发生作用,意义不菲。

若再远溯,从1868年关于华人能否进入“公家花园”之争开始,“公园”在中国的命运、意义便不简单平凡,一再说明了“公共空间”的建立、维持并不容易。能否维护公园的“公共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的高低,公民社会是否成熟、发达。所以,对公共空间的悉心维护与奋力拓展,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晨)

按需出版

按需出版是最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它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适用范围:

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册以下最合适。

资金投入:自费。

以20万字288面、规格大32开本为例,50本一般在4600元左右(黑白单色)。彩色及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继续征稿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纸张:60克双面白胶版纸(黑白单色),印刷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代作者联系出版社,出版可供市场发行的著作。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1号楼1509号,邮编:100085,热线:010-59870796,陶女士。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8年3月

波尔布特： 并不遥远的教训

● 王晓林

每年的1月7日,是柬埔寨的公众假期。这个全体国民放假一天的正式国家节日,却有着一个骇人的名字:Victory Over the Genocide Day(大屠杀逾越日)。实际上,这一天是1979年越南军队攻陷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日子。尽管历史学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来定义它——从“解放日”到“沦陷日”,但柬埔寨人固执地将其定义为“终结大屠杀”的日子。无论你把越南人称作解放者也好,入侵者也好,都是他们(而不是别的什么人),将一场高棉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无情和最血腥的大屠杀戛然终止。幸存的人民心存感激地设立了这样一个节日,用以纪念他们的功德,哀悼数以百万计的被屠杀者以及展示这空前无理性的罪愆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大屠杀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结束在苏联的访问即将前往北京。就在赴机场的途中被送行的苏联总理柯西金告知:“你们的国民议会刚刚举行了一次剥夺您的权力的表决。”这位长期沉溺于电影而疏于国事的国王被美国人暗中操控的朗诺——施里玛达政治集团废黜了。旋即他流亡北京,得到中国政府最坚定的支持。如今45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当年正在“文革”的中国一片肃杀的荧屏和银幕上,从此无时无刻不是这位优雅的亲王和他美丽夫人的倩影。但是有几个人知道,这时还有一位柬埔寨人也在北京,这个在后来的很多年都被我们一些人亲切地称作“波尔布特同志”的人,尚隐在流亡国王的阴影下,沉默而低调。他就是柬共总书记、“红色高棉”领导人,当时还叫“沙罗绍特”。

这是他第N次来北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身材高大,面目和善,中文流利,即使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也决不会引人注目的“同志”,他将要带给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是什么,无论是他的国王还是他的中国老师都未能预料到。

1970年4月30日,美国和南越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意在彻底消灭退入柬埔寨腹地柬共占领区与政府军对抗的北越军队。其实美国人从1969年起就秘密实施了对这些地区的轰炸,一直持续到1973年才被自己的国会制止。其间数以万计的柬埔寨平民丧生在B52魔影似的机翼下,还有更多的人民流离失所。3月的政变和4月的人侵激起了更加强烈的仇恨,悲愤的人民迅速投向反美的柬共一方并将他们称作红色高棉。其实绝大部分人民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无所知,他们加入红色高棉完全是为他们的国王而战。急剧扩大的红色高棉和北越结成军事联盟,迅速控制了大半个柬埔寨。美国人在战略和战术上都犯下了无法逆转的巨大错误,应了毛泽东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名言。1975年3月29日美国从越南撤退,同年4月朗诺逃往国外,17日红色高棉攻陷金边。

从1970年3月到1975年4月,经历了5年残酷战争的南亚小国柬埔寨已经是满目疮痍,气息奄奄,谁料到这却是她更加深重苦难的开始。

1975年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部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仅仅两天之后金边全城听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声音——“父亲和母亲们,我们不得不离开城市!美国人就在10公里以外,他们马上就要开始轰炸!”年轻凶悍的红色高棉战士手握来复枪,食指就扣在扳机上,绕着手无寸铁的市民一遍遍狂呼。他们连一点收拾行装



红色高棉领导人进入金边,左一为波尔布特

的时间都不给,喊声未落就开始遍地搜寻不肯离去的人,稍有迟疑立即被当街处决,枪声在每条街巷响起。数以百万计的男女老幼慌不择路地蜂拥而出,却并不知道要去哪里。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集体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成千上万的民居门窗大开,阳台上还飘扬着刚刚晾晒的衣服。赤日炎炎,没有食品和水,婴儿被丢弃在道旁和稻田里,许多人倒毙途中。一旦倒下,卡车就直接从他们身体上压过去。尸体铺满了道路。数不清的骨头、肉体、头发、下巴、耳朵被载重的卡车迅速压平以清理道路。人们纷纷把自己的照片、工作证甚至手表丢进水塘,因为这些东西随时都能招来杀身之祸。拥有 200 万人口的金边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空城(摘自 MR. CHUM MEI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他是大疏散亲历者和图士楞监狱 7 位幸存者之一,因可为监狱当局修理汽车引擎而免于死)。同样的场景也在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上演。活下来的人们长途跋涉,投奔乡下亲友或者被指定在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由于缺乏起码的工具,许多家庭不得不以刀耕火

种的方式生存。口粮严重不足,医药奇缺,又有大批人死于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

令许多活下来的人至今都不敢轻易回忆起的这次大迁徙以其毫无理性、野蛮和血腥闻名于世,他的导演者就是我们“亲爱的波尔布特同志”。

Brother Number One: “一号大哥”

这个本名沙罗绍特、1975 年 4 月红色高棉执政后才更名为波尔布特的人,1925 年 3 月出生于磅同省磅斯外县波列斯布村一个拥有 20 公顷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6 岁起到金边莲花寺里学习柬文,9 岁出家当和尚,12 岁还俗,直到 15 岁才进学校,先后就读于磅湛和金边的中学,1949 年毕业于柬埔寨当时唯一的技术专科学校——金边技术学校并以良好的成绩获得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在巴黎他就读于沃日拉尔无线电学校并很快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与十几位留法柬埔寨学生在 1950 年暑假组织了海外第一个“柬埔寨马克思主义小组”,其中一些成为后来柬埔寨共产党的骨干。1950 年 8 月他到南斯拉夫暑假劳动,参加修建萨格勒布市的一条公路。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社会主义国家。1952 年 7

月他回到祖国立即加入了丛林抗法武装斗争,是留学生回国参加实际斗争最早的一个。当年他第一次秘密潜入中国,在南方某地参加了军政训练速成班。

50年代初,柬埔寨革命力量并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依附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控制的“高棉解放运动”,他在1953年1月加入该组织。这是一个由越南人控制的组织,从政治、理论、战略到物资、经费甚至伙食,一切都操纵在越南人手中。1954年根据日内瓦和平协议,越南全部撤出柬埔寨,导致“高棉解放运动”因失去领导人而几乎解体,却给柬埔寨人提供了“柬埔寨革命运动独立成长发展起来的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波尔布特语)。1955年起柬埔寨人开始筹备成立自己的政党。在此期间波尔布特又一次进入中国南部的游击战训练营地深造。1957年党的章程和路线起草就绪,经过两年时间的全党讨论和修改,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附近正式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高棉劳动者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11个人,其中9人是正式代表,代表当时全国约1000名正式党员。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书记杜萨木,农谢副书记,波尔布特是常委。1962年总书记杜萨木被政府军杀害,波尔布特当选为总书记。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称之为“赤柬”即红色高棉。1963年波尔布特的名字出现在西哈努克政府的通缉名单上。1965年他从柬埔寨,穿过寮国(老挝)步行到达河内,以柬埔寨共产党总书记身份受到隆重接待。他在越南用三个月的时间学习了有关党与国家建设的理论。胡志明三次会见他。但他和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的会谈很不顺利,就是在那时他才强烈感到越南不允许柬埔寨和寮国有独立的主权地位。越南共产党一直把越寮柬看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就是所谓的“印支联邦”。1965年波尔布特置北越的阻拦而不顾再次到中国访问并逗留到次年2月。这期间他会见了中共高层几位人物但没有见到毛泽东主席。中国当时的理论权威陈伯达等人给他讲述了“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枪杆子里出政权”、“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共产国际”等理论。后来波尔布特又多次到中国与越南取回“革命真经”。尤其是1965

年与康生的会见,对他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那一套铲除内奸的“理论”令他极为欣赏。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刻,他又来到中国,这一次毛泽东接见了,亲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向他推荐姚文元写于1974年的两篇受他激赏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中国,他见识了“大跃进”,“上山下乡”;在朝鲜他见识了“千里马运动”,深感茅塞顿开。1970年3月政变后西哈努克流亡中国,这位沙罗绍特同志就对中国总理周恩来说,“西哈努克已经被推翻了,我们现在宣布接受他参加民族团结阵线”。这个据说小时候连杀鸡都不忍看的佛国小僧侣就要走进历史舞台的聚光灯,变成“革命伟人”了。

不幸的是这个柬埔寨人并不满足于做一位普通的“革命伟人”,他认为共产主义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实行得不彻底,他要开创历史的新纪录,他要用自己的国家来做“彻底的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75年的4月,这个疯狂的政治动物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柬埔寨的“一号大哥”(《Brother Number One》David P Chandler)。几百万城市人口盲目的、毫无准备的大迁徙就是他的第一个举动,他迫不及待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哪怕是用同胞的血与白骨给他的“试验田”上底肥也在所不惜。请听他当政时的新政权的国歌:

红色,红色的血
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
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
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
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
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
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这样的字字滴血,句句见红,与其叫做“歌”还不如叫做嗜血魔的咆哮!

其实波尔布特疯狂的实践并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纯粹的农民乌托邦意识加上从苏、中、越、朝学来的各种大杂烩被他一股脑用在了这片可怜的“试验田”上。他要在经济基础和文明基础都相当落后的柬埔寨实行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的“超级社会主义”。几乎

在一夜之间,这个“超级社会主义”就实现了:富人被消灭了,统统都是穷人;城市消灭了,人人都成了农民;曾经的“东方巴黎”——金边,成了无人的“鬼城”;私人财产被付之一炬却没有什公有财产;货币被废除了却不建立供给制;寺庙被关闭,僧侣被强制还俗了,却还未来得及造出新的“人神”;所有的出版社、报纸、杂志和学校一律关闭,却没有新的通讯渠道诞生;对知识分子更是简单到肉体消灭,连戴眼镜都成了罪恶;家庭解体,男女劳动队分开,吃大锅饭,穿一样的黑色革命服,带一样的红格毛巾;婚姻由“安卡(组织)”指定配对……

1975年6月—8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在医院三次会见波尔布特,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不能这样做,共产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就的,而毛泽东却盛赞“你们做到了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波尔布特因此而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做到的。

S21 和钟屋杀人场

和一切独裁者一样,出于对已经到手的政权的不自信甚至是对自己的不自信,波尔布特紧接着就要实践他在中国“文革”时期学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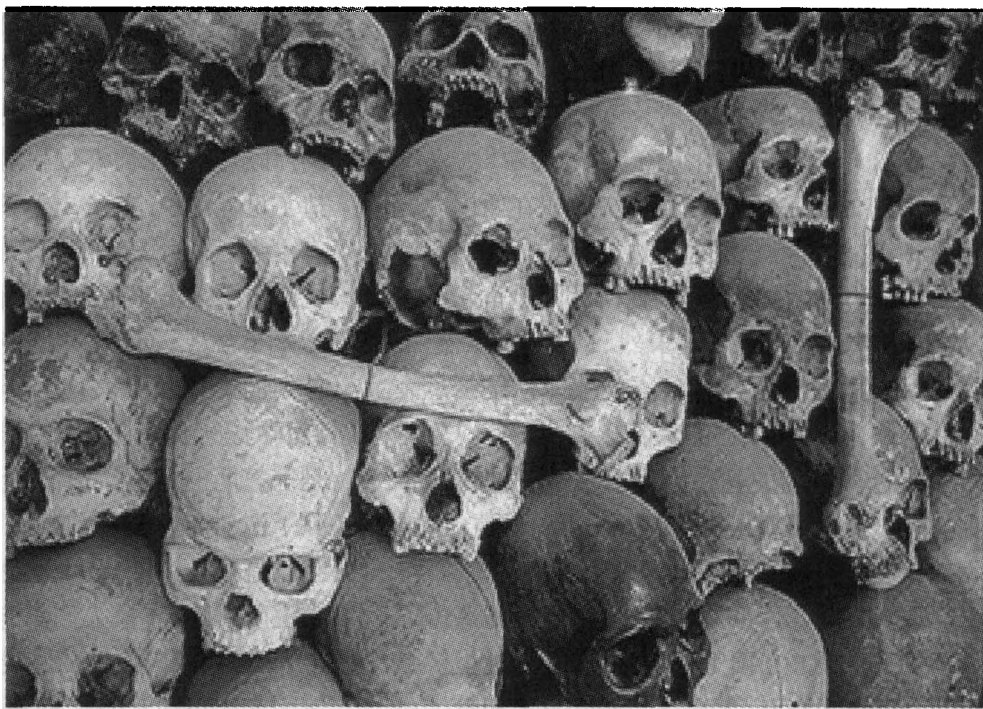
在短短3年8个月执政期间波尔布特进行了9次大清洗,真正实践了“七八个月就来一次”。红色高棉的屠刀所向真是匪夷所思,除了旧政权的官员和军人遭到大规模屠杀外,商人、僧侣和知识分子都以“不易改造且对新社会有害”为由一律肉体消灭。随后波尔布特又从党内嗅到了不详的气息,1976年他在党的会议上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话音未落,屠刀已至,一大批曾经和他一起战斗的“兄弟们”,从巴黎的马列小组同学到丛林中的同志,都遭到血腥的清洗。中央高层领导几乎被处决殆尽,包括内政部长,经济与财贸部长,农业部长,公共工程部长,情报部长,通讯、贸易、工业和橡胶种植业部长,国务委员会第一、第二副主席,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乃至柬共主要的两位创始人、波尔布特

的亲密战友符宁和胡荣在内都没有逃脱被从肉体上消灭的命运。军队方面,柬埔寨革命军总参谋部人员,除总长宋成以外被全部捕杀,即使宋成最终也难逃一劫,波尔布特终于在十几年后的1997年以反叛罪将其全家11口成员全部杀光。波尔布特为他的屠杀的冠名,每一位中国人民都耳熟能详——“清理阶级队伍”。为了屠杀的便利,一座位于金边市中心的高级中学——Tual Svay Prey 被改建成监狱(图士楞监狱),又在距离这里12公里的市郊建成了杀戮中心,这就是臭名昭著于世的S21和钟屋杀人场,所有曾经到访过这两处的旅游者无不留下终生难忘的噩梦。

S21是全国最大的拘禁与拷打中心。1975—1978年的4个年头里,超过2万人在这里被拘禁和拷打,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更多的人被送往钟屋杀人场被有计划地处决。红色高棉变态地乐于展示其残暴和野蛮,S21对每一位新进的囚犯都要照相,甚至在他们受刑的前后都要照相,丝毫不在意将来会成为罪证。如今已经成为监狱博物馆的S21,每一间囚室里都贴满了受难者的照片,上至七八十岁的白发老人,下至刚刚出生的婴儿。这些人最后都被折磨致死或分批处决了。1979年初越南军队占领金边时,S21中只有几个囚犯还活着,他们都是依靠绘画、机械修理或摄影技术得以活命。就在越南军队逼近城区的几小时内还有14名囚犯被折磨致死,他们悲惨死状的照片就挂在发现他们被肢解的房间,残破的尸体就被埋在院子里。S21的酷刑骇人听闻,人们至今还能看到沾满污血的刑床,锈迹斑驳的连环脚镣,高耸的拷打架,浸泡头颅的水缸……就连监狱的管理者以及狱卒也往往不能幸免,他们频繁地被撤换并死在原先施暴的地方。在越南军队兵临城下,S21被放弃的最后时刻,监狱长HOR处死了自己最小的弟弟,原因不明。

和S21相比,钟屋是个毫无悬念的“此处无人生还”的地方。囚犯们被塞进卡车,一路颠簸被送到这个绝命营。这里没有关押犯人的地方,只有刽子手办公室和DDT仓库。人们首先闻到的是浓重的血腥和DDT的味道,听到的是高音喇叭放出的震耳欲聋的歌声。因为处决每天都在按计划批量进行,年轻的刽子手为了节约珍贵的子弹,一般都是用棍棒将受难者打死或者用锄头直

接铲断头颅。受害者的血腥和惨叫不得不用 DDT 和高音喇叭发出的噪音来掩盖。有时押送来整车的女犯和儿童,刽子手们干脆连棍棒都不用,直接倒提孩子双腿,活活摔死在大树上,然后再奸污他们的母亲。至今人们还能看见深深地镶在树干上的小牙齿和散落在葬坑旁的褴褛破布。每一位狱卒都被要求执行处决,否则只能落得被



1981年1月,在金边南部挖掘出大量死于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无辜者的头骨

处决的下场(Mr.HIM HUY 口述,见影片《Behind the Wall of S21》)。1980年,人们从这个原来美丽的龙眼种植园中挖出了8589具遗骸。1988年这里建起了一座美丽的高塔,在透明玻璃的后面八千多个头颅按照年龄、性别从塔底一直排列到塔顶。钟屋现已探清的129个集体葬坑至今还有43个尚未挖掘。

吴哥、暹粒、马德望等地也有大大小小的杀人场,只是没有像图士楞和钟屋这样建成博物馆。

在波尔布特大屠杀的年代中,柬埔寨的华侨和越侨遭受了比柬埔寨人民更大的苦难。在柬的大约2万名越南侨民几乎被斩尽杀绝,这是1978年越南大举入侵的最直接的理由。柬埔寨的华人在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大约有60万,而在1979年暴政结束时只剩下了30万。朗诺政变之初,中国大使馆曾通知华侨干部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因此北京方面决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也就是说,柬埔寨的华侨、华人今后将由柬共掌控。所以红色高棉干部经常对华侨、华人说:

“中共已经把你们全交给我们了!”而红色高棉掌握政权后立即开始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早在1974年4月28日就曾发生过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红色高棉战士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受尽酷刑后被处决。在1975年4月金边大疏散的200多万人中,有大约40万华侨,那时他们根本不可能向祖国的大使馆求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柬埔寨问题专家爱德华兹说,波尔布特梦想建立的是以柬埔寨农民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华人在种族和意识上都不符合这一模式而成了整肃的对象。到了1976年,柬共内的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而在当时,我们中国人又看到了些什么呢?我们看到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风莲女士亲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温情脉脉,大有取代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成为新的银屏新星之势。如果你没有去过柬埔寨

寨,没有去看过 S21 和钟屋,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和你同一个年代,在离你并不太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那么可怕的事情。

1978 年圣诞节,越南 10 万“志愿军”大举进攻柬埔寨。民心丧尽的红色高棉政权在两周内即告崩溃,波尔布特仓惶逃入边境丛林。1979 年 1 月 7 日金边沦陷。越南人到处所见不是奋起反抗的柬埔寨人,反倒是兴高采烈、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柬埔寨百姓。无论如何是这支军队终结了无明的屠杀,驱散了死亡的恐惧。

在越军入侵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件在古今中外外交史上都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中国大使馆在大使孙刚的带领下居然追随波尔布特残部退入柬埔寨西部原始森林,在越军的追击下连续多日行军并在雨中睡觉。后来在森林里搭起三间草屋作为临时“大使馆”,靠吃象肉和野生动物为生,坚守外交岗位 47 天,七个人差点饿死和病死(摘自 2005 年 1 月 15 日《扬子晚报》)。

2 月,中越战争爆发。

在波尔布特执政的短短 3 年 8 个月时间里,柬埔寨人口骤减了三分之一(《国际统计年鉴》1995 版),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红色高棉在夺取政权之后迅速地达到完全丧失理性的巅峰。

在速度上,它超过斯大林的肃反;在广泛性上超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残暴和野蛮的程度上超过希特勒纳粹,在毁国毁民的程度上超过非洲的卢旺达;在死亡人数和国民人口相对值上它创造了世界纪录。人类史上只有不得已的战争而没有不得已的大屠杀,即使如此,柬埔寨的大屠杀也超出了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其性质使所有史学家至今难下定义。就连英文词汇 Genocide(有计划的灭种和屠杀)也不准确,因为它既不是种族间的,也不是地域间的,既不是利益间的,也不是宗教间的,甚至都算不上意识形态间的,因为除了波尔布特临终前的谵妄——“我没有屠杀,我只是在战斗”,至今也没有什么理论或者著作来说明或解释它。人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疯子在向全人类挑战,向人性的底线挑战。这是一场向着毁灭人类也毁灭自己的黑暗高歌猛进的种族自杀。这样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反理性的类似癌细胞一样的政治产物居然出现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的 20 世纪 70 年代,这令所有研究人类野蛮行为、人类大屠杀事件和柬埔寨问题的专家至今都迷惑不解。

(责任编辑 徐庆全)

“治方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启事

2008 年,是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也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先生诞辰 100 周年。在左祸深重的年代,孙治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曾不惜身陷囹圄达 7 年之久。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孙治方又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无畏探索,得到国人的高度崇敬。回顾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既是对改革开放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孙治方的最好怀念。为此,“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本刊联合发起“治方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征文活动。

一、征文内容:

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的进步,一方面可以从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台来诠释,另一方面可用亿万百姓所身临其中的每一步印记来展现。本次征文以这两方面为主。要求:1、以“亲历、亲为、亲

闻”一件事情为题,突出“小事件,大历史”的主题;2、以纪事本末体讲述 30 年来的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作为,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

二、时间:2008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三、评奖及颁奖

本次征文的优秀文章,将陆续在《炎黄春秋》发表,并付稿酬。征文结束后,由大赛组委会评选出获奖文章,颁发奖金和奖牌。颁奖仪式于 10 月孙治方诞辰 100 周年时在“治方书院”举行。

投稿邮箱:xqq0825@126.com

投稿地址:100045,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炎黄春秋杂志社(请在信封注明“治方杯征文”字样)

思想解放七论

解放思想从哪里杀出血路来 ——论“思想解放”

● 关 山

营造一个“宽厚、宽容、宽松”的舆论环境,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急务。思想本来就是自由的,只要言者无罪,自然言无不尽。而一部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一旦言无不尽,人类的智慧就很容易充分涌流,就很容易导入社会治理之中,从而为社会健康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保障。

思想天性自由,但现实有限,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科学理性和政治理性的统一,是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和政治家的明智选择。负责任的公民应该理解这种选择,与这种选择达成默契,学会对话、学会协商、学会妥协、学会合作、学会共赢。任何轻浮冒进都是要不得的,都可能导致新的曲折,不仅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反而使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难以巩固。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教训,我们应有足够的警惕。

无可否认,现在不少领导干部不是心里不清楚、不明白,而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他们把保住既得利益看作自己的主要使命甚至是惟一使命。只要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解放”就多“解放”,甚至不惜挑战党纪国法;只要不利于自己利益的,思想要多保守就多保守。改革就是要制约他们的权力,剥夺他们不合法的利益,使他们真正成为“公仆”,只能做有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的事,而根本不能做不利于人的普遍自由和幸福的事。实际上,人民群众的思想与实践从来都是很解放的,他们没有不希望自由和幸福的,没有不希望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不关心自己的权益的。从这个角度讲,思想解放的最大阻力显然只会来自既得利益者而不是人民群众。

有阻力就有风险,这就需要克服“求稳怕乱”的思想,树立敢为人先的理念,拿出“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正如任仲夷所言:“稳定压倒一切,但不去解决矛盾,矛盾最后就会压倒稳定。”思想解放从来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作为改革者,就应该不惧风险,以天下为己任。从改革初期习仲勋的主动请缨、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呐喊、吴南生“杀头就杀我吧”的豪言、任仲夷悲壮坚定的“冒死挺进”,再到广东新领导班子的义无反顾,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改革者执政为民的坚定信念,看到了广东的希望、中国的希望!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二论“思想解放”

● 笑 蜀

思想解放阻力其来何自?

首先来自观念上的羁绊。发端于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中国经济总量已列世界第四,超英赶美的浪漫幻想,正在市场时代变成现实。但成绩也容易使人骄傲,变成前进的包袱;对成功的路径依赖,也会使人固步自封。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变化,这就注定了思想解放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同。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致;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

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某些既得利益者对思想解放的抵触,应属人情之常。但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命运,不应为个别人的既得利益所累。何况,凡是不公平的都无法长久,本来就是历史的铁律。所以普遍自由和普遍平等,越来越成为人类共有的梦想;分享的意识、人均的意识,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的最大公约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如钱塘之潮沛然东来,其势不能御。

人不可与潮流为敌。对既得利益的固守,或能持续一时,却不可能持续一世。不该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守不住,区别只在于是体面的主动让渡,还是不体面的被动失去。这就需要既得利益者有精神内省,有良知。人是要有一点信仰的,得有责任感、使命感,且不说超凡脱俗,至少可以活得更高雅一点,更有尊严一点。这就需要超越的眼光,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尊重社会的普遍感受,尊重社会的普遍需求,重建利益相对均衡的新秩序。大家好你才能好,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才可能国泰民安,你才可能是安全的。否则,在一个断裂和倾斜的社会中,纵然坐拥金山,坐拥无上权力,终究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建筑。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是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中国社会已经聚集起强大的内在冲动,不可能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诞生史诗的时代。我们都在用自己的行状,书写各人自己的历史。而历史决不只是纸上的文字,它是一个民族的观念系统。一切世俗的荣耀都会在时间中风化,只有进入历史,进入民族的观念系统,才会真正不朽;也只有挣脱利益自我绑架,恢复信用,恢复尊严,取得与时代共同进步、与人民共同进步,才是高雅的选择,才是智慧的选择。如何在这方面先行一步,自我刷新,让自己进入历史,至少不让子孙为自己蒙羞,恐怕正是既得利益者尤其是部分官员解放思想的切入点。

新的发展需要破除管制崇拜 三论“思想解放”(上)

● 笑 蜀

管制是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在计划经济时

代有淋漓尽致的展现,其结果是人民创造能力的全面衰退,是物质财富的全面匮乏,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凋敝。所以我们才要告别计划经济,走向自由市场经济。而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进程,就是自由与管制不断博弈的过程。改革开放的每一个重大进展,都是自由秩序的扩展,都是管制的式微,都是民间智慧的胜利。

但是,我们走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过程,毕竟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必然结果,是国民财富大量聚集于政府手中。而由于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取之于民未必用之于民,就导致了天价行政成本。天价行政成本本质上无非一种管制暴利。巨额国民财富转化为管制暴利,严重阻碍了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刺激了特殊利益者强烈的管制崇拜。哪里有暴利可图,就下一道禁令,把哪里圈占起来;哪里管理成本太高,无利可图,也下一道禁令,彻底封杀,脏水跟孩子一起泼掉。

把禁令当作主要的执政手段,把管制当作主要职能,这显然有违政府天职。政府的职能跟交通警察有相近之处。交通警察主要是为行人和车辆提供交通服务,保证他们风雨无阻,而不是刻意制造交通障碍。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有权实施交通管制。同理,政府不是为管制人民而存在,而只能受人民的委托进行公共服务,这种服务犹如日常之洒扫庭除,从根本上说只是为自由秩序服务,只是为人民创造财富服务,为人民创造财富提供最优环境。

前三十年我们主要突破了对经济的管制,经济自由创造了三十年持续增长的奇迹。那么从现在起的后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突破对社会的管制,让发展的自由回归绝大多数普通国民手中。

这就需要新的思想解放。人民的强大奠基于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灵魂,自由也是发展的尺度。但哪里有管制崇拜,哪里就没有自由,哪里就没有生机,哪里就没有永续的发展。新的思想解放从哪里下手?就从破除管制崇拜下手。政府不仅要在经济上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还要开放社会的自我治理,开放社会的意见市场,开放公民的有序参与,让公民不仅可以分享财富,更可以分享权

利。

领导干部须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

三论“思想解放”(下)

● 关 山

解放思想要不停留在口号上,重要的一点就是顺应民意,尊重、保护和释放群众的创造。而亿万人民的创造一旦得到释放,任何人间奇迹都会创造出来。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更应该认识和尊重人民的历史地位,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这是是否解放思想的试金石,也是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

人民群众天然具有丰富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植根于人民的利益追求,释放于人民的自由权利。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就是尊重和保护人民的权利,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一旦自由的土壤开化,自身能力不断突破,创造之花就会盛开。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自由释放着创造,创造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当下中国,正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公民社会的成长、网络社会的发育,促使各种创造层出不穷,同时也呼唤更为自由的创造空间。给人民以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创造,而不是以公共之名行私利之实,捆绑、要挟、压制人民群众的创造,就能极大推动社会的进步。

以 NGO 为例,长久以来存在着政府办社会的弊端,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政府职能逐步转移,政府的社会职能需要社会自身来承载,这就要求社会自身组织发育成熟,能够承载起这些功能。在先前的中国经济改革中,曾试图将政府转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福利事业产业化,也就是将这些社会职能市场化。但实践证明我们干得不够,干得不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作为社会建设领域中新的社会载体,开始从 1990 年代出现。目前中国大约有 300 万个 NGO(其中 30 万个是合法登记的),至少有 6000 家国际 NGO 组织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这些非营利的民间团体主要从事着慈善、环保、教育、妇女、儿童等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或者社会发展事业。但长期以来,不少领导干部都戴着有色眼镜看待 NGO,极不利于和谐社

会建设和公民社会的成长。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除了思想僵化,就是私心太重,只顾自己的利益,不以社会责任为重。这些领导干部对任何可能不合传统习惯,不合既定章法的新观念、新事物,都认为是吃不准的事情,而吃不准的事情就有风险,就是麻烦,就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仕途,就不能被容许,而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为此甚至不惜让计划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回潮。

从根本上讲,尊重和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本,保护群众的创造就是保护人民的自由。自由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应该记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未来美好的社会,就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的社会。

经济增长不能以人为代价

四论“思想解放”

● 笑 蜀

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

经济增长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要的,但这不等于就需要唯经济建设中心。经济增长不是万金油,不是所有的经济增长,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的发展。没有社会的制衡,没有普世价值的制衡,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就会是盲目的增长,就会最终异化,成为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与文明的发展对立的一种力量。

政府强势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增长,必然伴生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导致高昂的社会成本。为什么经济对外依附性过强的局面难于改变?是因为内需没有拉动。为什么内需不能拉动?是因为普罗大众长期的低工资低福利。如果说低工资是我们民族企业的一个国际竞争优势,不宜于过早放弃这个优势,那么,由此造成的普罗大众的实际收入的降低,本应由国家提供的普遍福利来弥补。而事实上,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税收和财政的高速增长,国家并不是没有钱来提供普遍福利。但普遍福利一直缺位,本应是国家作为主要出资者的全民

社会保障,却主要靠商业性的社会保险来替代,普遍福利的负担就这样转嫁给了企业和劳动者,使劳动者并没有多少实际受益,也使企业更加不堪负荷。

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普遍福利难以实现?高昂的行政成本及腐败成本当然是制约因素,但最重要的制约因素,还在于项目拉动、投资拉动的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模式没有实质改变。

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的经济增长,即唯经济建设中心,所不顾的主要是基本权利,所不惜的代价主要是人的代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会最终导向发展的自由,不自由的发展,最终不免导向发展的歧途,即人的负发展、社会的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提升普罗大众的生活品质没有多少关系,与普罗大众的生命需要没有多少关系,不能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受益的就只会是极少数。权利的倒金字塔结构,就带来利益的倒金字塔结构,构成我们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就出现这样一个悖论: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是增长,就愈是冀望经济增长来解决;而高危运行的经济愈是增长,所付出的社会代价就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就愈是加剧。社会就这样走入了恶性循环。

这样的恶性循环是该到终结的时候了。经济增长不能不顾一切,冲击一切。只有愿意接受基本权利制衡的经济增长,只有愿意与普遍自由和普遍幸福并进的经济增长,只有这种人性化的经济增长,友善的经济增长,才是有生命力的增长,才是永续的增长。片面的经济增长固然可持续一时,但这种社会成本尤其是人心成本巨高的增长,最终是要遭遇天花板的。趁着当下经济态势稳定,政府力量强大,及时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型,使经济增长始终服从和服务于人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犹为未晚。

价值观更是发展的尺度 五论“思想解放”

● 刘洪波

思想解放,归根到底是“让思想冲破牢笼”。

思想的牢笼,既包括人自身的观念习惯,包括社会的观念传统,也包括体制制约。对于个人而言,思想更多地受到哪一座牢笼的禁锢,因人而

异。但对社会而言,思想禁锢毫无疑问更多地来自于观念传统尤其体制控制。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冲破社会的观念传统和体制制约。

越是辉煌的传统,越容易让人沉醉其间,形成对自身独特性的自恋。传统不仅是人确认文化归属的标准,也是获得自我肯定的来源。辉煌的传统不仅使人在回想历史的荣耀之中得到满足,而且使人将传统作为一种万应良药。面临冲击时,传统被视为“保国保种”的法宝;有所作为时,传统被视为“创造奇迹”的根由;处于困惑中,传统被视为无所不有的资源;畅想未来时,传统被视为世界大同的保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定期陷入“国粹主义”的迷思,它既让我们省思发展的延续性,也使一些人加固了“汉家自有制度”的情怀,“儒教共和国”、“现代仁政”乃至“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之类的宏伟设想由此而生。

体制制约更深入地影响到人的思想状态。传统不过是一种向后的拉力,而且也未必不可以作为我们回望来路的镜鉴,体制制约则是思想的阻挡物,它强制性地划定思想的允许范围,给出思想的规定线路,构造了思想的语言屏障,让人一旦处身其间如入魔阵,既能乐此不疲地自说自话,又能乐此不疲地指斥别人,而人一旦要离开这种境地,脱离这种游戏,则立即会受到各种非难,遭到各种惩戒。

“让思想冲破牢笼”,需要充分重视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认识成果,而不是固守基于观念传统或观念控制所形成的排异反应。那些思想已经冲破牢笼的人们所形成的共同观念、共同准则、共同价值,应当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而不应被视为适应于特异气候的果实。我们至少相信,“让思想冲破牢笼”、思想解放、心灵自由这些话语,就是对人类来说普遍有效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不需要。我们至少相信,民主、平等、和平、正义、人道等等是值得信奉的,而非对某些民族或某些社会来说可有可无。而这些正是在人类思想解放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果。

思想解放,就要还回人思想的权利,清除思想的牢笼,放弃对特异性的自恋,拥抱人类普遍价值。基此,我们可以也必然具有特性,只是这种特性不再作为同情和看稀奇的对象,而是被世界认可和尊重。

批判性思维不可缺 六论“思想解放”

● 关 山

解放思想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为了超越已有的认识，使思想更加符合当下的实际，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超越就要与时俱进，大胆否定那些过去成功的但当下不合时宜的经验、认识和做法。

这就决定了，批判性思维不可或缺。

人类的科学史以无数事实证明：科学的进步，都是以怀疑为开端，扬弃原有的理论才能进步。正是怀疑鼓励人们去学习，去观察，去发展知识。如果没有哥白尼对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学说的怀疑，以太阳为中心的地动学说就不会产生；如果没有爱因斯坦对牛顿力学理论的怀疑和否定，相对论就不会诞生。社会进步亦如此。如果没有列宁对马克思“世界革命同时发生”预言的质疑，何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如果没有毛泽东对俄国革命道路的怀疑，何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成功；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否定，又何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总之，没有怀疑，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理论创新。

应该承认，我们传统文化缺乏批判性思维。几千年来，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流毒使民众习惯了“守一”、“齐一”、“统一”。孔子就曾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还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文革”中林彪也说过，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总体上也是听话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对不同的声音也往往视之为异端。这种文化使我们民族缺乏批判精神，使人们易于墨守成规，创造力因之衰竭。几十年来，中国没有再出现新的学术大师和思想大师，诺贝尔奖无一次光临中国本土，这都是管制思想、禁锢思想的代价。

思想本应是自由的，但我们千百年的历史却是：自由的思想是危险的，批判的代价常常是恐惧、是以言治罪。因此，社会上有诸多的只许想什么，不许想什么；只许看什么，不许看什么；只许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诸如此类的清规戒律和思想的“紧箍咒”。即使有批判，那也是帝王的专利，只能

以“罪己诏”的形式偶一为之，或者是应诏而谏。而现代社会的转型，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让人们的批判性思维竞相迸发。这需要制度的保障，这个制度就是民主的制度。

“人不可能两次踏过同一条河流”，人的认识能力受到时间、地点等诸多条件的制约。因此，当下最紧要的是把我们的思想，从片面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经济建设中心”中解放出来，遵循科学发展观，致力于社会治理，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市场以效率为先，政府则主要推进社会公正；从对辉煌成就的陶醉中解放出来，充分肯定三十年，以便顺势而进，深刻反思三十年，把过去的全部遗憾，都转化为现实的教益，都转化为纠错的良机。而所有这些，都需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打破对批判权的垄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批判，而要开放批判的权利。只有让全社会参与，才能真正集中全社会的智慧，才能提炼出我们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 七论“思想解放”

● 笑 蜀

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更要强调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在这点上我们正在形成共识。但正如经济上需要破除行政垄断一样，社会治理也需要破除行政垄断，在这点上我们却还认识不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从根本上说，靠行政垄断、靠强化管制来解决社会问题，无异于扬汤止沸。太多事实证明，公共部门对其部门利益的执著往往超出对公众的忠诚。哪个领域的管制强化了，相关部门往往就在哪个领域占山为王，靠山吃山。原有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反倒会造就寄生于管制的食物链，造成诸多新问题。有管制，无治理，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资源高度集中的政府，其力量真正调动起来，本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第一推动力的缺乏注定其反应迟钝，也就注定其很难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往往要等到问题放大到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头号危机，这时才会振臂而出，而此时牺牲已经付出，解决问题所需的社会成本已接近最大化。

而这一切本可以避免的。

公权力一力独行,可以造就剽悍的部门,却不能造就有效的政府。徒公权力不足恃,具有排他性质的封闭式治理再也走不下去了。社会治理最可倚重的还是社会。作为利益相对人,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企业、具体的民间机构,他们才是为社会环境埋单的主体,他们对社会环境的感受才最敏锐、最真切,而且他们遍布各个角落,所以惟有倚重他们,才有望建立社会危机的就地预警和就地处置机制。

公民权利本质上是一种普遍的、均等的私权,原本就应该构成社会治理的主导力量。因此,思想

解放尤须更大力度地保障私权,更大力度地开放博弈。只有通过充分博弈,私权和公权才会得到应有的操练、应有的教化,而逐渐归于理性和成熟,达成动态平衡。社会治理领域的行政垄断则天然要排挤私权,天然要排除博弈,这就等于事实上打消了私权和公权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机会,那么无论私权还是公权,就都不免流于非理性,流于偏执和野蛮。私权与私权之间、私权与公权之间的信任 and 默契就无从建立,政府的有效和社会的和平转型,都是镜花水月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8年1月10日至2月28日)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邢同义	24.80	6.00
经历——我的 1957	和风鸣	29.00	6.00
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	李向东 王增如	34.00	7.00
河南大饥荒	宋致新	22.00	5.00
淮海战役秘密战	夏继诚	33.00	7.00
辽沈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5.00	7.00
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 植	36.00	7.00
人生至理的追寻	梁漱溟	35.00	7.00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上下)	程美东	68.00	8.00
综合哲学随笔	高亮之	22.00	5.00
牛棚杂忆	季羨林	29.00	6.00
日记的胡适	李伶俐 王一心	29.80	6.00
张国焘传	姚金果 苏 杭	39.80	7.00
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	杨继绳	36.00	7.00
在“五七干校”的日子	唐筱菊 陈少铭	38.50	7.00
红墙见证录(上、下)			
——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尹家民	69.80	8.00
学问人生(上、下)——中国社科院名家谈		79.00	8.00
定西孤儿院记事	杨显惠	25.00	6.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赫鲁晓夫回忆录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29.00	6.00
沧桑十年——1966—1976 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马识途	38.00	7.00
是药三分毒	刘弘章	38.00	7.00
风雨彭门	滕叙充	35.00	7.00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冯建辉	29.80	6.00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张素华	28.00	7.00
冷石斋沉思录	吴 江	16.00	5.00
季羨林谈人生	季羨林	19.00	5.00
季羨林谈读书治学	季羨林	19.00	5.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8.00
普洱茶健康之道	周红杰	39.80	7.00
松针养生革命	董看看	39.80	7.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透视当代中国重大突发事件》叙述了1949—2005年间中国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深刻经验教训。书中收集的突发事件每一个都具有标志性意义,第一次农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共和国史上第一个导致副总理被处分的“渤海二号”石油沉船事故;第一个导致部长被撤职的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

《沧桑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的那场空前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今天的年青人已难以置信,那些曾受过迫害的人有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作者真实、公正、客观地写下了当年的遭遇,给后人留下宝贵的教训,目的是杜绝惨绝人寰的悲剧重演。

《经历——我的 1957》这是一段沉重的历史:1957年的反右斗争,作者和丈夫共同被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教养。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丈夫被活活饿死在甘肃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里,作者的大半生经历了家破人亡的不幸和痛苦、受尽各种凌辱委屈,经受了女性所难以承受的各种情感遭际与心灵创伤。这是血和泪写就的历史。

《日记的胡适》胡适自16岁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三天,共留下二百多万字的日记。从日记看胡适,这位中国新文化的弄潮儿与代表人物展现给我们的,必定不只是他人生中精彩的一面,或许更多,我们将看到隐秘于那些琐碎文字背后映射出的个性和真实自我,那便是一番别样的风景了。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6月面世

精彩栏目

页 顾 阅 系 坛 书 言 稿 们
回 订 联 论 图 留 来 我
期 线 告 黄 黄 者 者 于
首 往 在 广 炎 炎 读 读 关

特别推出

核 心 作 者
经 典 文 章

特别开办

刊 外 稿 区
炎 黄 论 坛
读 者 调 查

[illegible]

[农资春秋概况](#) | [关于农资春秋](#) | [招聘英才](#) | [帮助中心](#) | [广告服务](#) | [合作加盟](#)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京ICP证000000号 | 京卫工监字第0294号

此書版權所有，未經書面授權禁止使用

炎黄春秋 YAN HUANG CHUN QIU 2008年第**4**期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

“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公园古今事

ISSN 1003-1170
04 >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